

神仙湖



SUMMER 2023
THE FAIRY LAKE

流動
Flowing

2023年8月 第2期 总第10期
Summer 2023

感谢校长徐扬生教授亲笔题赠书法刊名《神仙湖畔》

主管

Authorities in Charg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主办

Sponsor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顾问

Adviser

徐扬生

President Yangsheng Xu

邓康延

Deng Kangyan

出品人

Producer

马明霞

Ma Mingxia

主编

Editor-in-Chief

北海

Beihai

副主编

Deputy Chief Editor

李佳阳

Li Jiayang

英文编审

English Editor

陈俊豆

Chen Jundou

视觉监督

Visual Design

陈鸣

Chen Ming

排版设计

InDesign

陆艳钰

Lu Yanyu

学生编委会

执行社长

Executive Proprieter

金珠淇 Jin Zhuqi

主编

Editor-in-Chief

罗雯静 Luo Wenjing

祝一寒 Zhu Yihan

栏目编辑

Editor

董楚珮 Dong Chupei

杜可 Du Ke

冯子凌 Feng Ziling

胡屹潇 Hu Yixiao

黄若瑶 Huang Ruoyao

惠诗雅 Hui Shiya

罗雯静 Luo Wenjing

季伊忱 Ji Yichen

贾涵 Jia Han

叶润博 Ye Runbo

张艺骅 Zhang Yihua

祝一寒 Zhu Yih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李玮颀 Li Weiqi

李一扬 Li Yiyang

裴嘉琨 Pei Jiakun

学生记者

Reporter

丁凯伦 Ding Kailun

董楚珮 Dong Chupei

窦涵蕙 Dou Hanyu

郝嘉琦 Hao Jiaqi

黄子晗 Huang Zihan

黄若瑶 Huang Ruoyao

贾涵 Jia Han

刘焯州 Liu Yezhou

唐可馨 Tang Kexin

王菁 Wang Jing

文玄亦 Wen Xuanyi

叶润博 Ye Runbo

尹敏娜 Yin Minna

张驰 Zhang Chi

周凯怡 Zhou Kaiyi

祝一寒 Zhu Yihan

张恩禧 Zhang Enxi

译者

Translator

黄子晗 Huang Zihan

范凯翔 Fan Kaixiang

流程编辑

Process Editor

柯承宇 Ke Chengyu

王梓涵 Wang Zihan

肖毅然 Xiao Yiran

宣传部

Publicity Department

匡子娴 Kuang Zixian

杨涵文 Yang Hanwen

赵越 Zhao Yue

撰稿人

Writer

董楚珮 Dong Chupei

李潇彤 Li Xiaotong

林雅昕 Lin Yaxin

马浩文 Ma Haowen

尚与棠 Shang Yutang

滕云棋 Teng Yunqi

王清玄 Wang Qingxuan

王俏欣 Wang Yixin

封面设计

Cover Design

李潇彤 Li Xiaotong

好照片收集

好照片，自己有故事

PHOTOGRAPHY
影像记录 瞬间永恒

投稿方式

扫描二维码，进入云空间
建立文件夹，上传照片



好照片
INVITATION

《神仙湖畔》杂志社
The Fairy Lake Magazine

E-mail: fairylake@cuhk.edu.cn

电话：0755-84273523 Tel: 0755-84273523

地址：行政楼西翼 719 室 Address: W719,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声明：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 ©2023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3年8月深圳第1版
August 2023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215mm × 285mm

Format 215mm × 285mm

CONTENTS

目录

洞见

乘风破浪迎来新局面：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机遇与未来
——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08

心系大中华，放眼全世界
——记思廷书院圆桌论坛“智者论道”活动 14

科学说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和结构生物学——生命科学的明珠 22

走进肿瘤与癌症的世界——对话医学院陈卫教授 26

演讲

Keep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what's going on 34

主题报道

流动 Flowing

一、流动中的见闻

流动日志：从象牙塔流向全世界——交流交换同学专访 42

流动札记——向东洋去 50

二、社会中的流动

流动与社会创新——从改变奔流不息的河流中的一部分开始 55

冲出“象牙塔”，重返“黄金港”：找寻“流动”中的深刻与长久
——对话社会实践中心杨孟禹舜老师 60

三、流动再思考

于通识课感受个体意识的流动——专访托马斯·卡罗尔教授 65

The Flow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General Courses: Interview with Prof. Thomas Carroll

瞬息流动的再思考——《瞬息全宇宙》电影沙龙研讨纪要 70

人物

专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教授：从公社鱼塘到学术殿堂 84

长夜明灯：文化研究的赤诚与理想
——专访人文社科学院李潇雨教授 94

通识教育：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专访人文社科学院蔡一帆教授 98

i 思享

Utility Or Flourishing: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tilitarian and
Aristotelian Views of Happiness 104

洋甘菊的金色年华
——记图书馆“书林漫步”系列讲座《从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说开去》 108

校长专栏

小师傅 116

湖畔

春山雅聚 | “偷懒”的职业艺术家 122

光影 128

诗歌 | 镜中一句 140

落日的歌 142

月牙弯弯 143

散文 | 山水有清音：余光中与香港中文大学
——“书林漫步——中国文学讲座”活动有感 144

**Insights into trending issu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洞 见

洞悉时代 解读热点

INSIGHT



乘风破浪迎来新局面： 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机遇与未来

——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记者 / 丁凯伦 董楚珮

撰稿 / 丁凯伦

编辑 / 叶润博



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毕业于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其后升读香港大学，1980年取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政府成为政务主任，并于2006年9月晋升为首长级甲一级政务官。2007年由公务员转为问责官员，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成立的发展局局长。2012年6月，国务院任命其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2017年3月26日，当选为香港第五任行政长官；4月1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布国务院第678号令，任命林郑月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誓就职。2022年4月4日，林郑月娥宣布不会竞选连任；6月30日，林郑月娥五年任期完结，并为42年的公务生涯画上句号。



徐扬生校长向林郑月娥女士介绍中大（深圳）办学进展。陈鸣 / 摄

2023年5月24日，林郑月娥女士应邀到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为校内师生就《从二十大报告和两会精神看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作专题报告。上午，林郑月娥女士在校长徐扬生教授陪同下参观办学设施，考察科研平台，了解大学近几年的办学进展。她肯定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科研创新、企业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2018年3月，林郑月娥女士见证祥波书院成立仪式。陈鸣 / 摄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办学发展的重要见证人，林郑月娥女士已经是第四次来到这里。早在2012年，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女士就出席了大学启动校区的开工仪式，并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生一起，在启动区图书馆前亲手栽种下一棵凤凰树，此后，这棵美丽的凤凰树见证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办学的全部历程；2018年3月，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女士出席了大学第四所书院祥波书院的成立典礼，并于同年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2020年，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深圳数据经济研究院在前海举行挂牌仪式，林郑月娥女士专门录制了视频致辞；2021年开学典礼，林郑特首通过视频为大学和新生送上期许和祝福，同年9月6日，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香港特区代表团访深，并在深港高层会晤暨深港合作会议签约及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上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揭牌。

林郑特首在任期间非常重视深港两地教育科研人才之间的交流合作，不遗余力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协作发展。她非常重视作为深港两地合作办学代表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发展，参与并见证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办学进程中每一个重大的进展与成就，长期关心和支持大学的发展。她曾表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成功标志着粤港两地合作的无限可行性。

此次在校参访期间，林郑月娥女士接受了大学校刊《神仙湖畔》杂志的专访，阐述了她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深刻见解，并表达了她对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的深切关心与殷切期望。



2018年7月，林郑月娥女士参观大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



林郑月娥女士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陈鸣 / 摄

香港迎来新局面、新未来 湾区融合发展更添活力

林郑月娥女士于2017年至2022年间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在其任内大力支持并深度参与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包含了广东省辖九个地级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建设大湾区是国家战略发展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

2017年7月1日，即林郑特首上任的日子，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粤港澳三地政府与国家发改委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从那天开始，三地政府和相关部委便开始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原则和思想，并着手制订相应的措施与政策。经过一年多的精细筹划，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该文件进一步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也奠定了日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身体力行，在她的支持与努力下，香港政府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都与大湾区重要城市相应的部门构建起紧密的联系，从而使得粤港合作朝着更加全面且细化的方向迈进。

作为享誉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在此背景之下，香港在大湾区融合发展中有着联通内外、提供发展动力的功能。如何更积极地用好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平台来增加香港的经济动能，并通过香港的国际地位引进海内外人才技术，把金融中心以及其他产业做大做强，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重要的一步。林太表示：“现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有九个内地的省辖地级市，对于金融服务有着较大的需求，香港充满活力的资本平台恰能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为大湾区的发展注入活力。这一点，也正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关键点；新冠疫情后，现在已经实现全面通关，我对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目标，林郑月娥提到，大湾区的发展定位必须与国家整体发展一致，以大湾区创新开放的活力为国家的整体目标添砖加瓦。通过党的二十大报告，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未来中国将如何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化改革并发展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发展“八大中心”的新定位，即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商贸中心、亚太地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国际航空枢纽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一国两制”为香港带来了独特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平台又为香港带来了诸多的机遇，所以对于香港未来的期盼，就是根据国家的定位，结合香港的整体环境，具体来说，即是实现这“八大中心”的全面发展，为大湾区和国家做出贡献。

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三年来，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香港未来由治及兴的发展也有了明确的方向。林郑月娥充满信心地表示，只要利用好国家提供的平台，结合现有的优势，香港一定可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应用普通法，有着健全的法制、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各项严谨的规管制度。只要在大湾区内实现货物、资金、人才及信息的自由且有序的流动，并构建强大的海内外联系，必定大有可为。在此基础上，香港可进一步发挥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金融中心、外来直接投资目的地、商品贸易枢纽等功能，并同时增强香港的科研、文艺等新产业。在未来国内大循环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将香港置于重要战略地位。在自身的城建规划方面，香港正在开展东大屿人工岛填海，增加土地供应，以及建设将与深圳协同发展的北部都会区。

青年风华任在肩 逐梦湾区正当时

在谈及为大湾区制定纲要时，林太表示，大湾区城市群的国家定位应该是多元开放与科技创新，也是“一国两制”的新实践。香港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功是基于社会的自由、开放、包容、多元。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以香港为代表，大湾区对于海内外的企业和人才应保持开放与热情的态度，任何人只要有兴趣来大湾区发展，愿意在大湾区学习、创业、就业，实现理想，就是大湾区的建设者。同时，林太对于来到大湾区的青年也寄予了厚望，希望每个在大湾区奋斗向上的年轻人能够为大湾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香港来说，大湾区的融合也充分发掘了其发展潜力。香港只有 730 万的人口，却只有 1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和，紧缺的土地资源造成了香港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限制。但是，大湾区拥有大约 5.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超过 8500 万人口，为香港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大湾区这个大平台上，辅以政策与海内外市场的支持，香港在经济发展上的瓶颈将得到解决。大湾区经济总量高达 1.9 万亿美元，具有空前的消费潜力，香港融入大湾区之后，就获得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同时也拉动了内地的消费水平，为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契机。例如一些产品的设计与买卖，对于服务的提供者而言，市场交易的对象就从 700 多万人跃升为 8000 多万人，再加上广阔的海外和大陆市场，这必然促进香港与内地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一些成功的先行先试的策略在未来有可能推广至全国，成为城市群建设的一个参考模板，在粤港澳大湾区有工作与建设经验的劳动者在未来全国的发展就会有一定优势。

在谈到香港与内地青年之间怎样更好沟通交流时，林太表示，香港回归祖国至今还不到 30 年，在此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长期在另外一个制度系统里面成长与发展，因此，香港和内地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两地青年在理念与思想上有一定差别，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青年人必须认识到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在“一国”的框架之中，受惠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保持了繁荣昌盛。所以香港的青年一代应该多认识、了解国家的发展，从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她希望内地的年轻人也可以更全面深入地认识香港的历史和发展趋势。两地青年首先要做的就是尊重并包容彼此文化的差异，互相交流、



林郑月娥女士与记者合影。陈鸣 / 摄



林郑月娥女士为《神仙湖畔》杂志签名。陈鸣 / 摄

沟通。在这方面，粤港两地的政府都付出了许多努力。在香港，中学生有很多机会到内地去交流、考察、实习。同时，香港特区政府还在三年前推出了“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方便和工资上的补贴，借此来鼓励香港青年将目光从香港放大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寻找更多的机遇。林太表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应该不会很长。两地青年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融为一体，不会再分谁是内地人、谁是香港人，而是共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者。

十年奋斗薪火相传育国家栋梁

对于大湾区教育方面的合作，林郑月娥表示：“教育在任何地方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经济、文化、政治在内的许多方面的发展都需要高端人才，所以各地政府都非常重视教育作为深度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高等教育具有一定优势。香港的五所大学位列世界百强，在基础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表现出色，因此，大湾区的教育合作就是要充分推广这些大学成功的经验，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开展合作办学，或者是在学术和科创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并强化合作，无论哪个方面对于整个大湾区建造人才高地和科技创新中心都大有裨益。”

明年恰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年，作为深港两地合作办学的典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直积极探索粤港两地教育合作模式，并不断取得卓越成绩。林郑月娥女士多次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也十分关心大学过去十年取得的发展成就。她表示：“短短不到十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招收的学生水平、校园的建设、科技创新、与企业的合作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应该可以说是两地合作办学的先行者，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时至今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正在不断完成当时赋予它的四个使命，也就是做粤港深度合作的重要示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基地，为国家培育人才；组建国际一流科研创新平台，支撑大湾区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发挥香港独特优势，贡献国家。”

最后，林太也祝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同学都能够具有国际视野，对社会有承担，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国家未来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心系大中华，放眼全世界

——记思廷书院圆桌论坛“智者论道”活动

记者 / 王菁

编辑 / 黄若瑶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9 个珠三角城市组成，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亦是世界四大湾区之一。世界公认的四大湾区是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亦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策源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粤港澳大湾区背靠大陆、面向国际，建成便捷高效的现代化交通体系，致力于推动区域性产业发展和建设完备的经济贸易集群，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和国际化变革程度，使湾区对外经济贸易迅猛发展。在此发展生态下，我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化交流和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参与，不仅有利于改进湾区贸易体系、促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还能推动湾区文化精神塑造，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

2023 年 4 月 10 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思廷书院邀请了 6 位来自大湾区的行业领袖，分享他们在粤港澳大湾区过往合作中的经历，阐释对于当下国际时局与发展时机的看法，并展望湾区未来发展前景。在持续 2 小时的圆桌对话中，我们明晰了时代翘楚对未来人才的定义，体会了精悍隽永、语入人心的洞见。

与会分享嘉宾：

- ◇ 罗富昌先生 “亚洲罐王”、香港永富容器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 ◇ 许汉忠先生 大湾区航空公司董事及行政总裁、香港机场管理局前行政总裁
- ◇ 林远栋先生 渣打银行大湾区行政总裁
- ◇ 李汉祥先生 环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思廷书院董事
- ◇ 潘焯昌博士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会长
- ◇ 黄伟豪先生 香港贸易发展局首任驻北京首席代表
- ◇ 陈永勤教授 思廷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智者论道”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同港中大（深圳）学生交流讨论中。

在“智者论道”论坛对话正式开始之前，思廷书院院长陈永勤教授为本次活动作了一番致辞，拥有“三个中大人”^[1]印记的他对于大湾区有着相当深厚的情谊与独到的理解。陈永勤教授首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关注度予以了充分肯定，提到“在 Google 上，‘粤港澳大湾区’词条的检索次数已远超过‘ChatGPT’，可见其热度之高，属于世界范围内的‘buzzword’。”接着，他从地理学科的视角切入，简要地讲述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和区域的规划与发展。大湾区城市群共由三个圈层组成，相对分散，于珠江水系入海口构成经济发展版图。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历程较短且人口密度大，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四个周期时段特点于一身。过去，它是以桑基鱼塘闻名于世的鱼米之乡，在经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跻身 WTO 组织之后，湾区经济得以喷薄式发展。以深圳为例，其仅用 40 年时间，便从落后的小渔村，转变成成为世界瞩目、不容忽视的城市，是驱动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时值第三次科技革命，作为后起之秀的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利用开放高地的优势，引导各种要素资源加速集聚，快速崛起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由此，陈永勤教授认为深圳与香港是“twincity”，共益共生，强调“心系大中华，放眼全世界”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圭臬。

在陈永勤教授发人深思的致辞之后，圆桌论坛正式开始。山川河海皆有迹，轮回经年方得知。融入一座城，要先懂得它青砖片瓦背后的渊源；了解一个人，要先知道他岁月历程中的艰辛与磨砺。

[1] 陈永勤院长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思廷书院院长。

首先，主持人向在场的嘉宾们表达了对其在大湾区“光辉岁月”的好奇。

“作为香港金融、保险、零售等各个行业的翘楚，想了解下你们第一次从香港来到大陆的经历和体会是怎样的？”

冠有“亚洲罐王”之誉、香港永富容器集团有限公司的主席罗富昌先生率先对此提问进行回应。1978年，罗先生在香港大埔工厂筹办的美特容器厂，系大埔工业最早落成的四大厂房之一。彼时，易拉罐在美国家庭已是人手一瓶的生活必需品，而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市场而言，易拉罐仍是“洋牌潮品”，供不应求。因此，罗先生发起国牌易拉罐项目，并远越重洋飞到美国，找到当时世界规模最大、销量第一的易拉罐厂商，为项目融到了第一波份额巨大的资金。1979年，一份来自青岛生产矿泉水瓶的生意，使罗先生迎来了商业上的“开门红”。他对当时中国市场经济的概况还没有确凿的数据作为商业认知支撑，只有对中华民族强大人口体量的模糊概念作为评估基础，但仅仅用了18个月的时间，其盈利已相当可观。在可口可乐等汽水饮料广泛引入中国之后，民众对于易拉罐的需求迅速上涨，其产品增量相当显著。

在香港取得一定的商业成就之后，罗先生选择来内地继续发展，扎根于彼时黄土纷飞、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广州地区，他以办厂为实业，继续扩张产业规模，投放“罐子”，当时几乎国内任意啤酒或汽水的包装都是出自他的工厂中。短短10年的时间，他一共创办了28个工厂，占据了国内将近60%的易拉罐市场份额。在当时，罗先生的易拉罐厂连续5年都进入了全国十大中外合资企业名单之中，其中有两年位列第一。永富容器集团有限公司亦与当时风靡全国的“健力宝”合作，创造了难以复制的“中国产业奇迹”。

之后，大湾区航空公司董事及行政总裁、香港机场管理局前行政总裁许汉忠先生，依凭香港航空公司的发展为我们讲述了他第一次接触内地风貌时的一番经历。许先生第一次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到内地，去的是毗邻香港的深圳。没有如今高楼林立、大厦四起的现代化建设，上世纪70年代的深圳仍旧是小渔村的模样。当年，香港居民经常在周末坐火车到深圳市罗湖区购置便宜的农产品。他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转折点。自1979年起的之后几年内，许先生作为香港航空公司的员工，见证了香港航空公司发生的“质的腾飞”。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部拥有了去境外考核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进入内地探访亲友，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途经香港工作旅游，这些都带动了香港航空行业的整体发展。香港作为途经的“歇脚地”和旅程的“目的地”，航班次数骤增。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红利，极大提升了人们生活福祉。

改革开放环境的包容与“一国两制”政策的施行使大湾区各行各业具备发展的宏观环境。如何攫取政策中的机遇，趁时代之势，于世界语境下实现腾飞，是当代青年需要学习的课题，亦是在新时代中湾区获得发展新方向、新能源的主旨。

由此，主持人提出了本场论坛的第二个问题：

“于当前时代机遇中，年轻一代的同学们将如何面对并把握这些机遇？这些机遇背后存在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渣打银行大湾区行政总裁林远栋先生就此问题，谈到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其他湾区的特性。世界上存在许多与大湾区拥有相同地理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地区，但没有一个区域同大湾区一样，虽处于同一国家境内，但同时拥有3个关税区、3种货币、3种法律制度。这既是大湾区未来发展的挑战，亦是大湾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优势。2019年至今，大湾区在格局上产生了极大转圜，逐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节点。在全球贸易经济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的今天，联合运用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内地强大创新的制造业、打造更加完备的现代交通体系并提升粤港澳跨境交流速率、建设对接国际市场复杂且高标准的理论规则，均是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的重要机遇。大湾区的不同经济特色与不同制度之间的重合与矛盾，给予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多遐想与变化的空间。

大湾区的矛盾性造就了自身的优势与机遇。而如何有效应用自身特殊性，将地理位置及相关政策上的危转为机，是大湾区未来发展须需明确的领域。

李汉祥先生作为环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和思廷书院董事来到现场。他征引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波特钻石理论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经济形式和未来发展的切入点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李先生认为，推进企业走向国际化竞争的动力很重要，但除了国际需求的拉力之外，本地竞争者对产业造成的压力以及市场的内推力也很重要。“创造与持续产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国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市场竞争对于企业发展与行业完备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高要求的顾客亦是推动市场扩张的强有力抓手，顾客的投诉频率越高，市场的可完善完备程度便越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进程中，顾客需求的复杂度、周边配套行业的完备度、整合区域性人才的方式、资源整合力度都是大湾区需要更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世界上所有的湾区，一定有其相配套的龙头企业。“在湾区未来的规划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将要打造怎样的世界级龙头企业。大蓝图有大机遇，大湾区有大未来。我们要去赚全世界的钱，而并非仅仅是中国内部市场的钱，内部消化是非常无意义的事情。”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亦是洞察行业的监测师。粤港澳大湾区龙头企业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人才。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会长潘焯昌博士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求学与求职生涯，并描绘出大湾区未来所需人才的蓝图。大学生活赋予了潘博士良好学习方法和积极生活态度，工作则进一步修炼了他专项性能力并扩展了他的眼界。

潘博士认为大学生涯是影响他一生最大的时光。只要大学的灯在，世界就有通往未来之路。“在大学里可以碰到全世界最杰出的教授们，未来很难再遇到这样的世界顶尖人才。”潘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兼修数学和化学，是化学教授潘宗光先生的第一批学生。然而，潘博士在化学考试中的成绩并不理想，数学却获得了优异成绩。“很多人可能在某一领域有天赋和能力，但却没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兴趣。”大学中获得的知识大部分在未来人生中一点都用不到，我们需要重视的是大学中结识的人和可利用的资源。

走入职场之后，机遇比起校园会少很多。我们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不断积累“把握住可贵机会”的资本。潘博士最终弃“化”从“商”，去保险公司做金融工作。“白天打工，晚上学习”的日子持续了3年，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精算师证书。不断学习和进步的态度在工作中也非常重要。当时，保险行业刚刚开放，上海保险业兴起之初，在很多事务的处理上都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潘博士专门去香港帮助内地公司进行内部完善和业务革新。一个人从学习到创业，一家企业从成立到辉煌，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规划、试错与革新。人才的继承和迭代很重要，成功企业的特性是保留人才。

人才是企业未来前进的血液，而其发展历史是湾区的经脉。香港贸易发展局首任驻北京首席代表的黄伟豪先生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娓娓道来珠三角湖区转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历程。黄先生以往的工作经历大致可分为两段，一任职于香港贸易局，二则管辖过投行3个不同的基金。珠三角湖区转变为粤港澳大湾区得益于两股力量，分别为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于市场体系而言，珠三角地区以深圳为窗口，对接香港澳门市场，并积极发展“三来一补”产业；于行政体制而言，行政系统辅助资源配置，自上而下提高交易效率。黄先生称，曾经广东人在香港发展业务的时候都流传“山高皇帝远”的称谓。因广东从地理位置上距北京很远，体制的管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广东人胆子大、喜贸易的性格促成其许多人积极赴香港等地区谋取合作。同时，很多香港产业选择到广东进行加工，在深圳和东莞地区发展尤佳。



“智者论”道圆桌论坛与会嘉宾讨论中。

“珠三角湖区初期的合作模式主要考量的是经济因素。”黄先生讲道，时间一长之后，各地区制度上合作的矛盾，工厂不合规、许多投资企业见缝插针等现象屡见不鲜。“当时，我就一直在跟身边的合作伙伴强调要小心谨慎对待这种合作模式。”在国家注意到这类问题之后，整治了许多老牌不合规的公司和企业，使粤港澳三地区之间的合作质量整体上得到了提升和蜕变，为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讲到这里，黄先生提醒在场的听众，不要被杂物喧嚣弄混头脑，在面对很多机遇的时候，要凭借清醒的头脑合法合规地把握。如果想要更进一步，需要保持谦逊的态度。“放眼世界，粤港澳大湾区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发展到看不起别人的地步。”最后，黄先生提到湾区人才身上的必备特质一定是语言好，特别是作为全球统一贸易语言的英语。

不同跨国企业中沟通的增进，可以弥合贸易的空隙。陈永勤教授随即也表示他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的期待，希望大学全英文教育的语言环境，能培育出大批运用英语如同母语一般的人才。罗富昌先生讲述了他就读于国际学校的三个女儿的故事，亦对语言之于大湾区对外经贸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不同地域的求学生涯增进了她们对不同文化的掌握。在语言方面，如果各行各业的人才都能做到像合作伙伴的兄弟姐妹一般沟通交流，生意会很好达成。”李先生表示赞同，称国际上很多优秀的领军人物是华人。如果大湾区人民能够巧妙运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叠加“一带一路”效应之后，一定能作出引领世界的龙头企业。

心系大中华，放眼全世界，湾区立南海，当惊世界殊。大湾区，大趋势，大作为，在对人才培育方向和湾区企业发展的精彩讨论中，本次粤港澳大湾区“智者论道”活动圆满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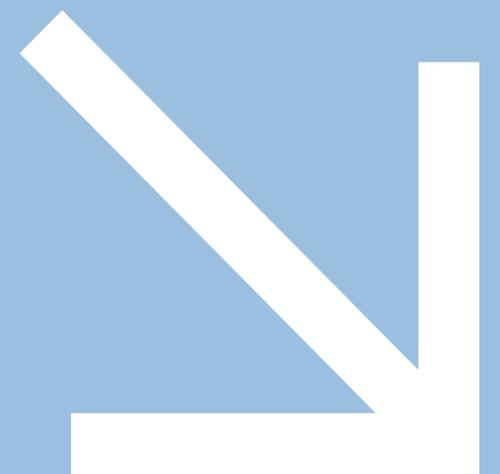
【特别鸣谢：所有活动素材均源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思廷书院】

**A brief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ontier of science**

科学说

科学前沿 浅显解读

**SCIENCE
FOCUS**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 和结构生物学——生命科学的明珠

记者 / 张弛

编辑 / 董楚珮 季伊忱



杜洋

从 2012 年美国科学家布莱恩·科比尔卡和罗伯特·莱夫科维茨以“G 蛋白偶联受体研究”斩获诺贝尔化学奖，再到 2022 年著名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回国，结构生物学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曾经说道：“许多基础的生物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能看到它们就行！”结构生物学正是一门从解析蛋白质等重要生物分子结构开始，通过“看见”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探索和理解生命活动原理的学科。在结构生物学中，关于 G 蛋白偶联受体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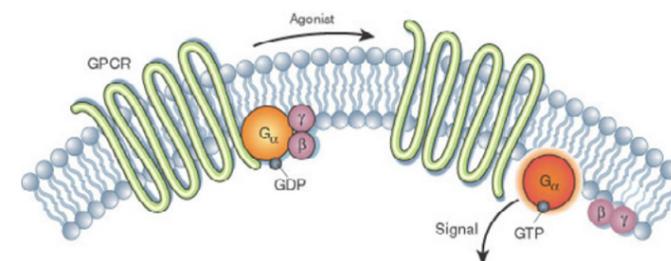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的杜洋教授在 GPCR 领域已探索了 10 年。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随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跟随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2019 年，随着导师科比尔卡教授领衔的创新药物开发研究院“落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杜洋教授正式回国，并与其他研究员一道致力于基于 G 蛋白偶联受体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创新药物的研发工作。

揭开 GPCR 的神秘面纱：膜蛋白家族的“老大”

有关蛋白质的研究一直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作为人体基因组编码的最大蛋白质家族，GPCR 的相关研究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持续关注。G 蛋白偶联受体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s, 简称 GPCRs) 是真核生物中最大的一类膜蛋白家族，它介导多种细胞信号通路，进而协同作用调节重要的生理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嗅到花香唤起愉悦的心情，还是在刺眼的强光下闭眼，人们对外界的感受都离不开 GPCR 这个灵敏的“传感器”。它广泛地参与到细胞信号的传导过程中，结合细胞周围环境中的化学物质，激活细胞内的一系列信号通路，并引起细胞状态的改变，从而影响正常生命活动的关键分子及化合物的行为，如细胞增殖和胰岛素分泌等。

正因如此，G 蛋白偶联受体与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哮喘、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密切相关，并成为现今药物研发的突破点。“现代新药研究与开发的关键，首先是寻找、确定和制备药物筛选的分子药靶。药物靶点是指药物在体内的作用结合位点，其中包括了基因位点、受体、酶、离子通道、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确定新的有效药靶是新药开发的首要任务。”杜洋教授如是说。在众多药物靶点中，G 蛋白偶联受体是一只巨大的“潜力股”。据估计，目前大约 35% 的 FDA 上市药物都以 G 蛋白偶联受体作为靶点，但在 800 多个 GPCR 成员里仅有很少一部分是已知药物的靶点，其余大部分的 GPCR 作为药物靶点的潜力仍有待进一步开发。可以说，GPCR 具有相当高的科研和应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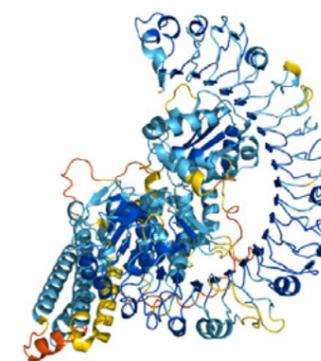
然而，GPCR 的研究和开发难度也摆在眼前。要想得到一个优质的 GPCR 结构远比想象中困难。GPCR 家族成员具有非常保守的结构性质，但其结构却十分复杂：它们通过七次跨越细胞膜而镶嵌在细胞膜上。“它们嵌入细胞膜中，这是一个关键的位置，有助于它们将信息从外部传递到细胞内部。”杜洋教授说，正是细胞膜这个关键的位置，大大提升了科研人员分离和提纯 GPCR 的难度，成为了困扰研究者们多年的问题。因此，GPCR 的第一个结构在 2000 年才被确定。不过，近年来科研人员另辟蹊径，找到了更多解析蛋白质结构的方法。与此同时，观测工具也不断进步，在 20 世纪人们用 X 射线衍射分析 DNA 结构；如今，冷冻电子显微镜为重建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提供便利，将 GPCR 的分析简化了很多；将来，诸如 AlphaFold 等人工智能工具也必将会对分子结构预测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些努力与进步都为 G 蛋白偶联受体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



GPCR 七次跨越细胞膜，镶嵌在细胞膜上。
(图片来源: <https://www.nature.com/scitable/topicpage/gpcr-14047471/>)



科比尔卡创新药物开发研究院的冷冻电镜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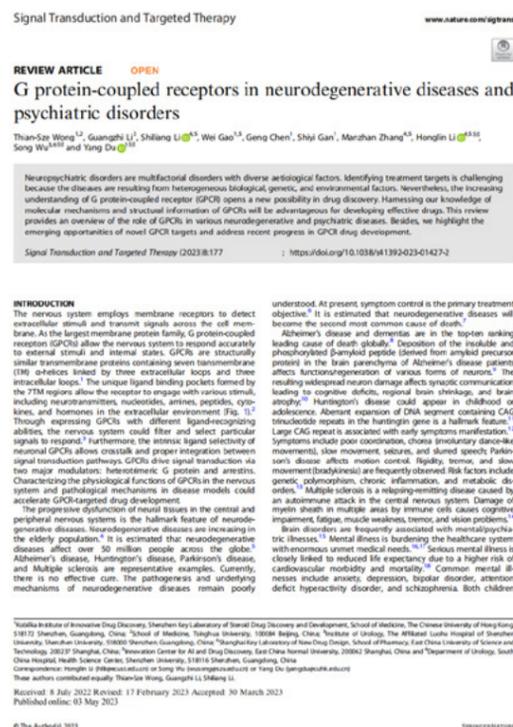
AlphaFold 预测的蛋白质结构。
(图片来源: <https://alphafold.ebi.ac.uk/>)

在 GPCR 领域深入探索：从应用出发，让理论落地

在目前众多的 GPCR 研究中，很多研究仅限于分析得出蛋白质的结构，局限在理论层面。而杜洋教授的科研以发现和应用为起点，且他认为，GPCR 的研究也应当以实际应用为最终目的，一切都离不开应用。

杜洋教授在近期发表于 Nature 上的论文“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中，介绍了 GPCR 研究在治疗各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中的作用，并强调了以前未被开发的 GPCR 靶点的新兴机会和 GPCR 靶点药物开发的最新进展。比如，一种名为 A2A 的 GPCR 受体在活化后可以通过抑制一氧化氮合成酶来抑制一氧化氮产生，而一氧化氮则与各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因此，A2A 受体的激活可影响神经突触再生并造成记忆缺陷，那么抑制 A2A 受体，就可能有助于控制年龄增长导致的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障碍。

“药物开发是一项链条很长、困难重重且投资巨大的工作，这也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在这一领域力量薄弱的原因之一。”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杜洋教授的团队吸纳了不同方向的人才，将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连通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新药产业链。同时，他希望发挥交叉学科优势，将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成果积极引入日常研究中，联合医院及医药公司，就神经精神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靶向药物展开开发和研究工作，多方力量融合，让生物医学研究落地，真正惠及普通大众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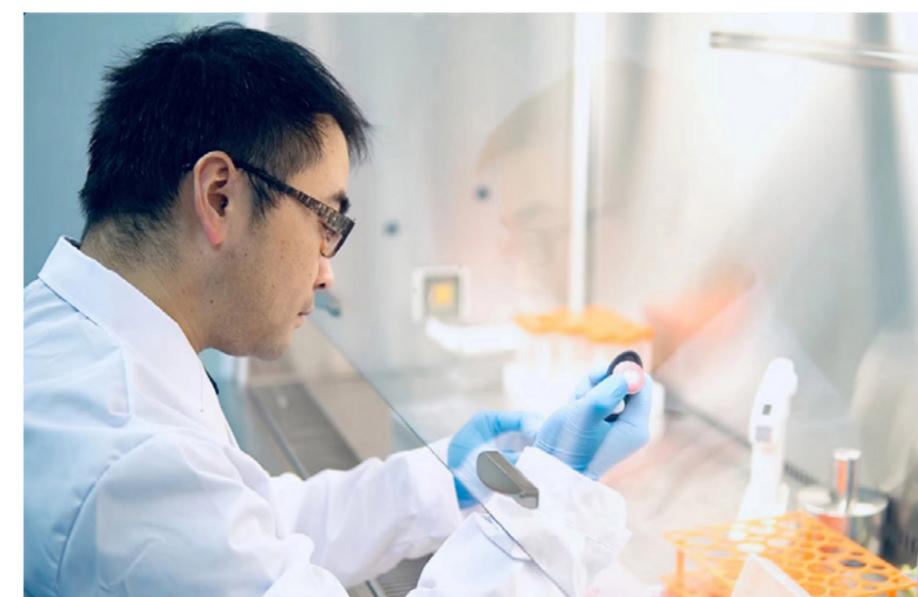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图片来源: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392-023-01427-2>)

宏观视角看结构生物学：未来可期

自从 2000 年 GPCR 的第一个结构正式确定后，有关 GPCR 的论文数量飞速增长，它所在的生物学分支结构生物学也迎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在结构生物学成果飞速涌现的同时，质疑也随之而来。由于蛋白质种类众多，每解析一种蛋白质结构就能有相应的科研成果产出，这容易将结构生物学的研究引向求“量”不求“质”的误区。因此，业内一些声音认为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虽数量众多，但含金量较低。面对这样的质疑，杜洋教授认为，在评价某一科学领域的贡献时，应该去关注这个领域内最卓越的科研成果。结构生物学领域内顶尖的科研成果多次被发表在顶级期刊上，足见其研究成果的分量。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人们倾向于选择越来越精细的研究方向，故而容易对其他方向的研究工作产生一定的误解，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在真正的科研中，外界人云亦云的质疑和误解都不足以成为勇攀科学高峰路上的“拦路虎”。杜洋教授以自己的科研亲身经历表示，科学工作者最终仍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旦认定了科研的方向就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对其他生物学分支也具有启发意义，药学就是其中之一。对此，杜洋教授指出，结构生物学对关键分子的结构分析将对靶点药物研发提供指导。他率先构建出 G 蛋白偶联受体 / G 蛋白偶联受体激酶复合物的原子结构模型，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功能研究。相关成果不仅为阐明 G 蛋白偶联受体激酶的激活机制和如何与 G 蛋白偶联受体特异性相互作用的分子机理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也为接下来筛选 G 蛋白或抑制蛋白的偏向性激动剂等药物分子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指导。总而言之，结构生物学能够解释生物大分子的构象和相互作用的方式，而恰恰所有的生命活动都是通过各种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在生物学中，结构生物学依旧有一席之地。展望未来，随着 AI 等技术的发展，结构生物学或能从分析已知分子结构走向预测新发现分子的结构，在众多看似无序的分子构象中找出规律，为理解生命、提高生物学发现做出更长远的贡献。



杜洋教授在实验室。(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走进肿瘤与癌症的世界

—— 对话医学院陈卫教授

记者 / 窦涵慧

编辑 / 季伊忱 董楚珮

对于许多人来说，癌症就像熟悉的陌生人，许多人闻癌色变，也有许多人终其一生奔跑在探索癌症的道路上。癌症，短短两个字，有时却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全家的未来。癌症和肿瘤究竟是何方神圣？癌细胞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癌症治疗蕴藏着怎样的大智慧？有太多的谜团等待我们去探索。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医学院的陈卫教授带我们走进肿瘤与癌症的世界。



陈卫

陈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副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肿瘤发展中的遗传和表观遗传改变、肿瘤微环境对化疗耐药和转移进展的影响以及精准癌症医学。他的研究主要依托临床数据，结合细胞与动物模型，并配合生物信息学来破译肿瘤与癌细胞在转移进展中的代谢信号通路。在近期研究中，他希望通过基于纳米的药物递送，类器官药物筛选系统和基因组分析，提升个体化抗癌疗法的效果。陈卫教授在国际医学杂志发表 78 篇论文，被引用量达万余次。陈卫教授现担任多本国际一流医学杂志的副主编和客座主编，如 *Journal of Ovarian Research*,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等；其研究成果也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学术合作以及药厂的资金支持。



陈卫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摄影 / 陈鸣

一、肿瘤和癌症的秘密

初窥肿瘤产生诱因：被打破的“阴阳平衡”

肿瘤是组织的异常生长或肿块，也称为肿块、病变或肿瘤。癌症是一组由异常细胞不受控生长和扩散引起的疾病。癌症与肿瘤并非凭空产生，也非一日之变。我们体内存在致癌基因（oncogene）和抑癌基因（tumor suppressor gene）。致癌基因会促进细胞的生长，当细胞生长到一定阶段时，抑癌基因就会发挥作用，压制细胞的过度生长。正常情况下，致癌基因与抑癌基因对于细胞的作用处于平衡协调的状态，就好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抑癌基因被抑制，致癌基因过度表达，二者的失衡，加上其他遗传和表观遗传异常改变的积累，就有可能引发肿瘤和癌症。陈卫教授说道：“肿瘤细胞初期的生长往往难以察觉，一般情况下，当人们发现异样时，肿瘤可能已经成为不受控制生长和扩散的癌症，甚至已经发展到中后期。实际上，肿瘤与癌症的初期生长源于体细胞内基因的变化，在这一点，这两者非常类似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平衡’。”

癌症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能是遗传因素，也可能是由外界环境刺激导致。陈卫教授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来向我们介绍遗传因素的作用：“如果从父母那里继承了 BRCA1 或 BRCA2 有害变异，那么孩子一生患乳腺癌和 / 或卵巢癌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

而外界刺激则包含很多方面，比如说放射性物质的刺激。以福岛核废水排放为例，放射性物质会在海洋生物体内聚集，人体食用之后，由于生物放大的影响，放射性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将会成倍上升，容易破坏基因，降低基因的稳定性，打破致癌、抑癌基因的“阴阳”平衡。若基因变异大量累积，就会诱发癌症，这也是福岛核废水排放遭到反对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病毒感染也会带来影响。HTLV-1 病毒通过受感染的体液传播，包括血液、母乳和精液，患者再感染该病毒后会诱发 T 细胞白血病或是淋巴瘤。人体感染乙型肝炎（HBV）后，如果病毒未及時清除，肝细胞就将变为癌细胞，诱发肝硬化甚至肝癌。

再探肿瘤发展历程：肆无忌惮的“甜食爱好者”

肿瘤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肿瘤的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会产生一系列变化，外部也会受到影响。从良性肿瘤谈起，癌细胞迅速分裂生长时，薄薄的上皮细胞会迅速堆叠，逐渐累积，最终形成一个瘤，这就是上皮细胞变异导致的良性肿瘤。良性肿瘤的外部有一层膜包裹，癌细胞并不会生长至突破膜的大小，这层膜会限制肿瘤，使其不侵入周围的正常组织，也不扩散到远处的身体部位，这时的肿瘤易于通过手术摘除，危险性较小。一旦这层膜破裂，癌细胞会躲过免疫系统的“检查”，“逃”进循环系统，侵入周围的正常组织并通过循环以及淋巴系统扩散到全身，到达远端的器官或组织，然后定植（colonization），形成新的肿瘤，这就是癌细胞转移（metastasis）。很多时候，癌症引起的死亡是癌症转移导致，而不是因为原发肿瘤。

“癌细胞是非常聪明的，理论上讲，癌细胞脱离实体瘤后便会死亡，也就是失巢凋亡现象（anoikis），但在肿瘤的生长、发展和恶化过程中，癌细胞也会通过进化提升自身的生存能力。”陈卫教授举了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如果一名学生现在不做任何准备出国读书，他将很难适应国外的生活，但如果他提前做好准备，积极适应，他在国外也依旧可以生活得很好。”癌细胞就是这样一位主动适应、提前准备的“留学生”。肿瘤初期，生长发展过程都由基因主导，基因大量变异并不断累积。当肿瘤持续恶化，原先由基因主导的生长会转为由甲基化（methylation）主导。若转变发生，由于甲基化修饰，部分抑癌基因将难以表达，致癌、抑癌基因的“阴阳平衡”将被打破。这时，致癌基因“占据上风”，会让癌细胞逃离实体瘤的能力提高，并且不会再因为失巢凋亡而死亡。同时，癌细胞的适应以及生存能力也会提高，它们变得能适应不同的肿瘤微环境，也能通过限制抗原识别、抑制免疫系统和诱导 T 细胞耗竭来逃避免疫监视，而且会继续转移至其他远程器官与组织，定植形成新的肿瘤。

除了内部的变化，肿瘤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肿瘤的生存和人一样，需要大量的能量，而最易得到的能量就是葡萄糖，所以我们说癌细胞是 sugar lover——甜食爱好者。”癌细胞“很能吃”，也很喜欢抢夺其他体细胞的“食物”，它们会抢夺正常体细胞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葡萄糖，也会抢夺氨基酸和脂肪等“生存必需品”，让正常体细胞难以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器官与组织的功能，病人可能会因此产生消瘦、食欲减退或肌肉萎缩的症状，甚至会器官衰竭。陈卫教授说道：“癌细胞增殖速度非常快，对‘食物’的需求量大，因此需要有足够多的血管运输促进肿瘤生长。所以在肿瘤的发展过程中，与肿瘤相关的毛细血管网络会大量增生（angiogenesis），不仅供给肿瘤表面的癌细胞，还会深入肿瘤内部，支持肿瘤块的快速生长。”

简析肿瘤治疗方式：对抗肿瘤，一直在路上

初期的肿瘤大概率可以靠切除的方式治愈，比如说皮肤癌（melanoma），初期未转移的时候会在皮肤上呈现黑色颗粒，及时发现并切除即可。癌症发展到中后期时，由于癌细胞大量转移，切除肿瘤已经无济于事，这时候通常就会采用化疗（chemotherapy）和放疗（radiotherapy）配合治疗。放疗和化疗的应用场景略有不同。放疗的范围更小、更集中。一般来说，遇到肿瘤过大难以切除的情况，需要先通过放疗将肿瘤收缩，然后再进行切除手术。肿瘤处于刚开始扩散的阶段，也可以通过放疗将周围的细胞清除，降低扩散可能。肿瘤转移范围较大时就需要采用化疗，不过化疗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化疗针对癌细胞的某些特征进行清除，但癌细胞的某些特征与正常细胞类似，因此在化疗的过程中，许多正常体细胞也势必遭到伤害。陈卫教授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有些化疗药物针对的是癌细胞的快速增生能力，但红细胞、头皮细胞也有类似的能力，他们的增殖能力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病人也因此会出现贫血、抵抗力下降、脱发等问题。

除了切除、化疗以及放疗之外，近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治疗癌症的方法。最典型的是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目前医院常用的抗体治疗就是其中的一种。免疫疗法与抗原抗体反应有关。我们体内的抗原抗体反应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当我们向体内注入抗体时，抗体会与癌细胞上的一些受体结合，从而阻碍这些受体与肿瘤微环境中的趋化因子等物质结合，降低癌细胞的生存能力，同时抑制致癌基因的表达，最终达到抑制癌症发展的效果。

激素治疗（hormonal therapy）也是治疗癌症的方法，适用于对激素敏感的癌症，比如前列腺癌、乳腺癌等。男性或女性的激素会刺激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所以当我们注入抗激素的药物，癌细胞就会因为失去促进生长的刺激而慢慢衰减死亡。

目前，许多实验室正在尝试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嵌合抗原受体（CAR）T 细胞疗法（CAR T-cell therapies）或靶向治疗（targeted therapy）。理论上讲，这种新型癌症治疗方式不仅可以治疗实体瘤，还可以治疗非实体瘤。运用此种方法时，会通过抽血将患者体内的 T 细胞抽出，进行基因改造后再将其培养，最后注入患者体内。改造后的 T 细胞可以识别出癌细胞并将其消灭。目前已经证明针对 CD19 的 CAR T 细胞疗法对患者非常有效，而且已经应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可这种靶向治疗在实体瘤治疗方面仍有困难，因为实体瘤的微环境会影响改造后的 T 细胞的活性，即使 T 细胞已经过改造，进入实体瘤的微环境后也会受到抑制，再加上 T 细胞本来就难以通过血液系统穿透肿瘤组织，这些因素都会降低改造后 T 细胞的抗肿瘤能力。

二、走进陈卫教授的科研世界

浅谈研究思路与科研进程：探究卵巢癌细胞转移前信号的本质以及传导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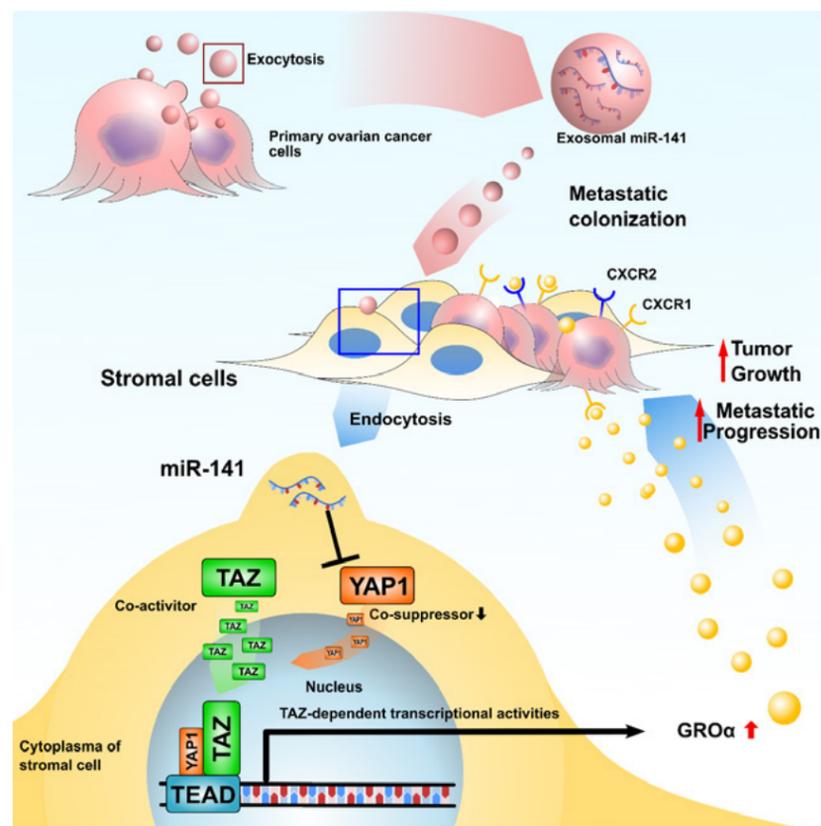
陈卫教授的科研聚焦于卵巢癌细胞转移前信号的本质以及传导路径，而支持他进行该领域研究的基础性假说，是 Stephen Paget 在 1889 年提出的假设，Stephen Paget 曾经讲过，我们可以将癌细胞当作是种子，而转移前远端器官的条件可以被视为土壤，癌细胞的转移就好比将种子种入土壤，癌细胞的成功转移定植需要合适的转移前微环境。最近的许多研究也都支持了这一观点，也就是说，癌症转移是带有目的性的，非随机的，所有转移性癌细胞都具有“器官向性”或“器官特异性转移”（Metastasis Organotropism）。不同的癌症类型和亚型表现出不同的器官趋向性。例如，前列腺癌优选在骨中复发，而黑色素瘤通常在肝脏中定植。器官向性受多种因素调节，影响因素包括循环模式、肿瘤内在因素、器官特异性生态位以及肿瘤细胞与宿主微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等。肿瘤-基质相互作用尤为重要，这种细胞间通信可产生生长因子、致癌细胞因子和其他因子，从而形成适合癌细胞定植并生成肿瘤的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转移前生态位（premetastatic niche），Stephen Paget 口中的土壤。如果我们了解细胞间通信的确切途径，我们就可以干扰它们并阻止癌症转移的发生。

由于癌症转移具有器官向性，我们假设癌细胞转移至远程器官之前，需要向远程器官细胞组织发送信号，远程器官在接收到信号后，会建成更适合癌细胞定植的环境以供其生存。陈卫教授说：“探究卵巢癌细胞转移前信号的本质以及传导路径，就是我们此次科研想要了解的。”陈卫教授和他的团队在研究的过程中首次发现了 miR-141，这是一种被细胞外囊泡包裹的 miRNA（MicroRNA），它可以作为通信信号影响卵巢癌细胞转移定植前远端器官与组织的环境。外泌体 miR-141 不仅能做到细胞间的信息交流，当它进入基质成纤维细胞时，也可以压制 YAP-1 基

因的表达，导致一些趋化因子的表达上升，比如 GRO- α （一种常见于肿瘤微环境中的致癌趋化因子）。这种 GRO- α 趋化因子将从 miR-141 重编程的基质成纤维细胞中分泌，通过与卵巢癌细胞的 CXCR1/2 受体结合，刺激卵巢癌细胞，加快肿瘤生长、提升侵袭性、促进转移的进行。

“我们通过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和条件基因敲除技术 (Conditional gene knockout)，分别在人类卵巢癌细胞和小鼠模型进行大量生化和功能研究，证明 miR-141 是否可以抑制 YAP-1 表达，进而提高 GRO- α 表达并最终促进癌症转移，再以临床的样本来确定结果的可靠性。临床样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实验室中的结果，却没有有效的临床相关性，这项研究的意义就非常有限。我们通过比较癌症患者和健

康人群的组织切片、蛋白质以及基因和 miRNA 的表达，发现临床样本得到的结果与我们在实验室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陈卫教授和他的团队进一步在小鼠身上用 CRISPR 技术，在 ID8（小鼠的卵巢癌细胞）上敲除 CXCR1/2 受体基因，然后再注入至有 YAP-1 基因敲除小鼠的腹腔，模拟人的卵巢癌细胞转移至腹腔，通过荧光标记观察卵巢癌细胞在实验组与对照组小鼠的转移与生长情况。通过实验发现，敲除 YAP-1 基因的小鼠腹腔卵巢癌肿瘤生长与转移的发展会非常迅速。相反，CXCR1/2 受体基因的缺失导致 ID8 小鼠卵巢癌细胞在 YAP-1 敲除小鼠中的肿瘤生长和转移显著减少，从而证明先前所假设的一系列传导路径是正确的。



miR-141 的信号传导路径。（图片选自陈卫教授论文 Mo, Y., Leung, LL, Mak, C.S.L et al. Tumor-secreted exosomal miR-141 activates tumor-stroma interactions and controls premetastatic niche formation in ovarian cancer metastasis. Mol Cancer 22, 4 (2023). <https://doi.org/10.1186/s12943-022-01703-9>)

癌症研究，为你我为大家

陈卫教授的研究探索了肿瘤基质间相互作用的运作机制，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控制基质的重编程。他的研究也为卵巢癌转移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癌症治疗时可以通过阻碍该通路中的某个物质的功能，让癌细胞难以正常转移、定植与生长，从而达成控制癌症发展的目的。陈卫教授将会进一步深入研究，希望可以探索和发掘新物质，降低外泌体 miR-141 的存在，使用 Hippo 抑制剂药物提升 YAP-1 基因的表达，降低 GRO- α 肿瘤微环境中的浓度，或者用 CXCR1/2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阻碍或者抑制受 GRO- α 的诱导。这些方法从理论上讲都是可行的，但陈卫教授也谈到，按照目前的技术来看，有些设想难以实现，有些仍需要深入探索。这条路径是否适用于别的癌症，目前也不得而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减少传统化疗以及放疗的副作用，陈卫教授另一个深入研究的重点是开发靶向治疗 (targeted therapy)。靶向治疗通过使用药物或其他物质来精确识别、攻击特定类型的癌细胞，在治疗过程中不会对正常细胞造成损害。靶向治疗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其他治疗方式进行配

合，例如配合化疗、手术或放疗一起发挥作用。

另外，在癌症治疗领域，目前很多实验室、制药公司与医院正在发展精准医疗，制定个性化和靶向癌症的治疗方案。陈卫教授补充道：“因为每个病人的情况不同，不同治疗方法的效果也不同，个性化诊疗可以最大程度提高治疗的有效性，这种诊疗模式也会成为未来肿瘤与癌症治疗领域的发展趋势。”

最后，陈卫教授也介绍了未来癌症研究的热点和思路，他谈到：“在癌症诊断方面，目前的研究热点就是生物标志物的发现与应用。”生物标志物标记着癌细胞不同于正常细胞的一些表现，在癌症初期，症状不明显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尽可能地帮助人们防患于未然。虽然目前在实验室中已经发现了许多理论上可行的生物标志物，但是应用到临床阶段还需要时间。陈卫教授说道：“当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临床运用这些标记物，我们的研究重点是找到合适的方法，高效、便捷且实惠地为每个人进行癌症筛查。”



陈卫教授与《神仙湖畔》学生记者合影。摄影 / 陈鸣

**Sharing
and
exchange
of ideas**

演 讲

分享观点 碰撞思想

SPEECHES



Keep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what's going on



Professor James J. Heckman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n 2000

Professor James J. Heckman,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in the year 2000, Henry Schultz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welcome, and I'm very grateful to be here today and participate in this great ceremony and very distinguished body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assembled here today.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all on the honor of graduating from a first-rate university that's been built in a very rapid period of time, a first-rate faculty and a student body. And it's kind of a miracle, but it's a miracle that has been realized. Its growth and its excellence is one of many aspects of China that I really admire.

China rewards merit and achievement, and I commend you for advancing that goal. Your emphasis on merit and excellence is to me and to many Americans a welcome contrast to various attacks that have appeared around the world against merit and meritocracy. And I think increasingly there has been a sense in which achieving excellence and striving for the best has not been receiving the attention that it adequately deserves. And I think we are really,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in a country and in a university where merit is encouraged. And young scholars are encouraged to do their best. And young graduates go forward and do work that is encouraging them to work at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the highest good.

As you're leaving CUHK-Shenzhen, I'm coming here myself, actually, in order to work with your first-rate group of scholars in AI, machine learning,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economics. Together we will create a body of research that will aid China in facing its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today I want to discuss some of that work in a sense that giving you a more or less emission to go forward and think about what problems you can address as you leave this university.

One thing we know for sure, there's been a lot of discussion about AI, machin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 lot has recently been written

by people like Stephen Hawking, Elon Musk, Roger Penrose, and many others, saying that we should fear these advances. This dystopian view of machines is that machines will outsmart us and eventually control us, I think is not well-founded. I think that we have much promise here. And the AI holds many promise that any peril that it might pose can be countered unless we blindly abdicate our responsibility and leave all of us in the world.

Well, you have a distinguished AI group and other groups as well. Why I come here is that I hope to learn from you, and many others plan to learn from you as well and benefit from your knowledge. And there's a larger problem that you're going to face as you leave this university and go out into the world. You're going to see this in the businesses,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face China and the world going forward.

One of the most substanti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is the aging of populations. Many people here in China will blame the one-child policy. But a lot of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one-child policy, while it played a role, it far from the major role. Fertility and the onset of family life is a matter of growth of a modern economy. It's a consequence of the revolution that gave equal status to women, the fact that education was so actively encouraged that both men and women became educated and created a new pattern to family life. It makes childbearing more expensive and creates something that economists call opportunity costs of time, as well as things like the cost of housing. As wealthy people gain wealth, they go into the world. So we know that China will need to replace bodies with brains, and that going forward, as China supports itself, and you're part of those brains going forward to that world. And so what's happening now, and you represent that gap, that there are efforts to do so, to raise the skill level and to advance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to the highest levels.

We also know that China is facing and is starting to eliminate rural-urban gap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re's more opportunity, and more people around all of China are receiving the access to the support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modern state.

But I think one thing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nd why I'm actually here and what's exciting as a research and policy opportunity is that China is exploring a new way to close the traditional rural-urban gap. And that's actually why I'm here. Sounds like I'm talking about AI and other things, but I'm really, really talking about this.

We know, and there's much discussed about the children who are left behind when parents migrate east. And we know that children who are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frequently will suffer developmental problems. And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that shows that to be true. But the research and child development shows, in fact, those early years when parents are away are sometime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lives of children.

And programs based on this knowledge are beginning to be implemented on a wide scale in China. It's very important, though, as we leave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ith the bricks and the mortar, that we understand that those kinds of education—education is only part of a lecture, only part of bricks and mortar and books and textbooks and lectures in the normal sense. These programs that are being implemented, these policies that are being implemented around the country, but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areas, are based not on schools in the conventional way, but in teaching, not lecturing or teaching, but engaging young children and in scaffolding. Research over the past 50 years has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scaffolding, understanding where a child is, where a student is, and taking him or her to the next stage, but

in gentle steps. This knowledge is based on a new foundation of science, based on psychology, economics, neurosci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human beings develop.

In China, a program, a very innovative program, has been adapted called China Reach. It comes from the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China Reach shows the value of application of adaptiv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ethod to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And so what's being developed here and what's being developed in these programs is algorithms and child development to teach a version of what's like personalized medicine, but it's personalized education. And a large body of work shows that this kind of personalized approach is extraordinarily effective.

Now there's a temptation that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policymaker has, and that's being resisted here in China when I really commend it. And that is to say, okay, we know there's a problem, we might wanna worry about the early years of children, but we might wanna take an existing program off the shelf. But if we do that and apply it to China, and especially to rural China, what we're doing is finding it's very costly and may be very inefficient, require an infrastructure that's not there.

But what we can do and what we understand is that we can adapt the essential ingredients of these programs that are successful. And we can use low-cost methods. We strip away a lot of the elaborate discussion to see what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abou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whether it's in schools, whether it's in the workplace, whether it's for little children. Namely, it's the engagement of the teacher, the caregiver, the parent in the lives of children, and fostering those child-parent interactions plays a huge role in a way that we're just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And it's

possible to implement those programs at about 5% of the cost of the established programs that many people want to take off the shelf. So our understanding of which aspects of these interactions are most successful is just beginning to be formulated. It sounds like this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know.

And I know that many people like to think, "Well, you're finished your degree and you should be warned that there is a rule that frequently many of you will not learn anything after you graduate here." The view is whatever you learned in college is what you stay 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but I would say that's a bad policy, and I think what you want to do is stay tuned for this work.

So why I'm here is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we can improve this process using technology, using new measurement algorithms, and using what sometimes engineers would call adaptive control. To essentially, even though it looks like this is not a machine, it's in a human interaction setting. And understanding those interactions is really essential to providing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foster children and even trainees in the workplace.

So the goal is here, and you will participate in this in various ways, to build the skills in children and parenting skills before they enter school. And what we're going to understand here is really understanding a fundamental part, which is ancient. Parents and family life are enshrined in virtually every major religion, but what we've really come to understand is there better and worse ways. There are signals that we can send and not.

So I welcome all of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xciting research and to follow the research as it unfolds her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But even if you don't directly participate, I think you should be proud that your alma mater is doing basic research and that you can be proud that what it's doing will have substantial benefit to the Chinese nation and will. In addition to having strong policy components, create new world knowledge. This university and work in this area of understanding how children and parents and caregivers and children interact will be in the forefront of social policy and a pioneer in the science of human development.

So I wish you all good work and good luck as you go forward, but I ask you all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hat's going on and ask in what way you might want to participate in this kind of agenda.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and good luck going forward.



Spotlight on youth

主题报道

聚焦青年话题 洞察青年思想

FEATURES



流动 Flowing

在近一个世纪里，全球流动大大增强，成为贯穿当今社会的新时代精神，流动性正是对这一流动实践渐强过程现象的概念化界定。流动性的社会允许置身其中的个体享有充分的自由，身体、审美、思维、意志都不必遵循单一的标准。这一地理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之间与城市内部日常生活的尺度上。原本相对稳定与均质的地方由此成为多重网络交织之中的具体联系点，处在与“他者”的身份和文化不断协商博弈的过程之中，允许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不同主体之间的聚合离散，在相互交流中碰撞产生新的意义。

2019 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公众生活陷入暂停状态，流动的世界由此停滞不前。而步入后疫情时代后，我们发现流动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涵，其外延更为多面与立体。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着个体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我们从旅游、留学、城市地方、社会创新和文艺创作等多方面进行了关于流动性的探讨。主体通过地理流动获得了怎样的体验，建构了怎样的主体意义？承载流动的物质空间景观又被怎样形塑？流动意志与自由精神又具有怎样的社会文化内涵？我们期于在流动性的场域下进行一场跨学科的思想对话，共同解读“流动性的社会”与“流动性的现代性”。

搭乘文明的诺亚方舟，我们相聚，离别，在流动的生命中一起狂欢或沉默。生命在流动中彰显其意义，流动亦在生命中抵达新的可能。

——主编 罗雯静

Flowing Map

流动地图

美国 罗切斯特
范凯翔

冰岛
宋蔚然

丹麦 哥本哈根
高逸

美国 耶鲁大学
谭芷韵
Yale is at once a tradition, a company of scholars and a society of friends. "So happy to meet people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such an inclusive university! Hope to explore more in this special journey!"

法国 巴黎王子公园球场
胡晨璐

美国 格里菲斯天文台
张馨月

美国 洛杉矶
Yingxuan Bian
摇滚不分年龄性别
童真不论年龄地点

中国 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学天人合一处
体悟当下的力量

日本
马浩文

日本
林雅昕

中国 香港
唐俊荣
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

柬埔寨
Wu mei
旅行亦是修行
风景即为心境

马来西亚 槟城
金珠淇

新西兰
周艺璇

Part 01

流动中的见闻

“人永远无法踏进同一条河流”，当赫拉克利特说出这句话时，他仿佛在为数千年的人类文明作一条历久弥真的概括。时代、社会、山水、你我，一切都处于永恒的流动与变化中。人们被赋予流动的天性，也正是流动使人拓宽见闻、带来交互。在流动中适应，在流动中学习，在流动中成长，个体修炼成“完人”的路径上，流动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灵魂器官。

流动日志：从象牙塔流向全世界

—— 交流交换同学专访

记者 / 尹敏娜 祝一寒
主编 / 祝一寒

当春的暖阳将疫情冰释，每个求索人生的我们都像一滴水，随涟漪向四方自由地流动。形势的调整将国界的壁垒削弱，交流交换的热潮也旋即再度兴起。这个春季学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同学们在世界各国的名校和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他们流动到哪里？人们在流动中见到什么、收获什么，成为我们聚焦的话题。

本期刊物，我们便有幸邀请到了 4 位出国交换的同学，向我们分别介绍他们在大洋洲、美洲、欧洲的交流经历与流动见闻。

新西兰：去过一种不同于繁华都市的生活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新西兰作为游学地点时，周艺璇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是第一次去到这个国家。之所以选择新西兰，是因为高中时曾到美国纽约交换学习了几个月，已经体验过美国那种繁华大都市的学习环境，所以我这次就想体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听说新西兰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因此想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学习环境、人们的生活态度。”

在新西兰生活了将近 4 个月的时间，周艺璇认为这里同她来时所期想的一样安静而悠然。学校里满眼青葱，午时阳光正好，和结识的朋友们相聚草地，听音乐、晒太阳、共饮畅聊。课业不忙时，就在城市周围的 walkway 散步，或者去 hiking。假期则约上三两好友，自驾环游附近的城市，逛公园、海边或沙滩。周艺璇回忆道，最难忘的经历是在皇后镇追逐极光。彼时恰好是半夜时分，和朋友们一起坐在车顶，裹着厚厚的大棉袄，又罩上两层被子，仍被冻得瑟瑟发抖。

四面本来一片漆黑，忽一抬头，大家一齐看到绚烂的极光慢慢浮现在黑夜的幕布上，而距离它上一次出现已经过了 6 年。没有人说任何话，大家只是静默地欣赏眼前的景色，仿佛融进极光与黑夜之中。

在这数月的全新生活中，跨文化思想的碰撞、人文的交流、生命的重定义，对于周艺璇而言，她所学到的，远不止课堂的知识教育和一路的旖丽风光。



周艺璇个人照片。

尊重跨文化差异：成为世界公民的第一步

在求学的漫漫道路上，跨国交换生们短暂地“流动”到另一国家、另一文化中，为他们将来成为“世界公民”作准备。在流动中，如何应对跨文化差异呢？周艺璇的答案是尊重。

来到新西兰哈密尔顿的怀卡托大学游学，它有个令人瞩目的特征——全新西兰最高的毛利学生比例，学校也开设和组建了相关的毛利文化的课程和社团。对于毛利文化，她分享道：“学校设置了许多宣传毛利文化的节日，如开学的时候有很多本地学生一起表演了毛利战舞。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了解到他们的文化习俗。有一次我和几个亚洲留学生一起吃饭，一个新加坡的女孩子在室内戴了一顶帽子。旁边的毛利同学就请问她是否能把帽子摘下来。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他们的文化里，室内戴帽子是一件不太吉祥的事情。作为外地学生，我认为学会尊重文化差异、入乡随俗尤为重要。”

更密切的人际关系，更多元的人生选择

更密切的人际关系和多元化的人生选择是新西兰留给周艺璇印象最深刻的文化特色。

周艺璇笑着提到，起初，她来到新西兰后在人际社交方面较为不适应：“在国内，大家都是‘mind your own business’，希望人际之间的交往界线稍微分明一些。而在新西兰这边，大家都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密切而真实的联结，走在路上迎面撞见一个陌生人，他们也会微笑着跟你说‘hey, how are you’‘good morning’之类的话。”

面对与原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人际交往方式，周艺璇选择更为积极主动地去拥抱、去融入：“一开始还是会感到有点尴尬。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美国人，我们（一些相互认识的中国交换生）完全不认识他，他就直接坐到我们对面说‘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guys?’。虽然那顿饭我‘被迫’全程讲了半小时英语，但回想起

来还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也不断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了解很多不同的文化。我也尝试着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跟别人建立联系，在这边变得更加 sociable 一些。”

同时，相比于国内人生应当遵循既定套路的传统，周艺璇非常欣赏新西兰社会氛围对于个体多元化的人生选择的包容性。

“我发现这边很不一样。除了学习，这边的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喜欢把时间花在培养各种兴趣爱好和体育运动上。新西兰整体的学习压力不是很大，每学期最多只能修4门课，有的学生还只修3门，我知道时是非常震惊的。在大学的课堂里，我有遇到过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她决定再回到大学里来学习。还有在英语文学课上，有一个看起来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她来旁听这个课程。”

所以在新西兰，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人生选择，社会不太会对你作出过分苛刻的评判。当地年轻人站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往往也显得更为从容，呈现出更为多元的人生选择。”

人生不受限

对于周艺璇来说，游学、流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可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交友、旅行，更重要的是看到，来自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人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做选择的方式。流动的过程如同穿梭于生活的隧道，走向尽头，便能发现群山千里，“人生是旷野”。

尽管她的游学生活即将接近尾声，但新西兰的草地蓝天、陌生人的温暖关怀和遵从内心的坚定勇气会一直陪伴并鼓舞着她往后的生活。在此，周艺璇想把她在游学中的最大收获化成一句话分享给大家——

“不要担心别人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听从自己的内心，然后去追求你真正热爱的东西。我们的人生不受限。”



新西兰自然风光。周艺璇 / 摄

美国：流动于矛盾间

当我说：“你似乎提到了很多次轻松、包容这类词”，我们俩都笑了。然而事实是，在罗切斯特（University of Rochester）游学的日子里，范凯翔的学习生活十分忙碌紧张，他也在美国的多元文化中体验到了“文化他者”的存在。

轻松与忙碌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罗切斯特大学学生的状态，他们应是“轻松地忙碌着”。

当问及校园生活的变化时，范凯翔分享道：“跟国内课余生活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课余时间变少了。罗切斯特大学作业布置得很多，课程安排特别紧，从第一周开始到期末考试和论文上交完中间基本没有什么空闲时间，整体来说是一种持续性比较高压的学习。”

范凯翔又补充道，“在罗切斯特大学，学习上的高压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在紧迫的时间下，学生的精神世界仍然十分富足。大家学习十分纯粹，无论学还是不学，都不太在乎绩点。那些所谓的“卷王”更多的是认真投入于自己真正热爱的专业知识和领域研究的学生。对学习没什么兴趣的同学，也会通过参加其他活动来充实自我，有些同学甚至会经营一些小生意，比如通过自动贩售机赚钱。”

罗切斯特的课程设置亦是如此。范凯翔表示，教授的课程更偏向于“无用之用”：“老师往往不会真的教给你一个可以常用到实践中的理论或者处理什么特定问题的方法。而且老师讲得很少，大多数时候是同学们在自由讨论——那里的学习大多通过讨论构建出来。”

“在美国，大家都很轻松自如，学习的时候不会火急火燎，也不会抱有一种一定要快点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获得如何的成绩的观念。大家学得都很随性，也很符合他们随性自由的文化氛围。”

这种轻松自由的氛围同样出现在日常生活里，范凯翔提到：“美国人在文化上比较随性，对于很多事情不是很在意。举个非常细节的例子，

上课的时候可能有同学就会把鞋子脱掉，直接盘着腿坐到椅子上。在中国，这显得匪夷所思。但在美国，大家都习以为常。”

“我还欣赏过一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展示自己家乡文化的表演。当时我看到有一群印度同学在跳印度舞，虽然我是一个外行人，但还是能看出来他们跳得并不完美。大家准备的节目其实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大家凑在一块儿一起联欢的感觉和国内还是蛮不一样的。港中深的很多活动，即便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表演，大家都会追求完美。但在美国，大家就很轻松，只是凑在一起开心，并没有太多压力。”范凯翔说。

文化多元与文化他者

在范凯翔眼中，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文化应是非常丰富、多元的，而游学的经历也验证了他的这一印象。因为文化多元，美国社会的大氛围呈现出“包容”的价值取向。

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美国称呼中对性别取向的弱化。“大家都习惯自称‘they’或者‘them’。自我介绍的时候老师会问你的‘pronouns’（代词）是什么。一般来说，中国同学可能会说‘he’或者‘him’，和‘she’或者‘her’。但本土同学都会尽可能提倡大家去使用‘they’或者‘them’，因为可以包容所有性别认同。”

在罗切斯特大学一门关于“中国现当代社会”的课程中，他也同样感受到“包容”“不妄加评判”的学术氛围。“我当时修这门课的初衷是了解一下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如何探讨我们中国现当代社会和分析问题。但其实我并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的答案。因为老师只是摆出一些客观事实和各地的观点，然后让大家讨论解决办法或者发展趋势。整体来说，这门课相当客观，给我一种非常学术的氛围，它不会给你任何答案，只会引导你一起参与讨论。”范凯翔说。



范凯翔个人照片。

虽然范凯翔没能得到具体的答案，但这种治学方式在他看来本身就是一种答案——罗切斯特大学不会对一个观念不同的国家进行任何定性，他们会去探讨，而不是想要一个判断性的回答。这是这里很普遍的学术氛围，甚至可以说是社会氛围。

纵使美国的文化氛围十分包容，但是包容并不意味着融入，范凯翔在与同学的交流和自身体验中也发现了“文化他者”的存在。他提到：“其实，这4个月我没有完全融入到当地的文化氛围中。大家在观念上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平时社交活动也不同。比如美国同学的社交多数是外出活动、开 party，很少参加现在中国年轻人比较流行的剧本杀、密室逃脱、团建等活动。”

范凯翔说：“我在美国那边的一个剧本杀社当主持人，认识了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即使是从小在美国长大，他跟当地的其他同学也有一定的文化差异，在交流、娱乐、日常社交方面其实也和当地美国人有所区别。”

由此看来，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讨论“流动”，“文化认同”和“文化他者”的观点成为十分重要的议题。在“世界文学与翻译”这门课上，范凯翔阅读并与同学讨论了 The Pachinko Parlor——一本关于居住在日本的朝鲜移民家庭的小说。以这本小说为起点，同学们的讨论让他得知了很多关于“文化他者”的故事。

“我们班上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背景的同学，在讨论这本书时，有一个美国同学是波兰移民，他讲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到了美国之后，会保留波兰的传统习惯。另一个同学，他的母亲是法国人，因此法语对他来说是第二母语。但由于从小在美国长大，他说的法语和法国人有些不同。在法国旅游期间，他同法国人说法语的时候，法国人却会用英语回复他。由此他感受到一种排斥——你说的不是纯正的法语，你也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我在那边交换，在美国文化当中也是‘他者’的身份。听了大家的分享，我感觉身边的同学们都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他者’。”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化，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种文化的“他者”。或许是因为文化差异难

以融入，或许是因为主流群体的有意排斥。在流动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面临孤独的境地。

去流动，认识这个世界

对于范凯翔来说，游学的意义是“去见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事情——总的来说就是增长见闻，更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

只有流动，我们才能确认：有些看似矛盾的东西，确实在另一个地方神奇地、真实地共存着。我们流动，我们收获更多元的人生，消除偏见、走向包容。我们便是这样流动于这个时代的锦绣文化间，在历经“他者”身份的孤独的同时，保有内心自我认知的一份坚定。



范凯翔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哥本哈根夜景。高逸 / 摄

欧陆：自然与人文的多元

（一）

在前往欧洲交换一个学期的生活中，高逸终于揭开了这片古老大陆的神秘面纱。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徜徉于哥特典雅的建筑，享受着温带海洋的微风，进行了一场贯通书本内外的深度学习。在高逸看来，此次游学也愈发验证了他心中对欧罗巴的印象——自由、丰富而多元。

在自由中求索学术之路

在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下文简称 CBS）做了一学期交换生的高逸，对学校课程的第一印象便是很高的自由度。“CBS 的课业负担整体偏小，不计平时成绩，只看最后的期末考试。这里的课程规划比较松散，教授也许会制定一个日程表，但不会对每节课的内容有明确的规划，而是更多地留足时间给学生，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思考或小组讨论，总体来说，CBS 的学习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除了课程内的自主探索之外，CBS 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课后学习的选择空间。在 CBS 校内，有很多学术性质的组织、活动，学生们可以自由

选择，这给高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我们的社团不同，这里的社团大多是专业性、学术性的。校内休闲娱乐方面的集体活动较少，更多的是开展各种各样的学术层面的研讨会、交流会，或组织参加社会中的专业比赛，注重学术上向外探索的过程。”

可见，CBS 的学生在课程内外都会有很多自主探索学术路径的机会。浓厚的学术氛围也始终氤氲于这座波罗的海上的悠久名校，向高逸娓娓道来沉淀其中的百年智慧。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丰富

走出校园，丹麦那独具欧洲特色的社会环境也让高逸深有体会。用他的话来说，丹麦作为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达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发达。在物质层面，充沛完善的基础设施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便利。“哥本哈根自身作为一个重要的沿海港口，承担着欧洲交通枢纽的角色。哥本哈根国际机场也是全欧洲最大的航空港。这里的地铁、道路交通也很便捷，是很多欧洲货物的运输中转点。可以说，我日常出行非常便利。”

高逸还了解到，丹麦目前主流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又以金融业、旅游业、基础制造业为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也正在转型中，整体的经济水平较高。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下，毫不逊色的是这里民众的素质。“丹麦的教育全部都是义务教育，对于所有公民免费，课程压力也很低，不会像国内一样‘内卷’。因为较高的教育水平，民众的文明水平和素质也很高，符合我之前对欧洲的一贯印象。”

流动于多元文化之间

舒适的学习节奏留给高逸充足的课余时间，而在这些时间里，高逸热衷于前往各地旅游，在流动中体会欧洲的多元文化。“哥本哈根城内的文化就十分多元，这里的城市设计讲究传统欧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并存。此外，由于丹麦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友好，这里还会过日本的樱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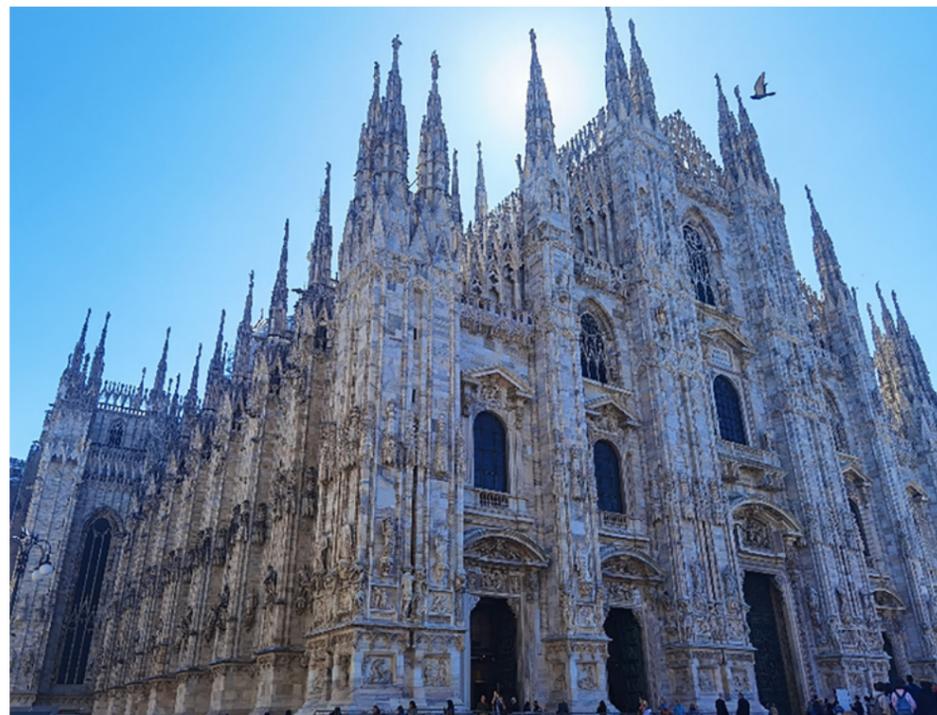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离开哥本哈根的倒数第二天，我去了郊外的路易斯安纳现代艺术(美术)馆，里面有很多的现代艺术绘画、摄影和装置艺术，也有日本的草间弥生、美国的安迪沃霍尔的作品。这个美术馆建在海边，甚至有路通向沙滩，景色非常漂亮。”

除了丹麦，高逸还在欧洲许多国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向北探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挪威特罗姆瑟的峡湾中观鲸鱼吞吐；又前往北极圈内的幽静部落，在驯鹿雪橇留痕的村庄里寻极光闪烁；还南下亚平宁半岛，在罗马、米兰、那不勒斯一众古城间品欧式生活；亦置身波罗的海的浅蓝水域，看北纬 50° 黄昏天际的姹紫鎏金。

流动于欧洲的一个个国度，体验种种文化生活，高逸在流动中拓宽了视野，也收获了满满的精神财富。采访的最后，问及他在流动中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他认为是“独立”。游历在异国他乡之间，高逸独立策划行程，解决旅途中的种种突发状况，在认识新文化的时候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作为留学生团体中一位比较“attentive”的成员，高逸在日常生活中细心地考虑各个方面，同时也担任起了旅行团队中的“大厨”角色，在

流动中培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也认为，只有在独立生活、独立思考中，青年学生才真正走出象牙塔，走出概念化的迷局，看见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世界。

学会独立，怀着一颗流动的心，即使踽踽独行，也能看到独属一个人的风景。



高逸摄于游米兰途中。



宋蔚然个人照片。



宋蔚然于法国。

(二)

和高逸一样，宋蔚然也在今年春季学期前往欧陆交换学习。游学于法国里昂商学院的她，在出发前就对这个雨果、大仲马笔下的浪漫国度充满了无限遐想。

初遇：刻板印象的冰释

“之所以会选择法国作为我的游学地，不仅是考虑到法国的商学院比较好，还因为我比较喜欢法国及欧洲的文化，想近距离接触一下。”来到里昂前，宋蔚然对这个以浪漫和艺术著称的高卢民族满怀期待，但同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担忧——在过往的印象里，法国人都带有几分高冷的贵族气质，也许会排斥非法语母语者。而这份担忧在她来到法兰西的一开始就烟消云散了。

“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法国人普遍非常热情，英语普及率也很高，很乐于和我们沟通。”宋蔚然还分享了一个暖心的小故事：“有一次我坐巴黎的公交车，刚好碰到街上罢工游行，公交车的线路有变。这时候司机讲起了法语，部分乘客也开始下车，我非常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身边一个带孩子的阿姨看出了我不是 local，于是就用英语给我解释了情况，帮我找到了下车的地点。”宋蔚然与法国初识不久，就被当地人民的友善所感动。原来，在法兰西街头石砖雨夜、冷光弥散的呼吸下，还藏着热情温暖的城市心跳。

渐识：生活节奏的共鸣

在宋蔚然看来，法国学习与生活的节奏和国内十分不同。就读于里昂商学院的她，发现校内的课程安排颇为独特。

“我们的课程安排很集中，一两周的时间里只会上一门课并直接把它学完，再去学下一门课。这样排课的效率会比较高，我们学得也更加轻松，但课程内容也会比较难深入。”她还提到，商学院校内课堂没有大型 lecture，主要以组织小组

讨论为主，鼓励同学们进行自主互动与探索。总的来说，在法国的学习节奏比较舒适轻松，也不失效率。

“我们的课余时间十分充足，我也用这些时间多旅游，更多地了解这里。”宋蔚然在课余时间游遍了法国境内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巴黎、里昂、圣埃蒂安，还造访过安纳西这种静卧于地中海沿岸的风情小镇。一路走来，她发现法国人的生活节奏普遍松弛，大家都会静下心来好好地面对生活、享受美好。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宋蔚然很快融入了法国的恬静与舒适，达到了生活节奏的共鸣。衣食起居方便、学习放松，一切都似乎超出了她原来的预期——除了当地令她大失所望的红酒烩牛肉。

流动：打破那堵墙

当问及这次游学的流动经历带给她的最大意义时，宋蔚然思考许久，给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打破那堵墙。

在欧洲，她发现人与人的精神距离被拉近了。文明间的隔膜变得若隐若现，各文化交流互通的感觉变得尤为明显。“去冰岛时，我们旅行团里有许多不同国籍的游客，起初大家都没什么交谈，但当我们打卡《权力的游戏》中的著名瀑布景点时，大家的共同话题就突然被它打开了。一下子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文化符号的共鸣，我们的距离就在这段旅行中被逐渐拉近了。”

的确，正如宋蔚然所说，我们面对陌生的国家、陌生的文化，都难免会对一个文明产生预先的设想与印象，形成一堵阻隔心灵的墙。而流动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打破这堵墙，通过物理距离的拉近，实现精神层面的沟通。文明之间并不全是头条报纸上的剑拔弩张，而更多的是一杯咖啡、一场畅聊的友好温情，在流动中，我们才能看到更真实的世界，了解更真实的“他们”。

于是我们发现，当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在误解中立起充满敌意的柏林墙时，唯有流动能打破那堵墙，沟通起东西灵魂。

流动札记 ——向东洋去

主编 / 祝一寒



富士雪山。滕云棋 / 摄

日本，一个神秘的东洋国度，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总是以独特的姿态吸引着人们造访。这个夏天，许多同学也选择向东而行，前往日本进行交流交换，体验不一样的流动生活。让我们打开他们笔下的札记，随文字领略他们眼中独特的日本印象。

(一)

守得云开见山明

撰文 / 滕云棋

“说实话，要见大山大河还是得回国，日本地方小，一点景色也能被列出来称为绝景……”

我昏昏沉沉地听着中日英粤语信手拈来的导游介绍，话锋一转，“不过富士山，确实值得一见。”

的确，完美的平缓坡度，半山腰的雪如肆意倾倒的奶油，山就在那里，美得摄人心魄。倘若有山神，必定也是绝色。

只可惜，一年大约只有 1/3 的时间，它才会露面。袅袅云彩总是伪装成它的头纱，使远道而来的游客扼腕叹息。最佳时机有三——春季，有雪；晴天，无雨；清晨，无云。我们到达的时间正是三月底春的某个晴天，樱花稍谢。跟团一日游赶不上清晨，只能在心里默默许愿，求山神风神赏脸。

早上 8 点从新宿站出发，大巴摇摇晃晃两个小时到达新仓山浅间公园。山下便见第一道鸟居，

步行半小时有余，登顶。此处原为赏樱与赏山的绝处，只是左处大片樱树已谢，亦不见远方的山，只剩右边五重塔鲜艳镇定。想必能远眺山的清晨该是极旷达的。不过当下人头攒动，各国语言杂糅，连拍照都嫌麻烦，转身回山下——吃冰淇淋。

最喜欢 gelato，日本格外便宜，比起中国的价格不止减半。这景区虽无，普通冰淇淋也还是有的，和街上价格并未有差——日本景点便是如此，不会过度开发，连带食物也不会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看不到山便看不到山，下一站去忍野八海。真是应了导游那句“小景色”，8 个池子罢了。池水湛蓝，大约由雪山水形成。绕着八个池子倒是不错的村落，餐厅与伴手礼店一应俱全，富士山形状的饼干也可爱得不行。

快到下午两点，终于来到奥特莱斯。点了长得像富士山的牛肉盖饭：烤牛肉竖着一片片叠在饭顶，中间汪着一个温泉蛋。我在脸颊上用眼线笔画了富士山，和室友开玩笑说想好了今天朋友圈文案“没有看到富士山，因为在我脸上”。看到了它的各种周边，却不见本尊，实在可惜。

就在奥特莱斯里胡乱晃悠时，忽然福至心灵

抬头看了山的位置：啊呀！云散掉大半了！

怎么也没想到下午能看到您露面啊。

于是，在露台上开始疯狂拍照。当真是一眼便能认出是“富士山”的富士山。特殊的广阔山脉，只露出微微一个白色尖尖，周边又无其他任何山体争艳，甚至连树都少有。一眼望去就让人心下轻喘：“呀，是富士山。”山脚大多坐落村庄，沉默地迎接山的豁然开朗。

又买了最喜欢的瑞士莲软心巧克力，挑拣些从未见过的口味，再买了哈根达斯冰淇淋边走边逛，其他品牌店倒是没见到什么心悅的物品，只能嘀嘀咕咕：“那些人怎么做到拎着大包小包出来的？！”

至日薄西山，抬眼间云竟已散尽，空留山体温柔柔站着，伴着几抹未来得及飘走的云，身侧金色缓缓落下。几株晚樱在视线里摇曳，又添了几分朦胧的日系风情。金球完全消失时，山后泛起一层晚霞，好似太阳碎成千万片只为一景。令人喘不过气。

心满意足地拍到了来日本后最满意的照片，看着集合时间一路奔跑，也不忘分神回头和山和云打招呼：谢谢啦，有机会再见。



黄昏云散。

(二)

善意的流动，在日本

撰文 / 马浩文

在日本，即使是东京这样忙忙碌碌的大城市，每天与成百上千的人擦肩而过，也总能遇到很多善意的瞬间，因为这里有着许多善良的人 and 心，他们不求回报地帮助别人，为力所能及的事情伸出援手；或者仅仅是礼貌而友善地对待每一个陌生人。

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去滑冰场忘记带外套，想问问前台能不能租衣服，前台小姐姐上下打量着我的短袖，很抱歉地跟我说：“不好意思，但是没有哦。”然后很真诚地自言自语说：“这可怎么办啊……啊有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拿我的外套去穿，虽然不怎么厚但是应该会好一点！”我好意外地说：“啊！这样真的可以吗？”她说：“当然了！不过我快下班了，你走的时候放在前台这里就行。”我说：“诶，那怎么好意思，要不……”她说：“没事！冰场里很冷，你一定会冻坏的。请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帮你去拿。”

一个人坐新干线去轻井泽，座位在我正前方的大叔落座之前突然回过头来跟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脸蒙，正想问他有什么事吗，突然发现他只是把座椅靠背往后调了一点。

放学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一只耳夹在地上，于是停下来四处低头寻找。一个路过的日本小姐姐停在我身边问：“是丢了什么东西吗？我来一起帮你找吧。”我说：“哎呀！这也太不好意思了，丢了一只耳夹，我自己就可以，没关系的。”她笑着说：“反正我也没事，是什么样的耳夹啊？”我们一起找了好久，终于找到。感谢和开心过后她说：“你搭哪条线呀？不一起回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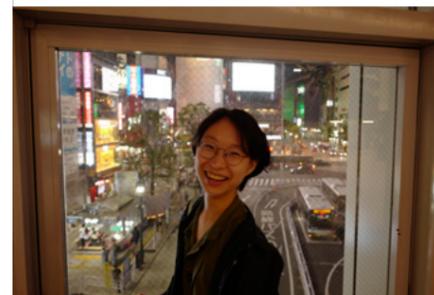
在日光，下车的时候对向的列车刚刚开动，车上许多乘客在冲站台挥手，于是我们这些刚下车的人也纷纷冲他们挥手。后来发现是因为列车开动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站台上跟乘客挥手，对他们问候送别。等到列车完全开走，工作人员回头的时候，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笑容。

见过很多次坐轮椅的人上电车。工作人员会搬来一块斜坡帮轮椅上车，车站的人很多，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但这种时候大家全都会停下来让轮椅慢慢先过去。虽然已经很挤，但车里的人也会很努力东挤西挤给轮椅腾出地方。没有一个人显得烦躁或者难受，他们都好像在做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一个尊重弱者和帮助弱者的地方。

正是这些善意的瞬间构成了日本独特的人情味，让这个国度散发着温暖的光芒。在这里，人们总是用心聆听、用心理解、用心帮助。每一次遇见这样的善意，都让我充满信心和感激。在最后一堂日本文化课上，我们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日本遇到的这样的故事，大家都被日本人的善意深深感染。而或许当我们走出这个国度，回到自己的故乡或远去其他地方，我们也能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让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继续绽放。



东京涩谷区青山学院大学（找耳夹处）。



林雅昕在日本街头。



东京地铁。

(三)

东京通勤记

撰文 / 林雅昕

01.

暑假的第一天，安排住宿时出了点乌龙，我被迫拖着行李从留学生扎堆的高田马场搬到了略显郊外的江古田。早稻田大学总共给我们安排了三间旅店，位于江古田的旅馆通勤时间最久。从早稻田到江古田，两田之间的必经枢纽是池袋站，站外是东京诸多购物天堂中的一个。东京车站中，无可置疑的流量冠军是拥有超过两百个出口的新宿，池袋紧随其后。日本地铁和中国地铁的一大区别是，地铁线路管理模式繁多，不只有日本国铁 JR 一家，还包括公营铁、私铁及第三部门铁道，即使在站内，从不同公司的线路换乘也需要重新出入闸机。西武线属于民间资本运营的私铁，西武池袋线便是从池袋一路向东京的西北出发。

我和朋友穿过乘坐 JR 线的人群，来到西武池袋线。那时正是哈利波特舞台剧的宣传期，西武池袋线的车站铺满巫师们的脸和魔杖，站台包着复古瓷砖的墙纸，假装自己是九又四分之三车站，间歇还有哈利波特主题的列车开过。源源不断的乘客流经我们，迅速就位排队。而我们拖着巨大的行李，迷失了方向。因为就这么一条线一个方向，站台上赫然分了 4 条轨道，7 处月台。

头顶的屏幕滚动显示接下来的车次，我们看了又看，好像和手中的谷歌地图没法对上。小红书似乎没人有这个问题。我们只好挤到车站地图前研究：原来江古田只是一个车站，只有在名为各駅停車 (local) 的车次才能下车，其他五花八门的急行线会直接略过它。列车喧嚣而来，我们也总算上对了车次匆匆离去。到了江古田站，便只有走路的活儿了。

02.

日本地铁大部分都在地上行驶，窗外不是黑黢黢的一条和千篇一律的广告灯箱。不过坐久了这条线，我才知道在车头可以看见前方轨道，还看得见驾驶室里的司机开地铁。阳光好的时候，

轨道在前方闪耀，路边的绿色带些暖意。司机的帽子手套口罩一个不落，日复一日地摇摇杆、按按钮，这边拐弯，前方减速，要进站了，即将变道——

喜欢钻到车头观摩驾驶，就像坐双层巴士喜欢坐在第二层的头排一样，是人的天性。有幼童把自己挂在驾驶室门把手上，扭着身子问妈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可惜我没法听懂她是怎样回答的；有沉默的年轻人站在窗口前，看到我来了，侧身让出一个观赏位。正对着司机后脑勺的窗口下方，甚至有专门的扶手，在设计时难道还考虑到了这样无所事事的爱好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位置如此顺手便利，令人愉快，仿佛主题公园的小型过山车项目。

03.

正式上学那一天，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出了酒店。虽然在地铁大都市深圳长大，但早高峰的东京地铁，还是我未经的体验。

社畜一词本就来自日语而来，车厢里赶早九的白领和深圳白领眼中的疲惫没有什么区别。被挤在人群之间，仅剩的空间经历一站又一站乘客的压缩，手机都很难拿出来，那就戴上耳机，闭眼安神。但是鼻子感到了异样，因为即使人贴着人，也很难闻到汗味或是不快的味道。下车时，没有乘客尝试涌进来，他们自动站到车门两侧，等到站的人先走出来。每个人遵守着早高峰不成文的规定，在被迫拥挤的物理空间里给予彼此互不干扰的精神世界。

到了高田马场站，我需要转乘一辆名为“学 02”的巴士到达早稻田大学。按着谷歌地图的路线，我走到了其中一个公交站台。一条队安静地排着，我也站了几分钟，但是鉴于东京交通实在复杂，我不敢冒险，于是举着导航问旁边的女士，如何登上这辆会把我带到学校的巴士。她的英语比一般日本人好，很快会意，领着我转过一个街角。看着和刚才几乎没差的站名，以及排得更长的队伍，我不禁笑了，果然是东京呢，这才是东京。

Part 02

社会中的流动

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是相辅相成的。从宏观来看，流动性作为一种区位资源，深刻地参与全球社会景观的建构塑造，在促进城市地方发展、为个人和群体带来更多福利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将地方排斥在流动的网格之外，矛盾性地影响着社会不平等。从微观而言，身体的移动不仅是物理空间位置的变换，更是个体在社会网格中上下流动的表征与途径。流动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赋权于身处大学象牙塔的我们，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感受更远的天空，去共情，去思考，去改变。

流动与社会创新——从改变奔流不息的河流中的一部分开始

记者 / 郝嘉琦

主编 / 罗雯静

“流动”是一个颇具动感的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亦充满了流动：从远处到近处，这是空间上的流动；从过去到未来，这是时间上的流动。人生尔尔，在一路上与不同的人的短暂相遇，这更是命运齿轮的转动。流动必然带来碰撞，而思想的碰撞则赋予了人类更多灵感，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次，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社会实践中心（Social Practice Center, SPC）的李佳琦和刘玥彤同学向我们分享了她们在社会创新训练营中感受到的“流动”，以及她们对社会实践深刻的体验。

谈及在社会创新训练营的感受，李佳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社会实践在校园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差别。疫情之后社会创新训练营的重启，给身处“象牙塔”里的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去接触真实景况下的社会组织，并由此意识到，一个想法的落地，势必会遇到重重困难阻挠，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来克服。刘玥彤同学则以盲人咖啡的项目经历作为回应。作为志愿者实地到店体验之后发现，店内工作人员对咖啡和相关文创的设计都很用心，于无声中彰显着对视障群体的人文关怀。他们并不凭借弱者的姿态博取同情，以此作为商业的噱头，而是凭借自身的价值吸引别人，遵从本心做着有意义之事，这是他们自身的光芒。



LiliTime 店面里的手抄报——“爱可以是一切的答案”。刘玥彤 / 图

我们流向远方，而非故步自封

流动既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对于李佳琦来说，流动往往与一定的空间距离挂钩，发生在不同的区域之间。

“一公斤盒子”是李佳琦在本次社会创新训练营活动中印象最深的项目。这是一个专注乡村教育创新设计的项目，较之传统方法中通过输送教师去支教来帮扶乡村教育，“一公斤盒子”则是把一堂课通过现实工具的形式送到乡村，形式包括定制主题教学工具包、公益项目策划、乡村教师培训、联合传播等，旨在通过项目陪伴、教师成长支持和区域推动计划，逐步深入地推动乡村教育的区域变革，这一程度上帮助教育者、产品设计公司和受援乡村几个主体之间达到相对完美的平衡。然而，虽然这种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教育的进步，可背后有着更为现实的问题：城市和乡村的孩子所接触到的信息面维度和渠道的差异。尽管同在城市或乡村生态下，不同地区发展程度、信息传输的流畅度也并不一样。因此，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来自乡村的孩子们可能无法和城市中的孩子一样接触到大量知识和机会，这意味着不同主体在流动性上所持有的权力符柄是有区别的。

对于上述社会现状，李佳琦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城乡之间的差距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已在努力缩小这种差距。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城市的成熟资源也慢慢向农村流动，现在乡村孩子的受教育情况较以前也有了较为显著的进步。李佳琦去年前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个偏远山村进行支教时，发现顺丰公益基金会资助当地小学建设了新的教学楼，换上了多媒体设备，也有文具的资助供应。

但是问题依旧存在：一方面，流动的增速并不是均衡同步的。乡村老师的年龄普遍比较大，师资更新换代速度慢。而对于乡村老教师来说，使用多媒体设备、制作讲解 PPT 有些困难；另一方面，流动停滞的惯性作用是深远的，比较明显体现在当地的思想观念对教育的影响。对于农村欠发达地区，人们常常被陈旧观念所束缚，觉得读个小学、初中就够了，打工赚钱才是当务之

急和谋生之道。这种教育观念的停滞比物质财富上的欠缺更为可怕，就像是沉重的铅，不断地拽慢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李佳琦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方向重心由物质转向精神，农村的思想教育也会慢慢进步。

流动同样也在城市之间发生。作为社会创新训练营广州站的一员，李佳琦得以借此机会对广州这座城市进行了一番较为深刻的探索。在对深圳和广州两座城市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城市之间的流动”。就她自身体验而言，两座城市在建筑风格上有着较大的差别。在参访广州的时候，他们会走进一些城中村和老社区，去参观一些老建筑，比如上世纪的会馆。这些让她由心底感受到广州的城市发展是根植在很深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而这种氛围是年轻的城市深圳所不足的。另一点是从生活的感觉上。松弛、宜居便是广州的代名词。她提到了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场景：有一天晚上他们一行人在江边散步，走到广州塔下面，当时江边上有四五个大叔在钓鱼，他们筐里有很多鱼，那个场景很奇妙——在那样一个夜晚，珠江边有些许垂钓者，而旁边是非常华丽的现代化建筑广州塔，路上有飞驰而过的车流点缀，里面不时还传出粤语流行歌曲。在李佳琦看来，这是一种很混杂的，但是又很和谐的气质。

刘玥彤对此也感触良多。她认为社会创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做到彻底的下沉。资源、人员、思想等客观条件限制着社会创新活动的发展。但当她在上海参观了“BottleDream”的项目，她对此也有了新的理解。这是一家聚集年轻创客者的文化企业，专注于青年社创活动，通过给很多社会公益项目做宣传外包，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聚焦某一社会议题。事实上，SPC 也在努力地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构建在校师生的公益观念。比如说，SPC 会去对项目宣发材料中的一些小故事、小设计的细节进行雕琢，让更多的同学被触动后参与进来。

同时，刘玥彤认为，在向远方跋涉之前，前期的视野开拓也很重要。人才、资源、思想每天都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以不同的速度流淌着，流动形塑着人对空间、对时间的感知，也关联着人在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定位，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社创训练营途中，BottleDream 小组创意拼贴画——思考「Why」社创。刘玥彤 / 图

我们流逝而去，而非停滞不前

流动，往往也能打破秩序界限，拓宽着视域空间，催生出新的感受和认知。

对刘玥彤而言，公益项目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流动性。

流动是情绪的感染。这次，她分享了一个与公益相关的支教活动。在支教中，作为老师，她切身体会到孩子们所迸发出的活力与对知识的渴求。她明显地感受到，通过支教团队的授课和引导，当地孩子更加勇敢地接纳新知识，热情地去拥抱这个“新世界”。而他们的班主任更是给了刘玥彤极大触动，在活动一开始便给支教团队详尽介绍了教学计划和班里孩子的情况。他对孩子们的关爱、对教育的热忱、对农村教育现状的清醒认知……这些都让刘玥彤动容：“这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在看透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热爱着生活’。这也是很多“公益人”的共性。他们怀揣着极强的理想主义，在经历无数次挫折之后，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方向。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即使做不成，也可以产生一些影响。即使这个种子不会长成大树，但是至少有了一个小苗，有了一个花苞，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不同的东西，这样就很好。”

流动也是知识的迁移。刘玥彤觉得前人的经验总结出的世界观、方法论，可以帮助一些观念性的东西落地。看到不同专业的同学运用自己的知识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刘玥彤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比如将商业和公益结合起来的 Lili Time 的项目。该项目其中一个发起人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她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模型和经济运行的基础规律，帮助公益领域自身造血，达到可持续的目的，而不是依赖于外界的支持。虽然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或许现在的努力还很难有决定性的成果，但是这种经历能给他们带来全新的视野，在以往十几年的应试教育中找到一个小的突破口，去认识真正的自然与社会，这是很新鲜的。

流动还是思维的碰撞。李佳琦提到他在广州的4天时间里，她们的行程都是相对固定的：白天学习参访，晚上行程结束后，大家便会坐在一起，表达这一天的感受，对同伴们提出的问题

给出自己的解答。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大家都处在一种思想自由的状态之下，好像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条小溪，聆听着彼此的分享、讨论，小溪之间互相流淌着、碰撞着，而后慢慢汇入了一条河流。伴随着新的交流碰撞，这些河流随后又汇聚成了一片大海。李佳琦也谈道：“每天在这个时候都有种世界线收束的感觉，总结了一天的收获，也是一种升华。在这样的交流中进行灵感的发散。不会考虑太多可行性方面，只是很自由地在交流。”这种思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就好像一条河，它在奔流的过程中每时每刻也都是不一样的，也会有新的东西产生。

李佳琦希望把这种短暂的相遇延长。她也思考着：能不能把这样优秀的项目引进校园，让更多同学了解到此类社会议题，在现实中是怎样被关注和讨论的。如此，能让思维不断流动，进行更多的碰撞，带来更多的新的视角和想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

人生这张网，布满流动的分支

对于一些人来说，公益、文化保护……这类社会议题是空泛而且遥远的存在。提及这种说法，两位同学有自己的见解。李佳琦提到，学校提供了很多“走出去”的机会，让这些抽象的东西具象化。比如盲人咖啡的项目，之前只会想到视障群体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需要更多关爱。但是在实地和他们交流之后会发现：他们和其他普通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一种很平等很自然的状态。在聊天中，可以窥探到他们真实的日常细节，了解到尽管生活中仍会存在一些困难与不便之处，但是先进技术的利用和社会层面的善意与帮助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除此之外，李佳琦会觉得公益是一个比较宏大的概念。一提到公益，大家会自然联想到社会弱势群体，或者是比较棘手的问题。而事实上，她认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划入公益的范畴之内，比如学校学生会和社团组织的活动可以让大家互相交流、展示自己，这在广义上来说也算一种社区营造，一种公益。其次关于如何做公益，她觉得，做公益并不需要什么身份或者标签。在

任何的地点、岗位中，都可以为自己关心的事情努力，不论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否真的帮助到了一些人，还是能让其他人了解到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从不同的维度上，可以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都是公益。

刘玥彤也有着类似的想法。或许地域和空间的距离让大家觉得公益很遥远，因为很多公益项目面向的是我们生活中很少接触到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贫困地区儿童，或者一些特殊社会事件人群。另外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公益经历，对于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也有限。但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话题需要大家关注。每一个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好的事情，其实都是个人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不同途径。

谈及对主题“流动”的看法，刘玥彤从自身大学三年的经验出发，分享了自己自我认知的“流动”过程。最开始自己因为外界的一些声音选了一个比较擅长的专业。然后在不断的探索中，发现这个专业似乎不太适合自己，所以又选择坚守初心，回到了最初想要去的专业。她的建议是，尽早确定自己热爱的东西，不要由于眼前的困难，或者外界的影响放弃这条路。但是也不要过早忧虑，我们处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也不要特别纠结于方向。流动是否，如何流动，都在于个人的选择。

同时，她对这个世界理解很有趣，她愿意相信有平行宇宙的存在。可能在另一个维度中，那个人已经实现了其他的可能性。尽早确定喜欢做的事情，回报最多的事情，可能会是一种比较幸福的生活。

李佳琦最大的感受是流动中产生的焦虑。小的时候，人生的流动是很单一的。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选择接下来流向的航道。一方面这是一种拥有了选择权利的自由；而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也是一种枷锁，因为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假如最后所有的河流都会汇入大海，那做出选择似乎变得轻松了很多，因不知所从而产生的焦虑感就会少一些。

两个小时的采访很快过去。在同两位同学的交谈中，能感受到这些青年的热忱和认真。就像两位女孩提到的，可能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能做到的都有限，但是河流是奔流不息的。这样一点小小的变化能够成为未来变革的助力，就已经足够了。

采访时，李佳琦同学在等待她的雅思成绩，刘玥彤同学也在准备着升学。祝她们获得满意的结果，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SPC 社创营结营合影——每个人都与我息息相关。刘玥彤 / 图

冲出“象牙塔”，重返“黄金港”： 找寻“流动”中的深刻与长久

—— 对话社会实践中心杨孟禹舜老师

记者 / 文玄亦

编辑 / 叶润博、罗雯静

象牙塔 (Ivory Tower), 这个词来源于圣经《旧约雅歌》。它原本是用来形容新娘美丽颈项的圣洁和高雅, 现常用于比喻远离现实生活的小天地。而大学便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说社会是或波涛汹涌或暗流涌动的海洋, 那么大学就像是一池湖水, 美丽但相对凝滞。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事务处社会实践中心 (Social Practice Center, SPC) 开展的“社会创新训练营”活动, 通过组织前往上海、成都和日本东京等地区的有关项目, 帮助在校同学了解优秀公益活动机构的运作方式和社会创新项目的组织开展过程。如此, 社创训练营这一活动就如同在静止的湖边挖渠, 让湖水的水得以流动起来, 让同学们走出象牙塔,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去感受更远的天空, 去共情, 去思考, 去改变。

在本篇采访中, 我们荣幸邀请到了社创营活动的领队老师杨孟禹舜 (Shuki), 就活动开办契机、理念概念化、组织设计、持续运营调整、活动意义等各方面进行了细节采访, 以期从项目团队负责老师的视角出发, 让我们对该活动能有更细致深入的了解, 以及探寻流动实践在社会创新中是如何产生深刻与长久的意义链接。



“2023年 SPC 上海社会创新训练营”活动海报。



与公益机构老师的合影。

2018年, SPC“社会创新训练营”活动首次在上海落地。作为“挖渠人”, 领队老师 Shuki 向我们谈及活动开展之初衷: 尽管社会创新这一理念很早就被提出来, 也在时下日益成为一个频繁使用的时髦术语, 但一直难有明确化的定义, 始终是一个边界相对模糊、内容仍在发展扩延的概念。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不被定义”也意味着大众对社会创新能够拥有更加多元的理解和更富创造力的实践可能, 这也为社创训练营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对于同学们来说, 通过实地探访的导赏模式走出校园、走进行业前沿, 对于他们拓宽眼界、重构思维是至关重要的。较之于游客一般简单的参观体验、单方面地接收消化在实践中已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创新理念, 社创训练营的同学们能够结合自身的社会实践经历去进行更加深度的交流和思考, 理解不同社创实践模式的底层逻辑, 从而能主体性地对社会创新这一理念加以再建构。这也正是回应着同学们对于打破“泡泡”、走出“象牙塔”的期待, 在亲历中去听、去看、去想、去触碰。因此通过师生共创的方式, 社创训练营这一活动能够为同学们提供社会创新探索方向的引导和训练。

而对于为何“社会创新训练营”被纳入“公益领导力提升计划”, Shuki 老师也给出了她相应的解释: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参与公益活动和服务的经历, 可能起源于一次献血、一次旧物捐赠, 又或是一次福利院探访。那么经历之后, 我们是否会问自己, 然后呢? 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可以怎样持续地、深入地做? (我们做的事情) 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改变? 如何去评估和优化自己在活动之中的价值和作用?” 对于同学们而言, 社创训练营期间高饱和的探访、交流、冲突、互动、体验这些参与经历, 无可避免地会碰撞和补充原有观念, 带来一番自我审视和认知更新。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持续深入的思考, 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从无意识的旁观者逐渐过渡为目标明确且有清晰想法的组织者, 从而激发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在公益和实践领域的关注和发展, 这正是公益领导力得以不断提升的表征和途径。

当论及活动目的地和参访对象的选取，Shuki 老师讲道，涉及社会创新的业态和项目分布范围相对广泛，考虑到要使得活动行程安排和体验尽可能地集中，在目的地上更倾向于选择社创机构、公益组织、B Corp (benefit corporation/ 共益企业) 较多、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土壤。至于具体对象的选定过程，则是她特别引以为傲的一点：社创之行的所有目的地、组织机构、行业人员的联络和选定最初并没有做预设和限定，完全是由筹备项目组的同学们自主调研、联络和敲定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同学们对于社创活动的热忱与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始于同学们个人的公益关注、校友的推荐等方面“海选”的提案，社创训练营的活动安排在策划和头脑风暴过程中得以逐步梳理、筛选，再由同学们分工联络活动当天具体的档期安排和互动形式，最终敲定行程。由此可见，同学们作为活动主创，领队老师们则更多地起着支持性的作用，在优先同学需求的同时，做好对项目内容、形式和质量、多元性的把关，以及对机构的预先背调、适应性、安全性等考量。



社创训练营行结束行程之后的团体讨论。

2023 年的广州社创训练营在 3 天内安排走访了共 8 个组织，参访主题也涉猎得十分广泛，从特殊人士就业到乡村教育，从社区老年人关怀到旧城改造。呈现出相当丰富多元的内容，其他的社创训练营也都是同样紧凑丰富的行程安排。有人会质疑这种形式不免产生“走马观花”的感觉，同学们似乎仅限于流动过程中匆匆地“看见”，而缺少了深层次的链接。面对记者锐利的提问，正如任孜月同学在 2023 年上海社创营的回顾推文中的回答，“3 天的时间，要说梦也是个短暂的梦，但这场梦却足以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这就是他们的力量。感谢每一位支持，计划和筹办的‘造梦者’”，Shuki 老师也给出了同样坚定的回应，认为在仓促的流动之下项目组的同学仍然获得了深刻的意义链接：“社会创新训练营，区别于其他一次性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并不希望它是浅层的、形式化的‘观光游学’，而是扎实的、有力量的甚至是略带冲突性的体验。在前期的讨论和行前培训会中，我们会将机构和组织调查研究的任务预先分工布置给团队成员，分组进行资料收集，以小型报告的形式带领其他成员去了解、去熟悉参访对象的背景、发展情况、品牌项目，甚至尝试去质疑、去挑战，在实地行程中去验证、比照、解构、重塑。如此一来，我们也切实感受到这种准备带来了更高效的交流和更深入的讨论。我们所参访的机构，亦对同学们调研、表达、思考等多方能力表达出了认可和赞赏。”

此外，老师也提到，在个人能力提升之外，结识朋友、创造记忆、身心流动的过程也很美好，也是收获。每天行程结束后的当日小结、结营仪式和行后分享会上，项目组会鼓励同学们基于行程中的任何记忆点和感受去进行发散和讨论，或进行激烈的争论对话和思想碰撞。哪怕是咖啡店门前一只晒太阳的猫，都会带领大家再次回顾和重温活动细节，从而引起深刻的情感共鸣，将项目组同学们彼此联结在一起。夏雨晴同学在 2023 年上海社创营推文中如是提及：“如果要赋予这次旅程一个关键词，我的答案是联结。联结是多元多样的，它在不断迸发出新的东西，它赋予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以意义感与归属感，而这份意义感与归属感在我看来是世上最最重要的事。有这样一次机会，和一群热衷于表达和行动的人，认识和见证了另一群在表达在行动的人已经或正在做的事，并且我们拥有着共同的期待，我们都期待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想这会是一段我毕生难忘的经历，很幸运我在 19 岁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群人，有过这样一段旅程，它很珍贵，它很美。”

而在同学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遇到不一样的人、聆听到不同的想法这样一个“身心流动”的过程中，Shuki 老师作为社创训练营活动的组织管理者，也切身感受到了同学们在此间的个人成长变化：“过程中确实可以很快速地抓取到一些直观的变化，比如同学们从旁观到专注的投入、前期预设与切实体验的反差、对某些群体先入为主固有印象的打破、自我意识和情感的表达和联结等等。”同时，老师也谈到她自己作为活动参与者的切实感受和经历。疫情之后近两期上海和广州的社创训练营对她自己而言也是新鲜的、难忘的体验，在过程之中她得以高强度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观念，尽管有时会感到某种自我的纠结，

但也仍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自我充电和赋能的过程。和同学们同吃同住、聊天谈心，在晾满衣服的青旅天台做机构分析、操心要催着赖床的朋友早睡早起、分享美食、互拍黑照表情包，这些轻柔而干净的碎片，都让她真实地感受到学生工作的疲惫和快乐：“拥有这样的机会和体验的我们很幸运，知识和经历值得被珍藏，也值得被分享。”

但是，Shuki 老师也强调，自己并不会预期活动的意义是改变和颠覆，因为过多的赋予会让体验和创造变得沉重：“从现实来说，我希望社会实践中心的项目和活动更像是一个点燃、一个播种的动作。火苗可能在燃烧后熄灭，但同时种子可能会在某一天发芽。在我们的参与者、组织者的群体中，会有商科专业背景的同学毕业后选择进入非营利机构工作，开始创业的同学也会更多关注 ESG 友善解决方案、关注特殊群体就业促进和社会融入等社会议题。我很期待更多这样多元的、遥远的、发散式的‘改变’”。因此而点燃的每一个灵感，都可能冲出象牙塔，流淌为永不止息的河流，去共情，去思考，然后去改变，辐射更广阔的人群，产生更大的社会号召力。

在一次团队破冰活动中，项目组的同学围坐在一起，通过抽纸条回答问题来加深对于彼此的了解。“我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是现在还在不断去寻找意义。”这是 Shuki 老师抽到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她说，这句话听起来似乎略显矫情，但随着更多的经历，理解但不接受、认同但不随流、妥协但仍挣扎，总要试图去够一够理想主义的星光，“不停止”是她自己在坚持的事，同时也想鼓励同学去尝试。她很感谢同学们对社会实践中心项目和活动的参与和喜欢，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加入进来，带着收获去认真生活、去影响身边，不以公益为目的去做更多公益的事。

[特别鸣谢：所有活动素材均源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生事务处 社会实践中心]

Part 03

流动再思考

走出象牙塔的社会流动是作为个体的我们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实践。在此基础上，当我们的目光从行动表象透视个体灵魂，会发现它们时刻在流动的波涛中颤抖。无论处于回望或期待，在或长或短的静止后，经历过长期封闭生活的我们希望再次解读个体流动的重要意义。我们将站在东西方哲学视角了解自由意志，从通识课堂里捕捉先哲深刻的思考，寻找自由意志之于我们的启迪。我们也尝试从具象化的影视作品中提取并解读“流动”这一抽象概念。社会流动激荡出如浪花般的各类社会现象，折射出当代青年的情绪与思考，或热情、或迷惘，都能转化为我们渴望探索的人生命题。因此，我们的再思考选择回归个体生命，尝试从停滞枯萎的精神世界迈出流动的第一步，设想精神出走之后的冰与火，讨论精神内核何以在流动中包容稳健、生命如何在流动中壮阔热烈。

于通识课感受个体意识的流动

——专访托马斯·卡罗尔教授

The Flow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General Courses

Interview with Prof. Thomas Carroll

作者 Author / Prof. Thomas Carroll

记者、编辑 Interviewer and Editor / 贾涵 Jia Han

译者 Translator / 范凯翔 Fan Kaixiang



托马斯·卡罗尔教授是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组的副教授（教学），主讲课程有哲学、宗教研究以及跨学科人文课程。卡罗尔教授于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宗教哲学和宗教研究。现在，他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致力于比较伦理学，宗教哲学和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卡罗尔教授还著有《维特根斯坦的宗教哲学》一书，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卡罗尔教授同我们一起，结合人文社科学院的通识课内容，探讨个体与集体意识相关的哲学话题。

Prof. Thomas Carroll is Associate Professor (Teach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nd teaches courses in philosophy, religious stud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humanities. He obtained the PhD degree 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Religious Studies from Boston University. Prof. Carroll is an educator and researcher working in the areas of comparative ethic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Wittgenstein. He is the author of Wittgenstein with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We are honoured to invite Prof. Carroll to explore soci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topics related to the flow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general courses of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问题一：您能为我们简要介绍“自由意志”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吗？

“意志” (will) 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由来已久，久到无法在一次短短的访谈中解释清楚。但是在这久远的历史之中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对人类认知自由意志的本质、探讨自由意志存在与否贡献颇丰，对我的思考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

在古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思考意志本质及其在伦理中的作用作出过至关重要的贡献。而晚期古代哲学家、神学家奥古斯汀 (354-430) 将意志与道德义务联系在一起，在数本著作中探讨了意志在道德和精神生活中的变化，其中包括他的经典作品《忏悔录》。特别是在回应恶的难题（一个在逻辑上探讨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世间之恶能否同时存在的哲学难题）时，奥古斯汀认为人类才是世间之恶的源头，并该为此负责。

我最喜爱的哲学作者之一大卫·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可相容的。自由的行动是由人 (行为) 实施的，也就是说，行为人是他们行为的产生原因。有趣的是，正是休谟的相容主义使他认为任何假定的上帝 (作为一切存在的终极原因) 都要对世界上任何道德上的邪恶负责。这一观点非常符合休谟对上帝概念的逻辑一致性和实证支持的一贯怀疑。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2) 同样支持自由和决定论的相容论，他认为自由是实践理性的假设，也就是说，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前提。我认为康德的观点是，为了让道德准则真正约束我们，人类必须自由决定是否遵循这些准则。有趣的是，康德与休谟不同，认为要阐释我们的道德生活，假设上帝的存在也是必要的。

最近，神经系统科学家发现了一些大脑现象，这些现象挑战着“意志主导行动”的常识，因此哲学家们也开始从事此类工作，并将其与哲学理论联系起来 (详见丹尼尔·丹尼特的诸多著作，如《自由的意志》和《意识的解释》)。尽管已经没有篇幅来谈论对这些“自由意志”观察的重要性，但这项研究仍强调了阐明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概念有多重要。

Q1. Can you give u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will in Western philosophy?

The concept of the will has a long history in western philosophy, too long of course to deal with well in a short interview, but the philosophers whose work on the will have had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my own thinking are also some of the figures who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inking about the nature of and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free will.

In the ancient world, both Plato and Aristotle made critically important early contributions to thinking about the nature of what we might call the will and its role in ethics, but the late antique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Augustine (354-430) linked the concept of the will with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explored the dynamics of the will in moral and spiritual life in several works, including his classic *Confessions*. In particular, in responding to the problem of evil—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of the logical consistency of belief in a God with evil in the world—Augustine held that it was human beings themselves who were the source of evil in the world and thus responsible for it.

David Hume (1711-1776), who has long been one of my favorite philosophical writers, argued for the compatibility of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Actions that are free are actions that are performed by a person (an agent); that is, agents are the causes of their actions. Interestingly, it is Hume’s compatibilism that leads him to see any putative God (as the ultimate cause for everything that exists) as responsible for any moral evil in the world. This stance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Hume’s consistent skepticism towards the logical consistency or empirical support for ideas of God.

Immanuel Kant (1724-1802) also argued for a sort of compatibilism of freedom and determinism through his view that freedom was a postulate of practical reason, i.e., that it is presupposed in our moral life. I take it that Kant’s view holds that in order for moral principles to require our compliance, human beings must be free to choose actions consistent or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principles. Interestingly, Kant contra Hume argued that postulating the existence of God was likewise needed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our moral life.

Recently, neuroscientists have detected phenomena in the brain that challenge the common-sense idea that the will precedes action, and this has led philosophers to engage with such work and its relevance to philosophical theories of consciousness (on this see numerous writings of Daniel Dennett, including *Elbow Room* and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While there is not room here to commen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observations for conceptions of freedom of the will, the research highlight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larify what it is that we mean by the concept(s) of freedom of the will.

问题二：提及我们个体流动的选择，您认为自由意志对于个人生活而言有何意义呢？在哲学角度上讲，自由意志和道德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我倾向于站在奥古斯汀和康德这边，为了使我们的道德行为有意义，自由意志的概念应当是必需的。而且，一个人的道德选择反映出个人本身及其性格，这种说法挺合理。如果一个人失去选择的权利 (以一种决定论的方式)，那么这个人的行为也就没有意义了。

Q2. When it comes to our personal fluid choic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eaning of free will to individual lif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 will and ethics in philosophy aspect?

I suppose I tend to agree with Augustine and Kant that the concept of freedom of the will seems necessary in order for our moral actions to have meaning. Furthermore, it seems reasonable to say that a person’s ethical choices say something about that person and their character. If one could not have chosen differently (in a deterministic way) then it wouldn’t seem like the action was meaningful.

问题三：您对老庄道教思想中精神的流动与自由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提供一点您的分析吗？

我特别喜欢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庄子》。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我还是个西方学院的本科生，那时我早就发现它把幽默和荒诞结合在一起，加上哲学思考，既令人心生愉快，又使人有些困惑。我是作为一个对全球哲学感兴趣的人，而不是作为汉学学生或学者，来谈论这本书的。这并不是我的领域。《庄子》中的“自由”是摆脱特定方式或“道路” (基于布鲁克齐波林 (Brook Ziporyn) 对“道”的翻译) ——“道”的自由。我认为，这本书提出“自由”“自然”的价值在于，不以评判其他事物的标准来衡量、约束一种事物。这是一种实用的自由观，我认为相当引人入胜，但也难以捉摸，很难被付诸实践。

Q3. We would like to learn your opinions on spiritual flow and freedom in Lao Zhuang's daoist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China. Could you give us some analyses?

I am particularly fo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xt, *The Zhuangzi*. I first read from this book as an undergraduate at Occidental College, and I have long found its combination of humor and absurdity along with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o be delightful and confounding. What I say about this text I say as one interested in global philosophy, not as any sort of student or scholar of sinology; that’s not been my training. The freedom that one finds in the pages of *The Zhuangzi* is freedom from the commitments and views of particular ways or “courses” (to go with Brook Ziporyn’s translation of “dao”). The freedom or spontaneity (*ziran*) advanced in that book has, I think, the value of not judging or limiting a thing by standards that apply naturally to some other thing. This is a practical sense of freedom I find very attractive if also elusive and difficult to put into practice.



照片由托马斯·卡罗尔教授提供。
Photo provided by Prof. Thomas Carroll.

问题四：“与人文对话”课程能给学生带来怎样的自由观念以及变化的看法呢？请您基于“与人文对话”课程，谈谈通识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性。

这个问题我当然是代表我自己来谈。除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就像我刚刚在西方哲学史中提及的）和我刚刚谈到在《庄子》中的自由作为自发性的实践意义之外，“与人文对话”（以及“与自然对话”和通识选修课程）等课程中出现的自由是第三种类型。这种自由并不是源于因果决定论的自由，亦非忠于某些特定生活方式的自由（尽管它与后者有些相似），这第三种自由是一种思考的自由，它是一种自己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不是任何一门课的课程内容，也没有一门课可以教得了这种能力。但不同的通识课程共同教授着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特定领域的批判性思维方法。

如何去批判性地、自由地思考是一门终身学问。在教授通识课时，我也学习到了很多，无论是在上课时从我的学生那里，还是结合前一年的经历重读之前的课程材料时。希望同学们可以在港中大（深圳）的通识旅途中培养出自己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也希望他们毕业之后能继续在这些领域探索，比如哲学和历史。

“与人文对话”只是一门课，但它是一门我们大学中意义非凡的课，在有关生命、意义、自我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上，它用一系列截然不同的观点挑战并激励着同学们。这门课激励同学们去独立思考，去读一些在漫长历史和不同文化中被珍视的文章，其中某些甚至被视为神圣（在有的人看来）。我喜欢教这门课，每次教这门课时，我也学习到许多对这些文章新的见解以及由此而生且持续发展的批判性思考。

Q4. What kind of free concept and fluid attitude can the GFH course bring to the educated? Based on the course In Dialogue with Humanities, please talk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for students.

In considering this question, I am of course speaking for myself. Alongside the metaphysical sense of freedom of the will (as I was just reflecting 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 practical sense of freedom as spontaneity that I was just consider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Zhuangzi, the freedom that emerges from courses like 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 (as well as In Dialogue with Nature and the elective courses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me) is of a third type. This freedom is not freedom from causal determinism or from the commitments and views of particular ways of life (although it has some similarities with the latter). Instead, this third form of freedom is freedom of thought, and it is the capacity to think critically for oneself. There's no one course that teaches this, or that could teach it, but different GE courses collectively teach approaches to critical thinking rooted in particular fields in the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

One is never really finished with learning how to think critically, freely. While I teach courses in the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me, I also learn a lot from my students when teaching my courses or from rereading course material with the experiences of a given year of my life before me. Hopefully, students will develop their own sense of taste for 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sort explored in GE courses during their time at CUHK-Shenzhen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think and read about those areas, e.g., Philosophy or History, long after they have graduated.

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 is just one course but it is a very important one at our university, challenging students to encounter a dramatically diverse set of views on big questions about life, meaning, the self, and society. The course offers students provocation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and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exts that have been prized, even held as sacred (by some), across long histories and varied cultures. I love teaching the course and learn new insights into these texts and their ongoing relevance to critical thought every time I teach it.

瞬息流动的再思考

——《瞬息全宇宙》电影沙龙研讨纪要

记者 / 唐可馨

编辑 / 贾涵



《瞬息全宇宙》电影海报。

前言

在各类科幻作品中，你可能早已听过“平行宇宙”的设定。影片《瞬息全宇宙》是一部将喜剧与平行宇宙生动融合的精彩之作。在影片设定中，女主角伊芙琳的每一次选择都代表一个平行宇宙的诞生。有一天，她的丈夫变身“宇宙特工”，请伊芙琳打败破坏平行宇宙的邪恶力量，而这一邪恶力量竟然是她的“女儿”乔伊。为了维护宇宙秩序，伊芙琳通过穿梭于不同平行世界以获得抵抗邪恶力量的能力。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她可能是家庭主妇、武术家、厨师、明星，甚至可能是长着香肠手指的人，也有可能是布娃娃、石头……然而，在此之前，伊芙琳只是一位面临着家庭与事业两崩溃的普通中年妇女。在老父亲生日大寿这天，她除了要阻止女儿乔伊暴走出柜、替无用丈夫威蒙德收拾烂摊子，还得去税务局向古板的税务官解释一团乱麻的洗衣店的税务问题。

对于伊芙琳来说，这突如其来的精彩穿越之旅，不仅仅是在维护宇宙秩序，更是在反复奔跑中坚定个人信念，完成自我实现。跟随伊芙琳穿越于平行世界间的脚步，我们引申出对这一过程中关于“流动”的思考。瞬息之间，伊芙琳在时空的流动中获得了人生的再次解读与突破壁垒的可能。引申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流动能否给予我们新的启发？在此次电影沙龙中，我们进入《瞬息全宇宙》，同伊芙琳穿梭于她的万千人生线，感受“流动”的生命力，讨论有关“流动”的社会与哲学话题。

流动中的观念冲突：迷惘的一代 如何面对文化的代际传承

贾涵（主持人）：在影片中，伊芙琳一家是移居美国的华侨。电影一开始，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伊芙琳和乔伊母女之间在各种观念上的分歧。而这种观念上的分歧通常被解释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碰撞。电影中是如此，身处现实世界的我们亦是如此。我们也不可避免地经历地域流动和由人口流动带来的观念冲突，或许还有原生家庭里代际之间的思想摩擦。大家是否有过相关的经历？你们又是如何看待此类现象的？

江俐川：对于文化流动，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语言上的冲突和包容。首先是伊芙琳的父亲，作为老一辈中国人，他自然而然地和美国本土人之间产生了“语言隔阂”。而伊芙琳及其丈夫威蒙德作为“第一代移民”，在语言的使用上则形成了“东西方交融”的特点。在他们的日常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英语和中文混杂这一特别现象。而作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移民二代”，乔伊从小生长的语言环境便是英文为主的。她骨子里流淌着中国血脉，却没办法流利地说中文。由此，她与自

己的祖辈也产生了一层“语言隔阂”。我认为这种语言现象实质上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和交融。就好比两条颜色不同的河流交汇后变为一条新的河流：它既不是原来的第一条河，也不是第二条，而是全新的一条河流，一种新的文化的面貌。

吕沐缘：我也有一些关于地域流动的想法。我本人是从黑龙江到广东上学，从北到南的地域跨度是相当大的。来到广东后，我切身体会到了由地域跨度造成的各种文化差异，比如气候的不同、饮食习惯上的区别等。而近几次寒暑假我从广东返回黑龙江后，又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感觉”：我感觉我像被“夹在中间”的一个“中间人”，似乎在两边的生活我都不太能适应，这让我无所适从。

郭毓言：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其实不完全认同“伊芙琳和她父母的矛盾是源于东西文化的冲突”这一观点。我更加偏向的是，他们两者的矛盾是来自一个民族文化内部代际传承过程中新



《瞬息全宇宙》电影沙龙现场。Leonardo/摄

旧文化的冲突。在影片中，我们会看到孙女乔伊穿着“夸张”的、具有冲击性的服饰。我认为这是乔伊倾向“新文化”但并不明白如何表达自己内心活动的一种外化。被乔伊所创造出来的“贝果”（黑洞）实际上也象征着“新文化”。尽管乔伊创造了新文化，但她对此也表露出一丝迷茫，乔伊也不知道进入“贝果”（黑洞）后会发生什么。从这里开始，我意识到这部电影的导演可能并不只是单纯地聚焦东亚家庭和东西方文化冲突。他在试图引导我们思考：代际之间的文化流动和传承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是面向全人类的。以我们这代人为例：被称为Z世代群体的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文化交界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实现文化的交替和代际的传承。对此，我们都是迷茫的，就像乔伊一样，站在新旧文化交际的分界线上，我们也不知所措。

流动的可能：打破惯性，踏出第一步

贾涵（主持人）：在影片中，女主角伊芙琳作为洗衣店老板需要去定期报税。面对琐碎的洗衣店工作、家庭的诸多冲突、刁钻的报税官，伊芙琳的生活“一地鸡毛”，但她丝毫没有放松的想法。当丈夫提出旅游计划时，伊芙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这种物理性（肉体）的长期按部就班的固定模式下，伊芙琳的精神也不再“流动”，而是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她就应该守在小小的洗衣店，过完鸡飞狗跳的一生。

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眼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也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因为防疫或生活所需而长期待在某片区域“重复”地生活。由于物理意义上的静止，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否也会容易停摆，处于静止？事实上，人们期待的生活选项可能由于种种因素而受限，当人们的肉体与精神囿于固有生活的枷锁时，我们又该如何为自己带来流动的可能？

张开弦：在我的眼里，高中到大学是个体人生的重要阶段。尤其是高中三年，这个时期对一个人

的思维和行为的影响十分深远。即使进入大学学习许久，我感受到自己仍然处于高中的状态里，这种状态主要是指我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在大学里，我们中许多人还是会习惯性地去看学习成绩和排名。我们很少想着去探索自我，而是倾向于跟随着学长学姐的“经验之谈”，走相同的道路。但我觉得大学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大学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道路，而不是重复着一条所谓的可复制的成功道路。我想，无法有意识地去探索自我的更多可能性是我们精神上的“不流动”的一种表现。

杨济帆：有时候当生活进入比较有规律的安稳状态时，我就会不太愿意从那个状态中出来。比如假期结束后不愿回学校，我原以为是不愿面对“DDL”“pre”“essay”之类的学习任务，但后来发现不是——因为在学校待久了也会突然觉得回家似乎也变成有很大障碍的事情。有时候我会突然希望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星期，进入循环，这样只要安安稳稳地重复有规律的可控的生活就可以，仿佛未来的未知或者突变永远不会到来。



张开弦同学在发言。Leonardo/ 摄

张开弦：我也认同“肉体的固定会造成精神的不流动”的观点。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生活，而我也很容易沉浸在这种很安稳的状态里面。当疫情结束，这种状态会延续。长期的束缚导致精神的不流动之后，即使这种束缚被打破，我们的精神仍然会保持一种停滞的惯性状态。但是，如果你一旦尝试去流动，你会发现思想也会开始变得流动起来。你会接触很多新的不同的事物，你也敢于去认识很多不同的人。而当你的思想是一个固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对很多东西都会坚持一个固有的认知，当别人持相反意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

张恩瑞：我想“如何为自己带来流动的可能”关键在于主观能动性。我们要尝试着自己创造“流动”的机会。电影女主角伊芙琳把自己困在日常生活的无限循环里，这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一种单面性的认知。实际上，她可以出去旅行，她的生活可以多姿多彩。将伊芙琳的故事映射到我的生活，在常规学期，我可能异常忙碌。但是我会主动在周末到市区去逛街，在一天结束后到健



主持人贾涵同学。Leonardo/ 摄

身房运动一下，或者和朋友在假期飞到周围省份游玩。给自己一个流动的机会，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我认为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为我带来精神上和人关系上流动的可能。

郭毓言：相比于物理意义上被“困在”一个地方，更可怕的是心理和观念上的“困住”。当你觉得自己停滞时，其实是因为自己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且可以被预见。我们需要意识到“原来还能有那么多不同的可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思想上的冲击。

流动的反思：在精神出走之后

贾涵（主持人）：影片中，伊芙琳通过流动于其他宇宙，发现自己在其他宇宙人生是那么成功。当她返回自己的宇宙时立刻感受到巨大的落差。反观我们自己，或许在某个瞬间，我们将思绪放空，在短暂的精神流动并重新返回日常生活后，会发现幻想的世界和现实的差异如此之大。随即，一种迷茫、虚无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是我们浪费掉了时间用于无谓的“精神流动”。这种强调现实功利性的实用主义似乎与我们所讲的“精神流动”相悖。那么，这种精神流动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在片刻的精神出走后回归现实，面对巨大落差，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郭毓言：我们总是在衡量一个事情的功用性，而这个考量本身或许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落入实用性陷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担心自己是否会变成一个“无聊的大人”。我们不能做眼里只有石头的西西弗斯，变成不再去想象生活而是按生活去想象的人。当下感性的流露其实是很珍贵的，我的方法就是去珍惜这些精神流动的时刻。

李聿晨：面对疫情中的孤独或生活中的不如意，我们很容易把这些悲观的情绪与状态“美学化”。在影片中可以体现在女儿穿着富有个性的衣服将自己作为平行宇宙的主宰。在乔伊存在的平行宇宙中，她拥有至高的力量，可以随性表达自我，

这是她对自我价值和个人行事风格的肯定，而且她乐在其中。对我们来说，在当下陷入自怜、自恋般的个人狂欢确实可以感受到精神的愉悦，但也会加剧我们与现实生活的割裂。我们终将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中。所以我觉得一个解决方法是：活得简单一点。换一种说法，就是让你自己每天的精神保持相对简单稳定的状态，而不是对功利非常敏感。因功利性而质疑精神流动的意义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很功利的想法。跟随自己的目标和兴趣，这种功利心对我们的影响自然会削弱。

张开弦：我和上一位同学观点有些不太一样。我认为他的观点更加偏向积极乐观，回归纯真。而我则觉得，或许我们可以从“悲观”一点的角度看待问题，对于事物的结果都抱有较低的期待，提前设想一些可能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努力并不一定带来成功，但至少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尽力且问心无愧，不将成功当成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如此一来，每当我们遇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我们就更容易会为之雀跃。这样一来，功利性带给我们的影响也将减弱。

贾涵（主持人）：说到“小确幸”，我想，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也是我们精神流动的一种表现。当我们处在这种精神流动中，我们对周围的一切似乎会有更强烈且敏锐的感知。你会想要暂时抽离出你现在所在的生活，去见证世界的美好。

江俐川：你的观点让我联想到一首诗，大意是：一潭死水，它可以像一面镜子反映天空，可是它无法参与这个天空；而流动的水，它不仅反映天空的模样，它还可以展现出来天空色彩的流动、光影的变化。如此说来，流动的水其实是在流动中让自己参与到万物中去，把一切事物反映出来，成为他们的影子。我觉得这种流动是比“天光云影共徘徊”更加生动。

流动的意义：在改变中探索更多可能性

贾涵（主持人）：影片中女主角伊芙琳的精神流动分为几个阶段。一开始她经历了一段迷茫、莽撞的穿越。她不理解特工丈夫所说的“拯救宇宙”。对于流动，她十分困惑。而到了电影后半段，伊芙琳终于理解了宏大且不可思议的平行世界宇宙观，并决心挽救女儿，说服女儿不要遁入“贝果”（黑洞）中。至此，伊芙琳完成了从漫无目的到主动进行穿越（流动）的转变。在我们的生活中，流动可以分为“无意识流动”和“自主流动”。大家觉得不同类型的流动对个体和群体都有怎样的意义？



郭毓言、李聿晨、张恩瑞同学（从左往右）讨论发言。Leonardo/ 摄

邓健坤：我认为流动的意义是为了寻找一种全新的可能。举个例子，基因突变是一种无意识的流动，基因工程是有目的流动。基因突变能为基因工程提供基础。无意识地流动可能在当下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是它或许在未来就大有用处。“无意识流动”是在千万个可能中寻找可行的可能，“自主流动”则是在一个预设的可能中寻找最终的结果。无论是哪种流动，都是为了从目前的状态中得到改变。对于个体来说，流动所带来的改变，无论好坏，本身已经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社会来讲，如果有足够多的个体在流动中获得进步，这对社会整体发展也是一个建设性的推动。

张开弦：我觉得，人的成长也具有流动性，当中既包括强制性的流动又包括发散性流动。比如，高中的教育体系是一种很典型的强制性流动。在这个阶段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规定了要通过高考实现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这种强制性流动推动我们去成长，让我们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但是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里面，我觉得我们又是自由的，具有发散性，可选择的。比如，在大学4年里面，我们可以境外交换，可以支教，可以创业，可以实习，可以gap一年离开学校，可以去各地旅游，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编者说：

伊芙琳在穿越中与邪恶势力搏斗，更在流动中走出了封闭观念的束缚。然而，电影似乎仍未告诉我们，迷茫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该如何打破生活“一成不变”的封锁，走出个体主观的桎梏。面对日益增加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匮乏的思想危机，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我们选择寄希望于流动，用流动的精神与肉体去探索新的可能，感受生命蓬勃的生机。在流动的状态下，人们得以依靠更加稳定的内核面对挑战，拥抱开放包容的精神世界。

主编手记

主编札记磨了很久不知从何落笔，还是决定在这里留下些我对“流动”一词的看法。

“流动”，刚定下这个主题时，我会习惯性地想起城市道路上的车水马龙，岗厦北地铁站人头攒动，宝安方向又有飞机划过天空——这些人地维度的变迁，物理空间的位移，可以说是流动，但似乎又和常言的“运动”别无两样。我们想要探讨的“流动”，不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心态。

主动探索的心态。流动（flowing），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方向感。它不似漂流（floating）那么漫无目的，被浪潮裹挟而行，不知身在何方；流动着的人，心中总有一个终点。我们流动，因为我们想听、想见、想寻找、想抵达，于是险阻可以被无视，艰苦可以被笑谈，我们深知向何前进，便不会畏惧路途遥远。

不急不缓的心态。流动是松弛的，既没有激流汹涌的急躁，也不像一潭死水般沉寂。若要为流动配上一个速度，我想大概是上完早十从教学楼踱向快乐食间的样子，以自己最舒适的步伐前进，不受生活压迫，也不让时间蹉跎。流动着的人，总能保持自己的节奏，让自己最快乐、也最不乏意义地生活。

处世自若的心态。流动绝非聒噪的奔腾。万里无云的天幕上亦存疾风阵阵，幽蓝静谧的海域下亦有暗流涌动，面如平湖的上将军亦可胸藏惊雷，愿意去流动的人，往往有更镇定的外在。他们能用恒久稳定的内心，包容流动中的未知，迎接流动中的挑战。流动，赋予人们的除了更广阔的视野，还有更强大的内心。

所以，做一个流动的人吧。流经千帆不执甘苦，流向前方自是归途。

祝一寒

主编手记

人生是不断流动的河流。写下这篇主编手记时已是8月初，我方结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暑期课程学习，回到了熟悉又陌生的深圳。于我而言，深港之间远不只是一河两湾的地理之隔，在城市景观、社会风貌、人文考究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分别。作为一个文化的他者，我游走在港岛各处，领略过维港的海风与太平山的夜景，见识过叮叮车穿梭在熙熙攘攘、人流如注的街道上，精致的现代化摩天大厦与逼仄的居民握手楼和谐共处，别具特色的中英文彩色招牌错落其中，似乎是在为上世纪的旧事作脚注。地铁上随处可见怀抱纸书阅读的老人与青年，星期天的中环附近总能遇到扎堆的菲佣群体在聚会，重庆大厦住着来自亚洲各地的族群，多元的语言习惯、宗教信仰与种族观念交织在港岛的日常实践之中，构建起有别于年轻城市深圳的文化景观。

在香港，我上的一门东南亚民族与文化人类学课程，教授曾带领我们去往九龙城宋皇台附近的泰国街道做田野调查，不仅仅让我们作为旁观者，去观察在港的泰人对印度教的信仰内化与受洗实践（almsgiving），更邀请我们去品尝地道的泰国风味食物，切身体验泰式的冥想仪式（mediation），并与僧侣围绕宗教的现代性进行间接的交流对话（教授充当翻译），这场田野实践是植入原风味文化生态的地理流动。而当课堂上教授为我们逐一介绍东南亚从内陆到海洋的国家时，更是一场文化的祛魅，认知、思想在此间流动，许多此前的偏见与无知褪去。彼时我才知道，野蛮在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仍有迹可循，在柬埔寨曾发生过一场不亚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运动。我才明白，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过的那些如美越战争、越南船民等的基本史实，真实而具象地落在个体之上是如何沉重的影响。当我乘着流动的便利，享受精神的

飨宴时，我不禁对其矛盾性感到疑惑：那些被困在战争、流亡、贫困、矇昧里的人们，他们是否能如我一般幸运地流动？在流动中构建起的主体身份，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客体化某些人群与地区？

在对这个问题不断求索与反思的实践过程中，我逐渐明白，显性的地理流动亦是一场隐性的社会流动，抱着在这其中对流动性、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认知发现的期望，我能更自如地投入到主题报道的编务工作之中。此时，我写下这些文字，又何尝不是我的流动札记。

在本期主题报道中，从流动性的社会出发，我们聚焦探讨了旅游与留学，社会创新与文艺创作方面的流动性，以直观的地理流动开篇，从旅游与留学见闻中去观察流动的生态；接以宏观视角，把流动作为一种资源，去审视社会创新的现状与发展；结尾以个体的微观叙事收束，从电影文艺与哲学思想中去问询流动精神之为何。尽管这些讨论是局限的，并没能明确化的给出关于流动的答案，但它们糅杂在我个人的亲历过程中，仍然予我一些“所谓的答案”：在流动中，得以去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如黑塞诗中所写：“爱流动、爱飞逝、爱生命；爱得宽广而忠贞，绝不爱僵死的事物。”或许流动本身并无意义，意义在于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生命张力的链接，人与人、文明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时而平静平缓，时而欢腾湍急，而所有的起伏都是生命。每一条河流交汇起来，就演变成为人类文明的汪洋。

罗雯静

主编手记

在最后的讨论中，我们选择回归个体生命去感受流动的意义。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浪漫与理想的绚烂烟花绽放时的刹那，而是炸开后笼罩夜幕的尘雾，以至于那份落寞也更为冰冷且经久不散了。

在夏季刊提出“流动”这一抽象主题有我的偏好与期待。流动是一种美好的状态，它是个体生命力的外化，是一种主动点燃内心的热烈。作为学生，我们在夏季似乎更容易接触到人际、地域、文化的流动现象，面临着阶段性结业或漫长的假期。今年的夏天拥有更为特别的背景，三年间断断续续的隔离与静默在今年终于轰然倒塌，溢满的渴望想必会迫切地要冲出樊笼。或许一时间难以拥有回望苦痛的勇气，但是人们一定会珍惜流动的美好。在地域流动与社会流动的两个部分，恰如在选题时预料的，我们记录并呈现的照片与文字拥有令人感动的生命力。明媚的笑容、真挚的采访，同夏天嘹亮冗长的蝉鸣、西瓜切开时迸发的清甜、树叶在烈日下挥散的苦涩汁液呼应成酣畅淋漓的长篇小说。流动的生命力在夏天丰沛、悠长的日子里愈发耀眼了。

然而，不曾意料到的是，一众青年探索出的流动底色隐隐流露出残酷的悲观。第三部分流动意义的再思考是采访教授和参与讨论的同学们分别以自由意志和精神世界为探讨对象的经验分享和想法交流。或许我们曾经过于强调物理意义上的固定，但是精神世界的枯萎和停滞更加普遍且可怕。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存在太多不可避免的循环，灵与肉的流动时常要抵抗现实的幻

灭。我们罗列出生活中短暂精神出走的瞬间，它们是热情的，也是迷惘的。思考者们意识到，单单是承认自己在如来手掌里翻跟斗，就已经需要清醒者莫大的勇气。

此时的我们更惊心于精神流动的价值了。寻觅光亮而无出路，栉风沐雨却无依托，在清醒解剖现实处境后，又该如何继续热爱生活？面对人生走过的短暂道路和未来辽远的岁月，我们隐约察觉到自己的思想需要一次游骋，需要留意一点周围和远方。远行，逃逸，有方向的前进，漫无目的散心，流动的记忆反而为飘忽不定的行者构成精神岛屿，帮助筑起更加稳定的精神内核。精神流动，也就是思绪的抽离游走，作为烟花绽放的刹那，已然为个体的精神世界赋予一束独特的光彩。流动的人们不必惧怕沉寂与枯萎，新鲜的感受与深刻的思索将为精神世界激发萌芽、抽条般的生命力。这份流动的生命力，足以填补悠长岁月的迷惘与渴望。

贾涵

人 物

记录人物故事

Stories about
inspir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PEOPLE



专访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阿里耶·瓦谢尔教授： 从公社鱼塘到学术殿堂

记者 / 董楚珮 刘焯州

撰文 / 董楚珮

编辑 / 胡屹潇



阿里耶·瓦谢尔

阿里耶·瓦谢尔 (Arieh Warshel)，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杰出教授。2013年，瓦谢尔教授因“研发复杂化学体系的多尺度模型”荣获诺贝尔化学奖。除了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荣誉会员外，瓦谢尔教授还获得了诸多奖项，包括2014年生物物理学会创始人奖，2003年托尔曼勋章，2012年获皇家化学学会软物质和生物物理化学奖。2017年，瓦谢尔教授受徐扬生校长邀请，创立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致力于建设成为世界级的理论生物计算中心，并培育兼具理论与应用的生物信息及系统生物学人才。



阿里耶·瓦谢尔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摄影 / 陈鸣

2023年5月10日，瓦谢尔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发表了题为《从公社鱼塘到学术殿堂》的演讲。这是他疫情后首次返回深圳校园，与师生面对面交流。较以往的学术讲座不同，此次演讲，他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和心路历程。为了向同学们解释生物学知识，他还专门制作了动画，并配上了可爱的表情包。讲座结束后，瓦谢尔教授接受了《神仙湖畔》杂志社的专访，他始终面带微笑，语气和缓而亲切，生活化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字里行间伴随着有趣的科普，言语间流露出这位学术大师对年轻一代学者学人寄予的温情与关怀。在交谈中我们逐渐发现，比起绝大多数“成功者”标准的优秀简历，瓦谢尔教授的一生颇为多彩，甚至有些“随意”和“离经叛道”。他与与众不同的登顶之路给同学们带来了许多思考和启示。

从公社鱼塘到诺贝尔奖

瓦谢尔教授是不折不扣的草根出身的科学家。他出生于以色列的一个集体农场（Kibbutz）。在基布兹，鱼塘养殖是人们主要的收入来源，那里的人们坚信“尽其所能，各取所需”的观念，过着公社集体生活。幼时的瓦谢尔与其他孩子一起生活在一个名为“儿童之家”的社区。据他回忆，“儿童之家”氛围温馨，孩子们相处和谐，每天有两个小时与父母共处的时间。就这样，在鱼塘边长大的瓦谢尔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

然而，基布兹不鼓励孩子们去大学深造，公社的人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早早建设鱼塘，为集体创造利润。因此，基布兹的基础教育略显落后。在当时，他们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激励机制。缺席考试的学生受到的唯一“严厉”惩罚，仅仅是不能观看每周的露天电影。除此之外，基布兹的教育重心偏侧雨文学和经济学，科学类课程却少之又少，尤其缺乏理工科启蒙教育，这令从小热爱科学的瓦谢尔深感遗憾。

但即便如此，瓦谢尔仍然从小就和科学打上了交道，并对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课余时间，他给小猫制作降落伞，研究热气球的制作。在基布兹宽松的教育氛围下，那里的孩子因为渴望获得某种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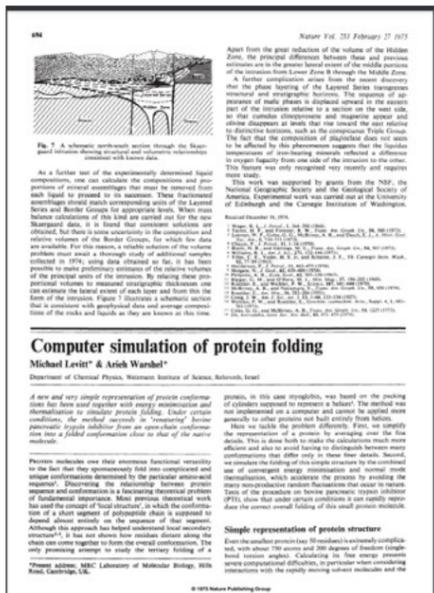
1943年，3岁的瓦谢尔。

义上的身份认同，所以同辈间的竞争欲望竟出奇地强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梦想成为军官或飞行员，盼望着出人头地，甚至改变世界。瓦谢尔也曾如此，在成年后，他离开了公社，进入以色列装甲部队服役，在服役期间他刻苦读书，准备希伯来大学的预科考试，却不幸落榜。几经波折，他最终被以色列理工大学录取。

进入大学，专业的选择又给他带来了纠结和迷茫。他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学科，将来想要从事什么工作。偶然间，一个军官朋友建议他学习化学，原因竟是他认为瓦谢尔视力好，可以敏锐地观察实验现象。就这样，瓦谢尔误打误撞地选择了化学专业，那时的他不曾料到，这看似“随意”的选择，却在日后成为他一生的热爱和追求。

进入以色列理工大学的第三学年，瓦谢尔参加了一个实验项目，观察了酶促化学反应的过程，自此，他这才真正对化学产生了兴趣。在本科期间的研究项目中，瓦谢尔深感人工计算的繁琐，被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威力所震慑，于是从以色列理工大学毕业后，瓦谢尔在魏兹曼科学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开启了研究生之旅，师从使用数字计算机模拟分子研究的 Shneior Lifson（史尼奥·利夫森）。当时 Shneior Lifson 已决定不再带学生，却破格将瓦谢尔拉入一个“尚不存在的科研小组”，收他为徒。从此，瓦谢尔的科研道路逐渐走上正轨。在那时，将新生的计算机技术与传统实验结合是潮流所在，而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也吸引了年轻的瓦谢尔。然而，与蛋白质有关的生物化学反应复杂程度超出了当时计算机的模拟能力。主流学术界甚至一度认为通过计算模拟生化反应是不可能的。但瓦谢尔教授并不相信推测中的不可能，他决定通过实验去验证猜想。通过省略不必要的步骤与简化结构，瓦谢尔最终于 1975 年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个蛋白质的计算建模，2013 年，他因在这一领域开拓性成就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在自传《从基布兹鱼塘到诺贝尔奖》中，瓦谢尔分享回顾了这样一段经历：在“儿童之家”，孩子们每周六早晨都要跑步一公里。瓦谢尔常在开跑时落后，却往往第一个到达终点——这是瓦谢尔整个成长故事的缩影。作为农村出身的犹太



瓦谢尔教授于 1975 年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他也因在“复杂化学体系中多尺度研究”方面的进展获得诺贝尔奖。(Levitt, M., & Warshel, A. (1975). Computer simulation of protein folding. Nature, 253(5494), 694-698.)

小孩，瓦谢尔接受着公社粗糙的教育，经历过纷飞的战火，在鱼塘、餐厅打过工，在部队参加过军，他在颠沛和遗憾中，用热情和毅力在科学的道路上踩下一个又一个脚印。而在社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代，瓦谢尔教授仍然鼓励青年人树立积极的人生观，把竞争的过程看作自我提升的过程，在竞争中挖掘自己的能力，哪怕最后结果不如人意。积极进取的基调贯穿了瓦谢尔的整个求学和科研经历，直到现在，他依然在为实现追求更加精确的医药研发而不懈努力，从未停下脚步。

诺奖后的十年: 没有所谓的“终极”

今年（2023 年）是阿里耶·瓦谢尔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十年。在这十年间，他致力于研究不同疾病中的酶，理解酶的工作机制并预测其变化，从而研发出更好的药物。在他看来，某些人口中的“终极”是一个有些悲观的词，他的科研没有所谓的“终极目标”——他持续地向精准预测药物的方向迈进，在无人之地探索科学的边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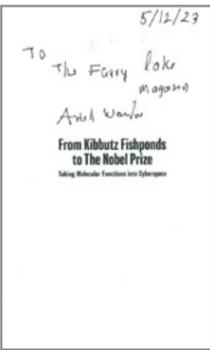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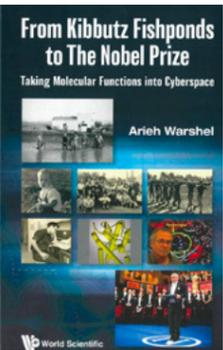
Ⓡ

×

阿里耶·瓦谢尔教授



2013 年，瓦谢尔教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瓦谢尔教授赠送《神仙湖畔》杂志个人自传，并签名。

Ⓡ

×

阿里耶·瓦谢尔教授



瓦谢尔教授与港中大（深圳）师生分享人生经历。

在生物医药领域发展史上，生物抗性一直是科学家们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抗生素的药效趋弱。为解决这一问题，瓦谢尔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依靠计算建模进行药物开发和生物学机制研究，他们在共价抑制剂的研究上亦有进展。对瓦谢尔教授来说，对酶的研究既能解决实际问题，也关乎追求科学发现的纯粹乐趣。“我们只是不断地将我们的方法应用于不同的有趣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乐趣。”就像儿时的他被好奇心驱使研究热气球和降落伞一样，瓦谢尔教授始终保持着对未知的好奇和敬畏，攀登一座又一座山峰。

如今，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给各科研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瓦谢尔教授既看到生物医药领域的未来趋势，也对科学的发展前景存有隐忧。在他看来，人们滥用、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技术，容易忽略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令我感兴趣的永远是‘酶是如何工作的’，而非人工智能。”他认为，人工智能实际上构筑了一道科学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人们越依赖人工智能解决问题，越可能急于学习和理解基础科学知识，这会使得大众与科学越来越远，不利于科学向大众普及。他也并不认为近年 AI 与其他领域的结合热潮就代表着正确的方向，比如 AI 与他所专精的生物医药的结合。“AI 像是一种蛮力”，人们到底能从飞速进步的人工智能技术上学到多少东西，瓦谢尔教授对此尚持有怀疑态度。

筑梦深圳：寄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10 周年

自 2014 年起，瓦谢尔教授便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担任荣誉教授，并于 2017 年牵头成立了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见证了这所大学 9 年间的成长。他多次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同学们送上美好祝福，提出殷切期望；他也多次面向全校师生开办讲座和研讨会，毫不吝嗇地分享自己的科研心得和成果。每次会议，港中大（深圳）的同学们总会积极地讨论，针对专业领域提出高水平的问题。瓦谢尔教授也对港中大（深圳）的国际化教学多次表达赞叹，在他看来，这里的同学们有着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即使是本科生，也能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和港中大（深圳）的同学们交谈，总是令他感到舒适和亲切。

“深圳是我和夫人去过的最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而我也喜欢跟这所大学里脚踏实地、活力无限的同事一起进行科研工作。”深圳这座城市雄厚的科研支持、重视人才和知识的氛围吸引着瓦谢尔教授；而港中大（深圳）的师生们所拥有的对科学的热情和踏实肯干的科研态度，也在瓦谢尔教授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疫情前，瓦谢尔教授曾一年四次探访深圳，在深圳埋下科研的种子，并悉心栽培年轻的研究团队。如今疫情结束，他也第一时间返回深圳的校园，讲述自己的科研往事，为有志从事科研的年轻人迷途指津。瓦谢尔教授希望师生们永葆好奇心、恒心与毅力，认真对待他们的事业与追求。

瓦谢尔教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报以积极的期许，在他看来，大湾区凭借多学科融合之优势，将发展成未来科学之重镇。而对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十周年，他更是满怀期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进步和发展是超出我的想象的。我希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能够继续前进，建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也特别希望医学院能够越办越好，我相信他们能够做到的。”同时，他表示，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也将立足于快速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透过结合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使用计算方法理解疾病的分子基础，探索不同的疗法，对大湾区乃至全世界的生物医药领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Interview with Prof. Arie Warshel, Nobel Laureate in Chemistry: From Kibbutz Fishpond to the Nobel Prize

Reporter/Dong Chupei, Liu Yezhou

Writer/Dong Chupei

Translator/Huang Zihan



Prof. Arie Warshel

Arie Warshel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He was awarded the 2013 Nobel Prize for Chemi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scale models for complex chemical systems. Prof. Warshel is a Member of the USA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He also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Tolman Medal in 2003, and the RSC 2012 Soft Matter and Biophysical Chemistry Award, and the 2014 Founders Award of the Biophysical Society. In 2017, Prof. Warshel was invited by President Xu Yangsheng to found the Warshel 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Biology. The Institute is intended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omputational biology centers, nurturing bioinformatics and systems biology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n 10th May 2023, Prof. Warshel gave a lecture entitled From Kibbutz Fishpond to the Nobel Prize at CUHKSZ.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he visited the campus and met the students and faculty since the pandemic. He used plain language to tell his life journey. To better explain the biology involved, he designed his lecture with specially made animations and adorable memes. After the lecture, Prof. Warshel received an interview with the Fairy Lake. He has a gentle and friendly voice and wore a smile through the whole time. He told the magazine his story and dotted the narration with interesting science facts. Through his words, one can easily feel the care and tenderness this master has for students and younger scholars. We also notice that instead of following a standard path towards success, Prof. Warshel lives a colorful life, which can appear casual or deviant to some. His unique path to the top of his field is a rich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students.

From communal fishponds to Nobel Prizes

Prof. Warshel is a scientist from very humble beginnings. He was born in Kibbutz, a collective farm in Israel. Fishponds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 for Kibbutz people, who live communally and believe in the ethics of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As a child, Warshel lived with other children in a community called the Children's Home. He remembers the warm atmosphere there. Children lived in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and spent two hours a day with their parents. This is his happy and carefree childhood by the fishponds.

However, Kibbutz did not encourage furthe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Children were expected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llective as soon as they can. As a result, they were lagging behind in basic education. Back then, there was no clear learning goals or enough incentives. The only punishment for missing an exam was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weekly open-air movie. Moreover, education in Kibbutz focused more on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Science courses were few and far between. For Warshel, who grew up with a love of science, the lack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his initial education is a life regret.

Despite the unfavorable conditions, Warshel showed a keen interest in science and managed to explore it in his own way. He made parachutes for cats and tried to make hot air balloons. The relaxed educational atmosphere of Kibbutz made their youth crave for identification in other fields. This led to a surprisingly competitive peer group. Most of them dreamed of becoming military officials or pilots, hoping to make a name for themselves and change the world. The same desire drove Warshel to serve the Israeli Armored Corps, where he studied hard and prepared for the matriculation exam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He failed the exam and was eventually admitted by the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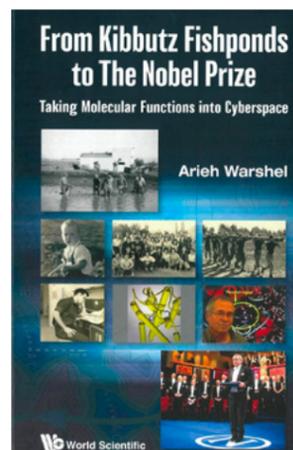


In 1943, Arie Warshel was 3 years o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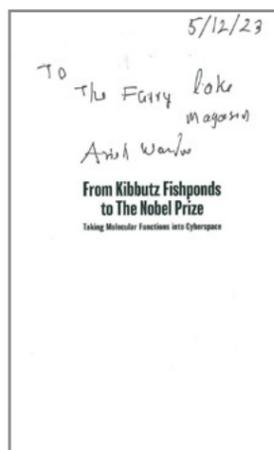
The next challenge for Warshel was to choose a major. He wasn't sure about what subject he liked or what he wanted to do in the future. An officer friend of his suggested chemistry,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that



Prof. Warshel's paper published in Nature in 1975.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his research in multiscale models for complex chemical systems (Levitt, M., & Warshel, A. (1975). Computer simulation of protein folding. Nature, 253(5494), 694-698.)



Prof. Arieh Warshel presented the personal autobiography of Fairy Lake Magazine and signed it.



Ⓡ

×

Professor Arieh Warshel

Ⓡ

×

Professor Arieh Warshel

Warshel had good eyesight and could observe experimental phenomena keenly. Warshel took the advice and chose chemistry. Little did he know that this seemingly random choice would become his lifelong passion and pursuit.

In his third year at the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arshel took part in an experimental program and observed the process of enzyme-mediated chemical reactions. That's when he became truly interested in chemistry. Hi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ject made Warshel realized the cumbersome nature of manual calcu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shocked by the power of computers to process data. After graduation, Warshel began his graduate studies at the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under the tutelage of Shneior Lifson, who is an expert in the use of digital computers to simulate molecular research. Shneior Lifson had decided not to take on any more students, but he made an exception for Warshel and admitted him to a research group that did not exist yet. Since then, Warshel's research started to get on track. Back then, the combination of new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experiments was the trend.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 attracted young Warshel.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protein-related biochemical reactions was beyond the then simulation capabilities of computers. Mainstream academics even thought it impossible to simulate biochemical reactions. But Warshel did not take these assumptions for granted. He decided to test it through experiments. By omitting unnecessary steps and simplifying the structures, Warshel completed the world's first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proteins in 1975.

In 2013,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for his pioneering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In his biography, From Kibbutz Fishponds to The Nobel Prize: Taking Molecular Functions into Cyberspace, Warshel shares an anecdote from when he was in the Children's Home: Children were required to run one kilometer every Saturday morning. Warshel was often lagged behind in the beginning, but ended up the first at the finish line. This is an epitome of Warshel's entire life. As a Jewish child from the countryside, Warshel received poor education in the collective farm. He went through wars, worked in fishponds and restaurants, and enlisted in the army. With ups and downs, he stepped on the path of science with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and went forward step by step. The current world is one with fierce competition. Prof. Warshel encourages young people to have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to see competition as a part of self-improvement, and to release full potential through it.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results. The same optimism has been present in Warshel's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To this day, he is still working tirelessly in the pursuit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n years after the Nobel Prize: There Is No Ultimate Goal

Two thousand and twenty-three marks the tenth year since Prof. Warshel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the past decade, he worked on enzymes involved in different diseases. By understanding how they work and predicting their changes, better drugs/medicine can be developed. In his view, the word "destination" is kind of pessimistic. In his research, there is no so-called ultimate goal. He is still aiming at more accurate drug predictions and exploring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 where few could reach.

In the history of biomedicine, drug resistance has been a huge challenge for scientists. Over time, the efficacy of antibiotics weakens.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Prof. Warshel and his team for drug development and biological mechanism studies using computational modeling. They are also making practical advances in studying covalent inhibitors. For Prof. Warshel, the study of enzymes is as much about solving problems as it is about the sheer jo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We just keep applying our approach to different interesting problems and having fun in doing it." Just as he was driven by curiosity to study hot air balloons and parachutes as a child, Prof. Warshel keeps his curiosity and awe of the unknown, which have driven him to conquer one challenge after another.

Today, the boo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bring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scientific industries. On this topic, Warshel sees the future trends of biomedical field and has his concerns. In his opinion, misuse of or over-dependence on AI could imped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



In 2013, Prof. Arieh Warshel was awarded the 2013 Nobel Prize for Chemistry.

“What intrigues me is always how enzymes work, not AI.” He believes that AI constructs a chasm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 more people rely on AI to solve problems, the more they are likely to neglect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basic science. This will push the public away from science, instead of bringing the two closer. He also doesn’t think the recent boom in combining AI with other fields, such as biomedicine, necessarily represents the right direction. “AI is similar to brute force.” Prof. Warshel remains skeptical about how much people can actually learn from the rapidly advancing AI technology.



Prof. Warshel speaking at CUHKSZ.

Ⓜ

×

Professor Arieh Warshel

Ⓜ

×

Professor Arieh Warshel

The Dream of Shenzhen: A Message to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Prof. Warshel has been an Honorary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since 2014. In 2017, he 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arshel 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Biology. Over the past nine years, he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He has spoken to students with his best wishes and high expectations on numerous occasions, including inauguration and graduation ceremonies. He has, for many times, given lectures and held seminars for students and faculty, sharing his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Each time, students join in the discussion actively and raise relevant questions. Prof. Warshel has also expressed his recogn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teaching in CUHKSZ time and again. He thinks students here are very expressive. Young as undergraduates, they are able to discuss science freely in English.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always make him feel welcomed and energized.

“Shenzhen is the most energetic and attractive city my wife and I have ever been to. My co-workers here are down-to-earth and energetic. I love doing research with them.” The city’s generous support for research and emphasis on talents and knowledge appeal to Warshel. He is also impressed with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at CUHKSZ because of their passion for science and diligence. Before the pandemic, Warshel used to visit Shenzhen up to four times a year. He puts great efforts in cultivating his research team and planting the see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Shenzhen. Now that the epidemic is over, he has returned to the campus as soon as possible. He shares stories of his researches and provide guidance to young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f. Warshel hopes that students and faculty here will stay curious, persistent, and persevering and keep pursuing their career.

Prof. Warshel has great expect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e believes it will evolve into a major scientific center by virtue of it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UHKSZ goes beyond my imagination. I hope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and establish itself as a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worldwide. I also especially hope that the medical school will get better and better, which I believe they can do.” What’s more, he said that the Warshel 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Biology, based in the rapidly developi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ll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omedicine by combining bas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using computational 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basis of diseases, and exploring various therapies.

长夜明灯： 文化研究的赤诚与理想

——专访人文社科学院李潇雨教授

记者 / 周凯怡

编辑 / 叶润博



李潇雨

李潇雨，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部副教授（教学），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哲学博士。李潇雨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视觉研究、空间研究，中国文化与现代性批判和中国现当代文化政治。近年来，李潇雨教授在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包括《地方传统、国家政治与边疆秩序——从民国西康考察影像出发》《中国早期摄影中的“边陲影像”——以莫理循镜头下的西北与西南为例》等。



李潇雨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祝一寒 / 摄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文化这一概念似是既日常又遥远的存在，而“文化研究”更是一个小众且神秘的学术领域。“文化”二字，赋予这一研究领域广博的讨论议题。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文化研究是怎样独特的视角看待庞杂的文化议题的？一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对于社会又有着怎样的观照？为什么社会与个体需要文化的滋养？在本期人物栏目，让我们随着李潇雨教授的讲述，走进文化研究，发掘人文学科之于社会的更多可能性与修习人文之于个体的深远影响。

从学生到学者——探寻“文化研究”独有的生命力

李潇雨教授虽已在文化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但从本科学习到学术研究，她走的并非是一条“线性”路径。在本科阶段，李潇雨教授就读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直到博士阶段才投身于空间与文化政治以及视觉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在采访中，李潇雨教授谈道，文化研究的概念是在某个时刻突然从脑海中跳出来的，事先并没有任何的征兆，决定硕士要去念这个方向几乎可以算是一种心血来潮。她也提到，自己没有像现在大多数同学那样做了许多功课或者咨询学长学姐，当时甚至连文化研究是什么尚不清楚，但这种感觉就仿佛某种突然出现的准星，指引着自己走上这条道路。

在李潇雨教授最开始接触这一领域的时候，虽然她大体知道文化研究是讨论诸如身份政治、大众文化此类的话题，但实际上对于这些宏大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归属感，整个的研究过程显得单薄苍白又无从下手。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李潇雨教授逐渐发现了文化研究独有的生命力。她强调，文化研究的对象具有强烈的“当下性”：“这并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研究领域，而是非常接地气的，需要不断地面对当下真实发生的事情，并即刻给出批判思考后的回应。”李潇雨教授回忆起自己曾研究过的一个议题，即“能否通过一种运用于艺术创作中的方式来实现城中村的活化，从而带来更加‘正义’的居住空间”？所谓的“空间正义”指的是使得不同社会群体能够相对平等、动态地享有空间权利，并且能够自由地进行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理想状态。这个问题便是扎根于当下的社会土壤，回应了一定的社会关切。并且，在李潇雨教授看来，文化研究从来不是盖棺定论的，而是需要伴随着社

会文化的迭代而不断地进行完善，这就要求研究者拥有对时代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于社会的深切关照，也正是这种不断演进的变化和对时代当下的关切推动着李潇雨教授在这一领域持续深耕。

时下，新的文化议题不断涌现，但从研究层面来说，每个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有自己专攻的方向，并不会刻意追求“立新”。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的能力：面对大同小异的生活，身处一个具体的时空，如何去看待某个事件的发生，其与历史、与文化是否有一些深层次的联结？在这一点上就要求文化研究者能够在自己的领域不断思考与构建，并且对于不同研究领域的人来说，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会完全不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场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地，而做学术研究就好像在不断地挖掘自己的阵地。”李潇雨教授提到，同一导师门下的学生也会选择不同的文化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放映问题，火车作为速度的象征在20世纪文学中的流变，小型音乐演出的文化研究，而自己做的是摄影与国家转型的关系。尽管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所有文化研究者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向同一个命题，即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观照与回应，这即是一个文化研究学者的真实写照。

成为一名“反叛者” ——赋予文化研究历史的视野

“文化研究”涉及“文化”这一抽象概念，而文化本身是个覆盖面非常广泛的对象。在李潇雨教授看来，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许多其他学科的理论都可以应用的文化研究上，例如文学中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的理论、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人类学研究等等。

但与此同时，文化研究有着不同于众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聚焦边缘化的群体。李教授提到，严格来讲，文化研究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战后的英国，与当时流行的新左派研究、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所关注的对象也

聚焦在那些在传统研究中里被压抑的、不被看到的底层大众。面对一个文化产品，文化研究关注的并非是产品创作者的想法，而更多是产品的受众。可以说，在文化研究的建立之初就带着强烈“反叛性”，关注庶民，与已经建制的正统做出反叛。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似乎也正因为其强烈的当下性，文化研究往往与政治事件、社会公共事件关联更紧密，这无形之中也把文化研究的议题限定在一些特定的束缚性框架中，例如性别政治、身份政治等。但是在李潇雨教授看来，文化研究不应是政治与社会学的进一步阐述或者仅仅为其提供另外的角度，而应当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某种属于文化本身，超越政治的意义。“当我慢慢地、真正地进入到了学术研究的脉络里面之后，我发现我内心中也存在着一种‘反叛’，我不满足只做当下的研究，或者说我不希望文化研究、视觉研究仅仅和当下做连接。”在李潇雨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她探讨了晚清时期外国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照片的运镜问题，而后顺着时间脉络，李潇雨教授继续做了关于20世纪中国边疆摄影的研究。李潇雨教授说：“文化研究虽然着眼于当下的社会问题，但也应拥有对历史的回溯。如果仅仅关注当下，而忽略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史和历史视野的可能性，那么文化研究就好像局限于对当下社会议题的回应。”



庄学本《甲甲乡山子瑶水稻丰收》，1952年。



庄学本：《青海军之骑术》。

Ⓡ × 李潇雨教授

Ⓡ × 李潇雨教授

同时，对历史的研究也并不意味着与当下脱节。在李潇雨教授看来，历史乃是对过去发生过的事件的阐述：“当我们回溯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叙述方式，我们关注的议题或者我们得到的启示，都会受到当下时空的影响。”以李潇雨教授所研究的晚清时期摄影作品《甲甲乡山子瑶水稻丰收》和《青海军之骑术》为例——这些摄影作品诞生于晚清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即中国发展相对落后、而西方人对自己文明充满信心的时代。在这样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所诞生的作品自然会具有某些特定的倾向性。通过对这些摄影作品的鉴赏，我们往往能够从中发掘出这种意图倾向性以及背后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这种解读与阐述话语往往也会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转变，伴随着90年代中国兴起的老照片热潮，这些百年前的摄影作品被重新整理出版，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人们对于这些照片的信息解读与价值挖掘便与它原初的语境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照片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遗物，而与历史叙述有着直接的联系，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并且，对整体历史化过程的宏观了解也会让我们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回应更具有前瞻性。李潇雨教授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往往被认为是线性发展一往无前的过程。然而在这其中，文明的进程却并非一直进步，而是产生了更多危机，

尤其是在精神层面，我们当下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也并非凭空产生，而都是在一个很具体的历史时空里逐渐衍生，有着其历史发展的依据可循。因此，当我们在追根溯源时，也是在理解它的孕育过程。”

生活的细水长流 ——人文的滋养与价值

尽管文化研究讨论的议题十分广博，但其目前在中国仍属于一个相对小众的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研究氛围与概念体系尚不完善。并且，不仅仅是文化研究，如果将问题放置在全球范围来看，人文学科整体的发展都已在渐渐式微。但在李潇雨教授看来，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人文学科在就业上已是“红海”。比方说，在买一杯奶茶的时候，其品牌的设计需要文化的内涵；在游戏设计中，需要造梦，也需要讲好故事。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势必会伴随着物质的繁荣而持续增长，这个世界并不会在某一天挥别人文。它们将共同书写全人类的语言，并且探索着关乎本心与永恒的命题。另一方面，人文教育也能够现实性使我们脱离日益激化的竞争泥沼，给我们带来更平衡的生活。当人为自己的世界建构起环环相扣的推理链条，在精密的计算与谨慎的推断中生活，社会人文的指导便能帮助我们从小空间的困囿中抽离出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审视生活，避免沦于“眼前的苟且”与自我的绑架。

关于人文与文化，它所要求的并非秋月轻云之上的浪漫，而是提醒着我们何以维系作为人类脚踏大地田野的安宁，正如《死亡诗社》里的台词所说，“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李潇雨教授与《神仙湖畔》学生记者合影。祝一寒 / 摄

通识教育：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专访人文社科学院 蔡一帆教授

记者 / 张恩禧

编辑 / 惠诗雅



蔡一帆

蔡一帆，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克拉克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人文地理、科学技术研究（STS）以及环境与可持续研究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教学），教授本科生通识教育及研究生城市学项目的课程。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本科教育重要的一环，通识教育兼融中国人文理想和西方博雅教育，学生可以通过阅读经典，反省人类恒久关注的问题。在本期人物栏目，蔡一帆教授从自己教授通识教育课程的经历和感悟出发，与我们一同探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思考当下学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蔡一帆教授接受《神仙湖畔》杂志专访。惠诗雅 / 摄

象牙塔内：研究方向与教学感受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蔡一帆教授一直在攻读地理系专业。地理系包罗万象，蔡一帆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对较广。她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与导师影响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可以用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的相互关系来形容，学者一方面应该顺应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庞加莱所反对的过于实用导向。

蔡一帆教授目前开设本科生通识教育及研究生城市学项目的课程。她认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授课体验有所不同。这里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

首先是课堂氛围。由于研究生城市学硕士项目的学生人数较少且核心课程重合率高，同学们之间大都彼此认识。相较之下，由于本科生并没有设置行政班，选择同一门课程的同学大多互不相识，课堂氛围会有所区别。诚然，没有行政班给予了本科生同学们更多自由，但这也可能导致部分同学因为无法在宿舍外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交关系，而感到安全感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学会容易陷入向外比较的怪圈，通过成绩甚至社交平台的互动数等较为单一线性的指标去进行自我定位和认同，这恰恰是内心不安全感的体现。对此，蔡教授指出：“一味地向外比较而非向内求索无法收获真正的安全感。”

其次是绩点焦虑。相比研究生，本科生的绩点焦虑更为严重。以某些人文社科学院开设的必修课程为例，由于人文素养、英语能力和批判思考通常难以短期速成，部分同学可能会产生焦虑、沮丧、自卑等负面情绪。对此，蔡一帆教授认为，这些学科素养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其实是学生的社会文化资本，但现有的评分制度只按照学生的绝对水平而非相对提升水平来打分，未必能达成真正的公平（equity）。而恰恰是因为这样，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看到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多维度的，单一线性的衡量有其局限性。

此外，蔡一帆教授还提到了绩点焦虑引起的“原子化”问题。受绩点焦虑影响，同学们有时很容易将其他同学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与东亚社会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是紧密相关的。蔡教授坦言，“原子化”的本质是温和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将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因素，从而合理化结构的不公平。当下整个社会的过度内卷迫使大家进入无限延长的被比较和竞争的过程，这加重了同学们的焦虑。

“教育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没有人上人。”蔡一帆教授引用这句话来说明一个好的教育制度或者社会，应当能够让普通人而不只是一小部分精英过上好的生活。在过度内卷和单一的评价体系下，在主流评价体系中无法如鱼得水的同学因为缺乏兜底的安全网，就会承受较大的心理负担。“学校和教师应当发现每个人的闪光点，偶尔教导、常常帮助、总是陪伴，让每一位同学都能获得应有的关注。”

时代之声：交叉学科与社会需求

蔡一帆教授授课的“GFNI000：与自然对话”是一门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横跨文理的交叉课程，蔡一帆教授首先就思想史进行了简单介绍。英文中的“science”可以追溯到拉丁文中的“scientia”或希腊文中的“episteme”，其原意为不区分文理的科学。在英语中，“science”的前身是“natural philosophy”，牛顿、伽利略等同时代的科学家都会自视为“自然哲学家”。直到19世纪，“science”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的含义，即狭义上的自然科学。这种学科分类和细化可类比资本生产体系下的劳动分工，其根本目的是提升效率。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分工会造成人的异化，学科的分类和细化也可能使学者的劳动发生异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理兼修是学者的常态，自然课阅读的文本作者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以及沈括等都是典型的例证。近现代的学科的细化分类如同在土地上实行承包制，然而，蔡一帆教授提醒我们“所有学科大树的根扎向同一片土地，枝叶仰望同一片天空，承受同一个太阳的光泽。”

在蔡一帆教授看来，通识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自由和整全的公民。随着时代的发展，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文科教育却遭遇质疑。从表面上看，放弃人文教育似乎是人们主动选择的后果，但本质仍是社会或教育的不公平。尽管无法改变社会结构，蔡教授坦言在她的理想社会中，人人都有资格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而她的努力也旨在于此。

关于文科教育遭受质疑的问题，蔡一帆教授坚定地相信：“永远会有人选择从事人文社科研究，而这正是人文社科的魅力所在”。当今受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与使用价值（use value）扭曲的影响，人文社科被普遍认为投资回报率较低。但是，人文社科仍有其永恒的内在价值，因此始终会有人选择并坚守于此。

R

×

蔡一帆教授

R

×

蔡一帆教授

冰川之下：人与科技的交互关系

当下，科技似乎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的影响。对此，蔡一帆教授认为，当人们在批判科技的弊端时，更要意识到科技背后的使用者。科技本身具有工具属性，它的作用之一正是让始作俑者的责任变得更为隐蔽且模糊。《人物》杂志曾刊登了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发了人们对外卖骑手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所导致的安全事故的思考，她曾以此作为案例让同学们讨论，设计算法的程序员是否也需要为此负责。蔡一帆教授指出，工业革命之初，人们对机器普遍持乐观主义态度，然而，马克思却批判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因为他认识到机器会加深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和剥削，使社会不平等进一步恶化。福柯也指出了权力与知识的相互作用。因此，科技弊端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为何人所用。

今年科技的一大突破是 ChatGPT 横空出世，学校教育应该如何应对生成式 AI 的问题引发了教育界的热议。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教学与考核的形式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调整。蔡一帆教授提到，有同学依赖 ChatGPT 偷懒而不去阅读文本，这是不可取的行为。她指出，ChatGPT 本身不具有批判意识，仅仅是拾人牙慧，而经典则是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作品历经世代保留下来的结晶。此外，针对 ChatGPT 的面世，蔡一帆教授对自己教授的“GFNI000：与自然对话”的学期论文题目进行了新的尝试：同学们需要对 ChatGPT 关于题目的回答进行批判性评议。蔡一帆教授提到，她将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继续探索积极应对并利用 ChatGPT 的方式。

随着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人们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必定会迎来巨大的变革。变化是永恒的，而不变的则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蔡一帆教授认为，她能做的是好好上通识课，也期待同学们能以非功利的态度学习人文社科课程：“如果说专业课能够帮助你飞得更高，那么通识课更关注你的飞行方向是否正确、飞行过程是否疲乏，以及飞行本身是否是你真正想做的事。”

走出学术的象牙塔，聆听时代的呼声，切实地关注生活，探索未来发展的可能。蔡一帆教授与我们对话、反馈、往复，带来她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与建议，引领我们与时代激流相拥。

**From in-depth
learning to
creative thinking**

i 思享

课程启迪 思辨延展

**CLASSROOM
DISCOVERY**



Utility Or Flourishing: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tilitarian and Aristotelian Views of Happiness

Author: Wang Yixin

Instructor: GFH Teaching Group



Both Aristotle and Mill illuminate what individuals ought to do to achieve the supreme happiness (Crisp, 1998, p. 5). In his work *On Liberty*, John Stuart Mill regards utility as “the ultimate appeal on all ethical questions” (Mill, 2008, p. 15), that actions are right if they tend to promote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Mill, 2008, p. 160). However, for Aristotle, the supreme end for human being is eudaimonia, which indicates doing what humans do well or flourishing, in accordance with complete virtue (1098a).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Mill’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pleasure) and the Aristotelian conception of happiness (eudaimonia), I will argue that (i) Hedonistic happiness, even of high quality, does not guarantee a virtuous and flourishing life; (ii) To regard utility as the only standard for morality is insufficient, and will not lead to the maximization of happiness; (iii) Eudaimonia is final and self-sufficient, but human beings do not always pursue it spontaneously.



The Aristotelian and Utilitarian ideas first differ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In his *Utilitarianism*, Mill argues that the criterion for utility, is to promote the greatest happiness. “By happiness is intended pleasure, and the absence of pain; by unhappiness, pain, and the privation of pleasure.” (Mill, 2008, p. 161) Mill interprets happiness from a hedonistic perspective, that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is about pleasure, which alone is good, true, and thus desired. Intrinsically, such pleas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subjective, individual feeling. Different from Mill, Aristotle believes to achieve happiness or eudaimonia, human beings should realize their “human potential”, and do what humans do well as “man’s proper fun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omplete virtue, in a complete life (1098a). Here, the Aristotelian happiness becomes more lasting and is extended to the entire human species.

However, we cannot simply infer from the hedonistic nature of utilitarianism, that pleasure in Mill’s view is less elevated. Firstly, in *Utilitarianism*, Mill emphasizes that the quality of pleasure overweighs the quantity (Mill, 2008, p. 163), and argues “some kinds of pleasure are more desirable and more valuable than others”, for the preferred enjoyment is superior in quality (Mill, 2008, p. 162). As is illuminated by Mill, “It is better to be a human being dissatisfied than a pig satisfied; better to be Socrates dissatisfied than a fool satisfied” (Mill, 2008, p. 204), because pigs and fools never consider problems on other aspects, thus their pleasure lacks nobility and higher value. Moreover, as an empiricist, Mill endorses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ity by “experiments of living” in his work *On Liberty*, that “the worth of different modes of life should be proved practically”, and obtained through one’s own experience. Additionally, Mill believes people should exercise their understandings rather than mechanically adhering to customs, for “human nature is not a machine...but a tree, which requires to grow and develop itself on all sides, according to the tendency of the inward forces which make it a living thing.” (Mill, 2008, p. 72) These propositions make Mill’s theory of pleasure more elevated and complicated.

Whereas, I will argue that even if one adapts to Mill's higher-quality happiness, it does not guarantee a virtuous and flourishing life. A thought experiment for this is a pleasant-experience-generating machine (Crisp, 1998, p. 19). Assuming that when plugging into the machine, one is exposed to more pleasant experience than painful ones. In other words, he is able to perceive the durable, intense pleasure via his own experience (more accurately, his perception of experience) throughout his life. Nevertheless, the possibility is that a sensible person will still reject this life and consider it as a violation of dignity, not only because such pleasant experience is artificial and machine-reliant, but also because it lacks one's real efforts and assiduous pursuit, which is beneath human character. Therefore, the problem implicit in Mill's argument is, personal practice of the higher quality of pleasure, is separate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pleasure. In comparison, Aristotle illustrates the lifelong practice of virtue in *Nicomachean Ethics*, that the human good should be "activity of the sou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st and most complete virtue", and moreover, "in a complete life". "For 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pring, nor does one day; nor, similarly, does one day or a short time make us blessed and happy" (1098a20). Here, happiness becomes more durable and cohesive, not only because it is regarded as a lifelong pursuit, but also because it is in accord with the practice of complete virtue. In conclusion, to achieve a virtuous and flourishing life, the utilitarian view of happiness, even of high quality, is insufficient and somewhat unstable.

Secondly, Mill and Aristotle hold different views towards the position of morality in the good life of individuals. According to Mill's Utilitarianism, one's moral duty is to maximize happiness. Mill believes utilitarianism is "the only reasonable standard of morals". That is to say, morality consists of the maximization of overall pleasure (Crisp, 1998, p. 19). As for the external sanctions, a legible standard Mill suggests in *On Liberty* is the harm principle. Mill believes "individual is not accountable to society for his actions, in so far as this concern the interest of no person but himself" (Mill, 2008, p. 121), that individual freedom can only be restricted by the sovereignty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In other words, if a person's action does not harm others, there should be "perfect freedom, legal and social, to do the action and stand the consequences" (Mill, 2008, p. 97). However, if the argument is true, then playing truant from school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maximization of pleasure, in that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pleased with more leisure time, and there is no violation of moral principles, nor hazard to other people. Indeed, momentary pleasure is obtained, but in the long term, it leads to banal and vacuous human life. Therefore, we can conclude that Mill's morality sanction becomes problematic, because (i) it regards the maximization of happiness as the end, but unlike eudaimonia, such happiness is not self-sufficient; (ii) the harm principle does not provide enough restriction to instruct human action, and excessive freedom is likely to cause chaos in society and banality in individual life.



In comparison, for Aristotle, to pursue happiness, we need to examine virtue, for "happiness is a certain sort of activity of the soul in accord with complete virtue" (1102a5). Here, Aristotle believes eudaimonia is complete and worthy in itself, around which all human actions are oriented, thus is final and self-sufficient. However, different from Aristotle, I will argue that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human beings will always pursue a flourishing life spontaneously. If virtue and morality is desired regardless of profit, power, and any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then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in *Republic*, Gyges of Lydia stole the ring that could endow him with the power of invisibility, and finally murdered the Lydian king (359d:360b)? Undeniably, apart from the pursuit of virtue, human desires can also be driven by egoism and self-interest, which are not always compatible with virtue. Moreover, written in the context of slavery society, Aristotle's ethics were targeted at aristocracy in a higher pursuit of excellence, thus inevitably has its limitation, for slaves, businessmen, and even politicians, are not likely to regard the flourishing life as their ultimate goal.

In conclusion, Mill's conception of pleasure and the Aristotelian conception of eudaimonia differ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the levels of happiness, and the place of morality in happiness. Moreover, hedonistic happiness, even of high quality, does not guarantee a virtuous and flourishing life, because it is temporary, personal, and thus unstable. To regard utility as the only standard for morality is insufficient, and will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maximization of happiness. In comparison, eudaimonia is final and self-sufficient, but it neglect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es, self-interest, and human egoism, because of which people do not always pursue a flourishing life spontaneously.

References

- Aristotle; Irwin, T. (1999). *Nicomachean Ethics*. Second editio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Mill, J. S. (1859, 1871 [2008]). *On Liberty & Utilitarianism*. Bantam Classic.
- Mill, J. S.; Crisp, R. (1998). *Utilitaria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lato; Griffith, T. (1997). *Plato: Symposium and the Death of Socrates*. Wordsworth Editions.
- In *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nd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89-144.
- Plato; Waterfield, R. (1993). *Republic*. Oxford World's Classics.

洋甘菊的金色年华

——记图书馆“书林漫步”系列讲座
《从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说开去》

记者 / 王 菁

编辑 / 叶润博

俄罗斯，充满陌生与神秘的气息，这是一个因广袤而心怀故土的民族，也是一方饱含热血与历史的土地。这里曾诞生无数天才作家，缔造了无数不可磨灭的文学瑰宝，他们共同见证了独属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亦锻造了俄罗斯坚韧深邃的民族底色。

2023年4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与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书林漫步”系列活动，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语言系邹璐薇老师受邀做客活动，带领我们走近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几位作家和那段饱含深情的岁月。从不断追问生命意义的托尔斯泰到现代戏剧大师契诃夫，邹老师用两个小时回溯了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发展脉络，于现实主义的细腻隽永翩然身至现代主义的神秘朦胧之下。



人物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分别为亚历山大·普希金、米哈伊尔·莱蒙托夫、伊凡·屠格涅夫、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大致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延续至19世纪末，始于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终于短篇小说圣手契诃夫，其文学领域主要覆盖诗歌和小说。在这一阶段，现实主义文学高度发展，一度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西方文学史上公认的三个辉煌时代，分别是：古希腊时期，莎士比亚时期和19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文学对世界文明影响之深远。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学对俄罗斯民族崛起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12年卫国战争和彼得大帝改革后，俄罗斯领土得到了显著扩张。俄国兴办工业，发展报业，组织学校教育，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都取得快速发展，不断向欧洲强国靠拢。但即便如此，欧洲许多国家仍不认可俄国的地位，并不将其视为欧洲大家庭里的盟员。当俄国在军事能力上日渐强大起来，其精神文明的结构性匮乏愈发凸显出来，国家文化建设便显得尤为迫切。而黄金时代的到来，则弥补了这一短板，为俄国的崛起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文化之力，彰显出的是民族的重量、国家的分量和社会的体量。俄罗斯文学通过对俄罗斯民族异彩纷呈的文化生活和波澜壮阔的时代特征摹刻与落注，旁观着社会的发展历程。俄罗斯的民族气质由此焕然一新，至此，俄罗斯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强国。

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础。

这是习近平于2013年3月23日首次访俄时发表的演讲，所提到的6位作家均是“黄金时代”下的代表人物。邹老师从这段演讲中提到的6位作家落题，带领大家一同“见证”黄金时代的转圜：具有1/8非洲血统的普希金，与其粗犷狂野的长相看似矛盾的细腻文学风格；身披标志性红色外套、勾绘“普希金之死”的诗人莱蒙托夫；目光深邃、神情忧郁的是代表俄罗斯文学广度的列夫·托尔斯泰；与其相对的是脸色苍白、挖掘地下室人潜意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着俄罗斯文学深度。

不同身份下的精神剖析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俄国重要的“心理描写”大师。相较而言，托尔斯泰更擅长描摹人物心理变化历程，并投射自我对于现实社会的态度和灼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侧重于挖掘人物生命中的几个瞬间，揣摩产生“突变”的内核原因，并剥离自己的情感写照。前者侧重社会性和个人心理的书写，后者则更关注哲学性和道德性的意析。

毁灭与重构 ——《安娜·卡列尼娜》的诞生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崛起的里程碑，也是19世纪俄国批判精神的代表作。全书主要以安娜的人生展开：生于俄国贵胄之家的安娜，命运即为担任上流社会高官的夫人。俄国宗教教条赋予她的“贤妻良母”头衔和丈夫日复一日重复性的“礼节式”交流，让她很难触及人性的流动或感受到激情的喷涌，她对机械化的丈夫和程式性的婚姻生活十分厌倦。而与渥伦斯基在火车站的相遇与几番接触，安娜一直静淡入水的内心逐渐泛起了“涟漪”，在渥伦斯基几番追求之下，安娜接受了他的表白，在平安生产之后，与渥伦斯基一同赴欧洲旅游。然而在得知安娜一家的绯闻传奇之后，原先的贵族圈开始排挤安娜，但仍对渥伦斯基热情以待。安娜可以看淡虚伪无情的贵族阶级，而渥伦斯基却无法抛弃构筑起他生活的一切。爱意易逝，相比于男欢女爱之情，渥伦斯基更倾慕执着于上流社会的地位与权利，因此放弃了安娜。在无尽的纠结与对爱意的失望之后，安娜选择了跳轨自杀。书中暗含了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安娜·卡列尼娜对“自我”的唤醒、追逐与陨落，第二条线则描写了列文的精神探索和他与吉蒂的家庭生活。前者既是贵族阶层虚伪堕落的照妖镜，也是对于人类情感良知的叩问，具有永恒的意义；后者则在精神困境中上下求索，希冀和谐与永久的安宁，但最终回到宗教理论找寻自我解脱。

在简要回顾《安娜·卡列尼娜》大体文章脉络之后，邹老师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为什么小说明明是两条线，而小说名字却只用安娜·卡列尼娜一个主人公，而非同时用两个家庭来命名？

鲁迅曾说：“悲剧是人们把美好的事物摧毁给人们看。”越是美好的事物，其毁灭和消逝越是能震撼人心。安娜·卡列尼娜及其沙俄时代上流社会的纠葛牵绊就是一条毁灭的故事线，也许托尔斯泰正是要借助这样一个美好女性的毁灭，来达成更为深远的目的，即对于整个社会现状的敏锐刻画：1861年沙皇政府试图通过极度虚伪、自上而下的方式废除农奴制以防止阶级革命的发生。《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背景正是在农奴制改革后，社会人心处在一种不安感和无序感中，而这样的无序感与虚伪在一个美好女性遭到毁灭时，便越发刻骨铭心。这也正是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他本人出身贵胄，先天的贵族背景令他对于上流社会云谲波诡和自私伪善的本质深有感触，通过刻画安娜一生的种种遭遇和周边人对她的讽刺、批判和无视，一整幅俄国贵族的百态便跃然纸上，展现出超越现实的力量。同时，正在经历俄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宗法文化冲突时代的托尔斯泰碍于贵族身份，纵使对农民有同情，也无法彻底背叛原有阶级，最终只能通过列文对改革制度精神探索路径抒发自己的迷茫与不安。

由此便有了列文对社会现状进行的精神探索和改革之心，这是一条重塑线，暗含着希望与重构。毁灭线的作用是揭示，托尔斯泰通过对安娜在被“爱情”唤醒之后遇到的种种，揭示俄国贵族社会虚伪腐败的社会现实；重塑线则是探索，托尔斯泰将仍未完成的个人精神探索寄托在列文的种种纠结与困苦之中。以“揭示”晦暗现实为重点，暗含对“未来”光明的憧憬。



《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版封面图。

在此，邹老师重点解析了《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版的封面，这张封面是对安娜在莫斯科参加舞会的刻画，是一切“欲望”涌动的开始：安娜身着黑色礼服，像一只与众不同、风华绝代的黑天鹅，“黑天鹅”亦有引发一系列后续严重后果的突发事件的隐喻，如同这场舞会是沃伦斯基做出追求安娜的决定的时刻，也是安娜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而背景里密密麻麻的枝叶亦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也象征着安娜自身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原始欲望，因为长久的压抑导致了安娜难以驾驭这样的欲望，加之无尽的束缚与矛盾拉扯，暗含了安娜最终将被这样的生命力吞噬，而逐步走向毁灭的结局。

与安娜的人生悲剧不同，托尔斯泰面对生活的撕裂与内心痛苦，则是选择不懈地求索与找寻，找寻使得全人类获得幸福的思想武器，找寻超越时代与个人命运的永恒性，终其一生以自我放逐的决绝与理想搏斗，然其内心却珍藏着一个温暖的童话。在托尔斯泰长眠的小树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托尔斯泰的父母早亡，一直以来是他的哥哥抚养他长大。他的哥哥曾对他说，他们的庄园里长着一个绿棒，只要找到小树枝，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类变得幸福，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变成蚂蚁兄弟，没有争斗与不公。他后来回忆此事时写道：“我当时相信有这样一根神奇的小绿棒，上面写着消灭人间一切的罪恶并且能给

人们带来巨大的幸福的方法，我现在同样相信这种真理是存在的。”纵观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们能够发现他的一生其实也在不断追求可以让全人类幸福的秘密，无论是他从事农奴制改革道路的探索或是文学创作，都是在向着温暖和光明的地方前进。

《罪与罚》——良知与理性的碰撞

如果说，托尔斯泰象征着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着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与托尔斯泰一生能够接触多种阶层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艰苦困顿，充满悲剧变故，写作是其赖以谋生的最重要的手段。这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陀氏“幻想的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他并不着眼于全然的纪实，而更注重审视人性本身并探究人生本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数年苦役生活造就了他略显病态的写作风格和独特的哲理性思考。

《罪与罚》讲述了贫困的大学生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受尽良知折磨后选择自首，并最终获得了精神自由的故事。主人公杀老太婆有4个缘由：穷困潦倒的主人公靠典当衣物度日。在酒馆喝酒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靠女儿卖淫度日的穷苦家庭。同时，他听到了大学生在酒馆里讲述杀害放高利贷老太婆的手法，由此，他萌生了将把老太婆杀掉，救济穷人的想法；主人公在路上



列夫·托尔斯泰的坟墓。

看到一个女生被灌酒，对少女产生了惻隐之心；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为了凑齐他的学费，自己的亲妹妹要嫁给律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自己贫穷处境的认知；此前发表过文章，把人分成普通人和非凡人两类，并希望检验自己是否为非凡人。而在故事中，主人公选择杀人的根本动机则是第四个，这个原因听起来耐人寻味，也是作者全书讨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小说中的主人公把人分成普通人和非凡人两类，普通人“只能俯首帖耳地面对社会的不公”；而非凡人“他们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了更高崇的目的而清除一些必要的障碍。”主人公希望借此检验自己是否为非凡人，然而在杀人之后，他一直饱受良心的谴责，最后选择自首被流放，在苦寒之地得到精神的解脱。陀氏通过大学生的心路历程深刻地批判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道德缺陷，彻底否定了功利主义哲学和道德的相对主义对人的戕害。将谈论话题从现实上升到一种哲学的层面，这是一种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遭遇的精神困境：理性与良知的碰撞，目的与手段的选择。至此，小说不再仅仅关注个人命运，而是从容地展现出一种对于现实的超越，达到某种对于人性、道德的终极拷问。在陀氏看来，强调一种目的的合理性而回避手段的不合理性本身就与正义相背，正义应当建立在一种绝对价值之上，这样的绝对价值标准也作为陀氏毕生思考的核心，在其之后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黄金时代中“小人物”的流变

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太阳在俄罗斯也有着父亲的象征，而父亲往往意味着开拓与创造，在普希金这里，许多文学创作的意象逐渐成形并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象征。

“多余人”与“小人物”的形象便是其开山之一。“多余人”代表着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上感到孤独、失落和超越现实的人物。这些角色常常感到自己与周围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他们对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感到怀疑，并且经历了内心的冲突和精神的痛苦。从写作手法上来看，“多余人”代表的是饱含创造一番事业的决心和热情，却因内心顾虑太多，一直畏畏缩缩没能真正完成理想的人。“多余人”活在做但没做的纠结之中，主要体现了社会上一些贵族知识分子的心境。“小人物”指的是社会地位低微、生活困苦、处境艰难的普通人，往往来自农民、工人阶级、下层社会或边缘群体，他们在社会的底层挣扎求生，面临着各种不公和困境。通过“小人物”的形象，普希金希望可以展现人类共同的痛苦、希望和尊严，呼吁社会关注和改变，这反映了俄罗斯的人道主义传统。

除此之外，普希金创作过诗歌、戏剧、童话、小说等多种体裁，其中最能彰显普希金才华的是诗歌领域。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据说是普希金写给一位15岁小姑娘的礼物。当流放在外的普希金看到这个因心事而难过的小姑娘，当即在纸上写出了这

样一首小诗赠予她。这首诗给人的感觉温暖而亲切，饱含了一种兄长般慈爱的关怀。从用词手法上来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显得委婉谦和；“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和“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中重复手法的运用，令整首诗有一种循环往复的效果。此时的普希金处于被流放被监督的状态，隔绝了一切往来，即便如此，他也忍受着自己的消极情绪来安慰这位小姑娘。欣赏普希金的文字往往能感受到一种忧伤，但这是一种温暖的忧伤。这同样也是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原因，他的文字能带给读者明亮轻盈的感觉。

俄国黄金时代最后一位文学巨匠是戏剧大师契诃夫。如果说在此之前，俄国作家对“小人物”只是同情和怜悯的话，到了契诃夫这里，则增添了一些批判和嘲笑的意味。

邹老师结合《小官员之死》来向我们讲解契诃夫笔下讽刺的主要指向。虽然小官员很可怜，但其可怜之处在于自我贬低和自甘卑贱。小人物怕的不是被侮辱，而是担心被他人怀疑不愿受到侮辱。对他而言，这种自我贬低的心态已经融入骨肉，难以挣脱。契诃夫讽刺的是抛却自我主观能动性并完全臣服于环境的“小人物”。

俄罗斯文学整体上是具有悲剧性的，一种是英雄式悲剧，一种是日常式悲剧。契诃夫笔下的一类小人物《约维奇》就是属于日常式的悲剧，这类悲剧没有惊心动魄，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敲骨吸髓般的沉默堕落。小说中男女主心境互换、彼此错过，所有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进行，彼此之间相互疏离且难以同步。原本追求“诗与远方”的男主人公约维奇最终沉溺于物欲之中，每天晚上不停地数钱，一套房子接着一套房子地购置，庸俗生活的庞大“侵犯力”形成一个可怖的黑洞，吞噬了一切残留的真诚，最终剩下一个虚伪空虚的躯壳颓然人间，伴随着夕阳拉长的影子消逝在无边的夜幕。契诃夫作品最妙之处是向我们展示了“不经意的帮凶”——时间。“在冬天，在春天，一点点的不经意的一年过去了，4年过去了，又过了几天”，这是书中的隐秘线索，时间的流逝令人窒息，也令人惶恐。就是在这一

过程中，时间抽丝剥茧般的攫取人的美德，最终将人沦为庸俗生活的一部分。

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为什么天才作家与伟大思想会在俄罗斯的黄金岁月接连涌现？是社会的剧烈动荡，还是某种宿命般的巧合决定了俄罗斯的使命？邹老师表示答案皆非如此，不妨将此问题换一种说法或许更为合理：每个伟大的时代都会涌现一批杰出的天才，为什么在那个年代，这批优秀的天才会选择成为作家，并推动俄罗斯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强国？

或许身为作家能够直击人心，雕镂俄罗斯民族的脊梁与精神底色；或许文字的力量更为强大，它超越了现实，超越了阶层，以一种傲然的姿态凝视着俄罗斯土地上演的一幕幕荒诞与拯救，悲伤与良知，真情与阴谋，劫掠与放逐，并提醒人们永远怀着朝圣般的虔诚，守望这方土地得以永久安宁与和谐。

校长专栏

体 察 思 悟

Thoughts about life
from President Xu

PRESIDENT'S
COLUMN



小师傅

文 / 徐扬生

童年时，我曾与家人去浙东乡下的一座寺庙，拜访在那里担任方丈的远房亲戚。寺庙位于江湾口，上了河埠就能看到两扇红色大门，门上有两幅十分凶悍的罗汉画像，让人看了不禁感到有点恐惧。庙并不大，进门有几间厢房，后面是一个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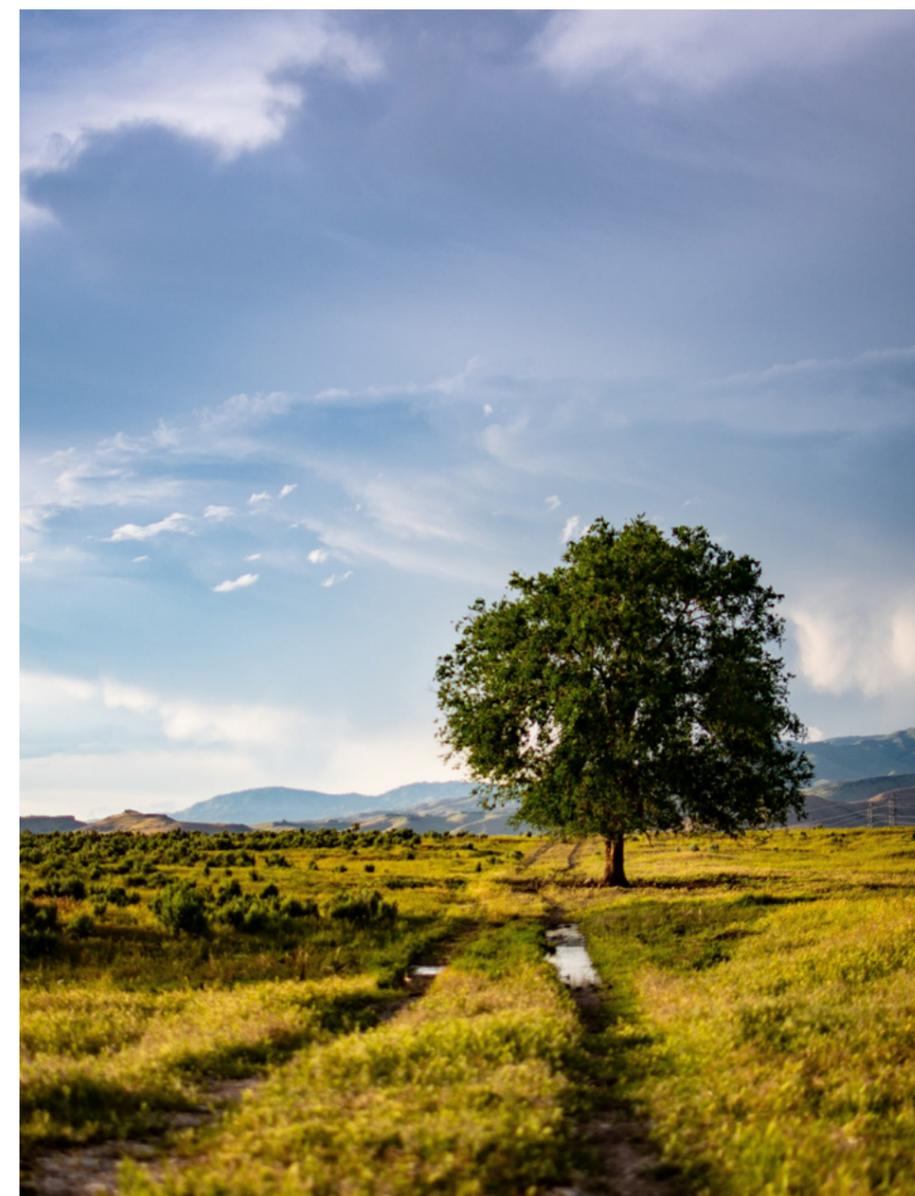
院子里青松翠柏，景色颇为雅致。院子右面长着一棵十分高大的青松，青松旁有一口井。那天清晨，我看到一位小和尚在井旁洗菜。我站了一会儿，他看见了我，就叫我“三少爷”。我不知道怎么叫他，问了祖母后，祖母说就叫他“小师傅”。小和尚眉毛很淡，眼睛很细，脸色白净，笑咪咪的，很和气。我看他老是在洗菜，问他为何要洗这么多菜，他说今天客人很多。我说我们从城里带了很多东西，有芝麻酱等等，他说那是大和尚吃的，况且有客人在，他不可以吃的。我心里不免为他感到有点不平，但他还是笑咪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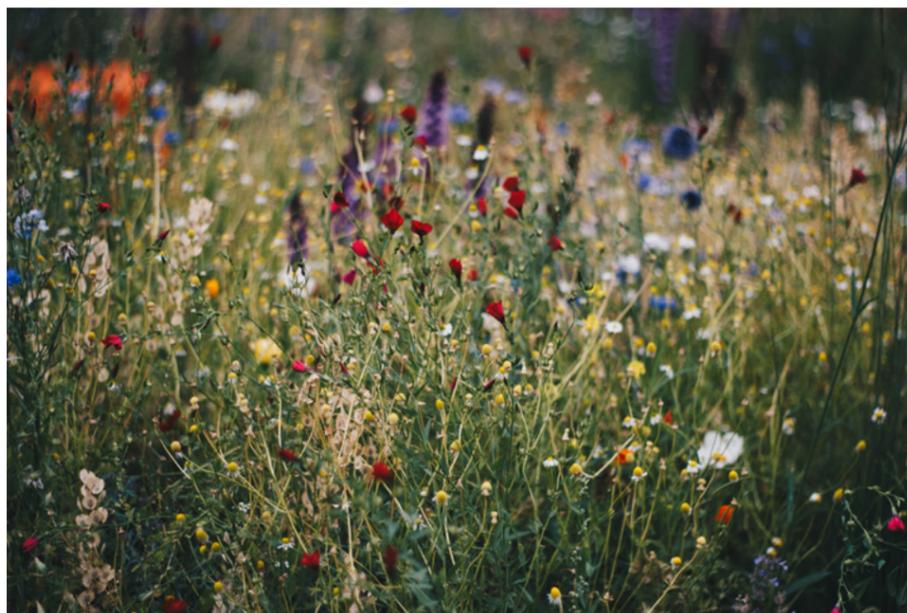
小师傅可能比我大个五六岁吧，因而我可以问他很多东西。我说，我房间门外的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她怎么能站在一条红色的大鱼上面不掉下来呢？她为什么老是盯着我看呢？很多时候他也答不上来，但他总是很和气，老是笑咪咪的。嘴上支支吾吾，而脸上笑咪咪的，那个样子很是可爱。

第二天下午，我在房里看书，侧面墙边很高的地方有一排很大的铁罐，是放祭品用的，里面有我很爱吃的“金枣”。金枣其实是条状面粉油炸后涂上一层冰糖做成的，又香又甜。我看完书，忽然有点肚饿，想去拿点金枣吃，于是爬上桌子，但站在桌子上也还够不着那排铁罐，于是就拿一把椅子放在桌子上再站上去，终于打开了那个铁罐，伸手进去取的时候，因为铁罐很深，一不小心，整个铁罐从高处掉下来，人幸好靠在柜子上没事，一声巨响，把我吓得不敢动弹，外边我那远房亲戚的方丈在念经，喊道“什么事啊？”小师傅闻声进来，看到我站在桌子上，一脸尴尬的样子，他就把门关起来，对外面说：“没什么事，铁罐掉下来了，大概是老鼠吧。”我心里好生感激小师傅。

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都忙着烧香、念佛、会友、聊天，我主要跟着小师傅转来转去。小师傅带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后园。地母殿后面有一片小小的草地，草地上有一棵大树，好像是樟树，再过去有一棵小树。小师傅说，这棵小树其实比大树年长，因为是黄梁木，长不高。小草坪后面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小师傅跟我一起去采过几次笋，他说，如果笋头露在外面，那个笋已经老了，不能砍来吃。要看地面上有点松松的泥土，再用锄头稍稍挖下去，就能看到白白嫩嫩的竹笋，那笋是最鲜嫩的。

竹园旁边有条小路，小师傅在前走，我在后面跟，常常看到有些小生物，像蜗牛、蜈蚣、蚯蚓，路上有时还有小蛇。小师傅总是用手上的竹竿把它们拨到路旁，我问他为什么要去拨，他说在路上会被人家踩着，让它们到旁边去，回家去。他一边弯着腰去拨这些小生物，一边笑咪咪地叫着“走开，走开……”





小师傅无论洗菜，还是念经，常常坐在一把竹椅上。破旧的竹椅很大，他人很小，看上去很不相称，他每次坐在上面，竹椅都吱呀吱呀地响，好像要被坐破的样子。我后来发现，小师傅每坐上去的时候，都要把竹椅抖动抖动，然后再坐上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椅子旧了，里面有很多小虫，坐上去后可能会把它们压死，所以要先抖动一下，让它们跑掉……回想这些事，我真觉得小师傅是一个善人，虽然那个时候太小，还不知道什么叫善良。

我小时候比较文静，说话不多，爱看书，整体讲是那种比较听话的孩子。所以大人都很喜欢我，尤其是我祖母，印象中我与祖母好像从未有过争拗，唯一的例外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她总是要催我“太晚了，不要看书了，睡觉吧”，而我总是坚持要再看一会儿，或者说，想把这本书看完。在寺院里也是这样，祖母催过我两回，我还是在那里看书。小师傅这会儿进来了，又是笑眯眯的样子，轻轻地对我说：“我放了个很热的火铤（chòng，是一种铜器，里面放着烧热的火炭，是南方人冬天取暖的工具）在棉被里，赶快去啊！”经他这么一说，我也迫不及待想赶紧上床睡觉了。

短短几天的寺院生活，其余的事我都差不多忘却了，唯一忘不了的是那位总是笑眯眯的、善良可爱的小师傅。

善良是一种习惯，只能潜移默化地养成，尤其是在人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人这一辈子，大家所肯定和赞许的往往是才华和能力，但其实很少有人是因为才华和能力的出众而成功的。成功主要是靠平时养成的“习惯”。记得有人说过人生的前30年是你养成一种习惯，而后30年是习惯造就了你。所有的习惯中，我以为善良的习惯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个习惯能使你包容、耐心、体谅、感恩，从而使你真正领悟人情世理，以使你拥有广阔的胸襟和广泛的人脉。我们从周围的人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的习惯：勤劳是一种习惯，诚实是一种习惯，节俭是一种习惯，守时是一种习惯……这些都是好习惯，但都没法与善良这个习惯相比。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习惯，即便有了其他那些习惯，我们也会变成一个盲人大力士，一个没有灵魂的精英才。

说到善良，也许人们会说是一种软弱，其实不然。鲁迅先生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一个人，如果没有对人性的

感动，我觉得好像很难会对美感动，对自然感动，对科学感动。只有当你拥有心底里的善良，你才会有用之不竭的快乐能量，从而拥有长在骨子里的坚强。

我记得小师傅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可爱的笑容。那个弯弯的小眼睛，似乎你一看到他，就会想要微笑，他笑起来，总是眯着眼睛，微微笑着，虽然含蓄，但却是从他心里流露出来的真诚、灿烂、喜悦的笑容。尤其在那个年代，周遭的人们都在饥饿、贫穷和动乱中挣扎，小师傅的微笑对我而言更是弥足珍贵。

微笑是一种美，是最高层次的美，这是任何修饰和服装都无法企及的美。我们周围有很多漂亮的人，你会发现只有当他们微笑的时候，他们才是真正美的。我们学校的几位学生主持人都很出色，我常常对他们说，化妆也好，服饰也好，背台词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带上微笑。因为只要你带上微笑，即便你犯了错误，人家也会原谅你的。



反过来，如果你不带微笑，即使你不犯错误，人家也会想要寻个错误出来。通过微笑，你想要沟通的人会感到你的亲切，所以他们也会对你亲切。通过微笑，你会让人感到你的诚实，所以他们也会对你诚实。

微笑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微笑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从你舒心的微笑，人们可以看到你心灵的房间是明亮的、畅朗的、清静的和温暖的。所以，泰戈尔说“当你微笑时，世界就爱上你了！”

人能微笑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当时的心态是放松的！我对自己上头两节课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至少叫得出10名同学的名字，二是必须让课堂里听见笑声。因为课堂里有笑声就表明同学们已经放松下来了，如此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不放松怎么能够理解？不理解又怎么会喜欢？不喜欢怎么能够学得好？

当然，微笑，说得简单，其实那是无法刻意做到的。人，就像一棵大树，我们的善心就像树的根须，牢牢地扎根在土地里，微笑就像大树的树叶，随着微风飘动。因而，善良是根，是因。微笑是叶，是果。两者是因果关系。

微笑的小师傅，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有人说小师傅已经在动乱中过世了！时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去年我有心去寻找那个寺庙，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寺庙大门，寺庙在“文革”期间全毁了，只剩下两扇前门和一道断墙，红色斑驳的大门上还依稀可见那两幅十分狰狞可怕的罗汉，寺庙旁边那块嘉庆皇帝所立的石碑还在。

庙门上两幅狰狞可怕的罗汉的脸与微笑着的小师傅的脸，这样两幅极为不同的图像，像电影一样反复交替出现在我眼前。我虽然不能说喜欢这两幅狰狞的罗汉像，但我想，如果它有灵的话，或许是唯一一看见过我童年时与小师傅在一起的那段美好时光的见证。

我面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的油菜花田，身后是一片麦田，小师傅淡淡的微笑像一袭轻风吹来，吹过油菜花田，又缓缓地吹向我身后的麦田里去了。

Time to read,
to ponder,
and to appreciate

湖畔

关乎心灵 栖息烟霞

LAKESIDE

124

春山雅聚

130

光影

142

诗歌

146

散文

149

“偷懒”的职业艺术家

记者 / 黄若瑶

编辑 / 叶润博



“偷懒的职业艺术家”活动海报。



李姝睿

李姝睿，先锋艺术家。

近期个展包括：

震荡的高光，龙美术馆，上海，中国（2021）
浪荡在抽象与具象之间，Carl Kostyál，米兰，意大利（2020）



李带菓

李带菓（特邀），中国的实验性音乐、世界性音乐和新音乐领域的杰出人物。

当技术与需求把我们推至全面数码时代的入口，仓促与匆匆，传统的视觉印记被抛诸脑后，这些关乎人类生存价值的记忆如同沉默的血管，搭建了肉体生命与不朽之间的通道。倦怠与逃离，是当代人萦绕不去的情绪，既想超越，又难以割舍的执念。世界太满，工作太多，“偷得浮生半日闲”似乎成为一种时刻骚动的幻想。闲云野鹤的生活被视作清高而奢侈的标签，贴在诗人、画家、所有“无所事事”的艺术家们的身上。而职业艺术家李姝睿和李带菓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偷懒”，亦是一种生活方式。



李姝睿老师分享作品：《庇护所：所有的恐惧来自于世界边际未知的闪烁》。

初夏午后，六月的阳光降临此地，空气中夹杂着蝉鸣与枝叶细簌的声响，大学志仁楼首层“时空胶囊”黑匣子剧场里^[1]却独享一份安静，黑色的墙壁和紫色的灯光隔绝了酷暑，抚平人们躁动而略带不安的心情。在大众的印象中，艺术家出入交流的场所，往往是精致的会场与高雅的沙龙，并伴随着抽象的概念与晦涩的名词；然而从这两位艺术家的出场中，我们却感受到艺术源自生活的亲和与温情：李姝睿短发齐整，表情自在从容，在谈及艺术审美与个人理想时，眼神中却又仿佛迸射出年轻的热烈；李带菓身材瘦削，穿着轻便，自内而外散发着本真而不造作的气质。

何为艺术家，艺术家离我们有多远？李姝睿首先为我们揭开了关于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的面纱。艺术家本身也是一种职业，并非理想主义的世外桃源，亦需为生计委身繁华。作为一种职业，“全职艺术家”的身份偶尔也使李姝睿感到疲倦，因为这样的创作并非全然随心所欲，而不得不去顺应商业发展规律，以拟合整个艺术产业的时间线：3月、9月、11月，毕竟艺术的淡季与旺季并不会主动配合艺术家本身的灵感乍现。李姝睿自嘲，与公司的合作，作品的定时出产也是一种社畜般的“交作业”。虽然比起朝九晚五，艺术家的生活显得更加自由，不过一旦进入行业，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尤其是艺术家圈子里的规则与人际关系。扎根在北京艺术圈，周遭的一切变化都是快而猛烈的，似乎并没有给慢节奏的艺术充分驻足思考的空间。倦怠、彷徨、焦虑，行业的竞争与争宠式的应酬消耗着艺术家的感知力，也不断呼唤着艺术家心中的那个理想彼岸。

[1] 黑匣子剧场是一种具有实验性、创新性的小型演出空间，该类型剧场的舞台与观众席之间没有明显的间隔，呈现小型的话剧、音乐会、livehouse、脱口秀等灵活、自由的演出及活动形式，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沉浸式体验。

于是，李姝睿想出了自己的偷懒之道。

——那就走吧，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有一份心的安宁。

2014年，她搬去了大理。

然而这并非隐者式的厌世或是士人般的清高，事实上，她并没有斩断与职业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她与画廊的经纪人承诺这不会影响作品的产出，自己只是希望远离人群，重新找寻身为艺术家的原动力，为日后的创作磨练意念与心智，同时也还有诸多现实的因素考虑。带着出逃般的浪漫与释然，她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双城”生活。

在大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使李姝睿明显慢下来了，这也为她的作品增添了一份平静，而且透过山风与薄雾，个人的洞察力也越发精准。“这样的偷懒其实换来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亲近，我感觉自己更加专注了。”在大理，随处能感受云和风穿过山间，所有的东西都退得很远，给人留下能够从容不迫地进行观察想象的余地。在小城的院落里种下自家的蔬果，亦有种“归去来兮”的踏实感。在“远退”的同时，李姝睿依然密切关心着职业圈的动态，会定期参与国内外的一些艺术活动，并继续深耕着自己的艺术创作事业。



“震荡的高光”艺术展：《但见天中彩》。

“光”与“色彩”在李姝睿的作品创作中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在她的心里，这二者的组合与运用都能记录和塑造时代中个体的内心需求与精神状态，且更能与广义的集体意识形态相关联。带着这样的理念与创作核心，2021年，李姝睿首次美术馆个展“震荡的高光”在龙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览通过将光影与流动中的明灭印象抽离出色彩与大小皆不同的点，并以此作为基本表达元素，展开一种艺术语言体系的构建。同时，其作品与展厅本身也以一种干净清澈的方式呈现给公众，她解释道：“我会在艺术的形式感上进行揣摩，我的创作会追求质感，让它具有一个简洁且统一的呈现方式。”其作品从平静湖面波光粼粼的《深白》，再到瞬息万变、色彩斑斓的《但见天中彩》，如果说《深白》中高度凝练的分析抽象是对这一语言体系的综合性展现，那么像《但见天中彩》系列中对具象和抽象的融合，则是对这一系统的一种超越与尝试。因此，李姝睿所关注并描摹的并非纪实的细节，而是缥缈的印象，



“震荡的高光”艺术展：《深白》。

通过营造一种微妙错综的视觉效果，唤起观者内在的多重情愫。

与奢侈品牌 Dior 的合作则为李姝睿的创作带来了更进一步的自由。在《接受崇拜》中，她打破以往的合作形式，以视频形式展示大洋彼岸两人的迷思漫谈，在尼泊尔，有这样一种习俗，人们会通过层层考核，从三四岁的女孩子中找出一个合适的人选，作为他们传统中崇拜的女神，在当地人的信仰之中，如果女神在接受大家膜拜的时候，有任何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会被当做一种对未来的一个暗示，并且往往是不祥的暗示。因此这些小孩子在任职期间，几乎是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她们只能在接受崇拜时一动不动地发呆。等到女孩开始有生理反应之后，便会从位置上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育与生活学习，因此她们在回归之后往往很难适应正常的生活，很多也失去了学习与劳动的能力。李姝睿从对尼泊尔活女神的思考演化到对当下生活的反思，从女孩摆设性的古老传统联想到当下数码时代人的价值：当人的作用从电子与技术的支配者逐渐成为数码产品的奴隶或者陪衬，人类群体是否也像尼泊尔女孩的童年一般，成为科技时代里一种摆设性的存在呢？也许趁着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被芯片所支配，先去尽量用身体与心去感受这个世界：我们去泡水吧。回望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最初的起源。通过一幕幕复古的数码短信字体与绘画，观者既能跟随对话，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又能抽离出来回味作品



李带菓老师演奏琵琶。

背后的无言的主题。

李带菓的出场方式与众不同，他未做自我介绍，径直上台，抱起琵琶便开始弹奏，待曲终音散，沉默良久，方才开口。他放下琵琶，开始讲述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与音乐事业。其实，以语言所描述的艺术感觉远不能刻画真实的艺术，在乐曲中，人们往往能在思想中漫游、迷失，或是停下乘凉，或是径直逃走。而他的半生追求，也早已藏在琵琶的爱、神秘与疑惑里。

许多人在思考音乐背后的蕴意时，往往不知如何组织语言来表达感受。也许对那些带有明确表意作用歌词的音乐来说，可以就其文本进行一番讨论，但对于抽象的音乐本身，却总很难找到合适又准确的词语去评述。一方面是专业知识的相对匮乏，另一方面也是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性表达对于理性逻辑的回避。而李带菓的音乐正是如此。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远离语言逻辑的陷阱，全面享受音乐对于当下感受与人之主体性的尊重。当问起先前弹奏的曲子，李带菓的回答是，他的演奏有很大的即兴成分，没有必要给每首曲子一个固定的名字而限制其表达。他寻求的即是思绪对音乐即时的反应，无需文字进行解码和输出。

音乐是李带菓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他向观众分享了一个视频，标题是《吓咩呢未来音在竹和田》。吓咩呢未来音是由李带菓创立的乐团和实验项目：乡村儿童们或穿红衣，或穿白衣，拿着各式乐器，演奏属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一张儿歌专辑，简单的语言和稚嫩的疑问却引起成年人对复杂又浮躁世界的另类思考。民乐和西洋乐器的神奇结合，显得怪异而有趣，悲凉与温暖兼具。对于现代人饱受刺激的感官来说，这样的旋律并不能很好的适应与理解，人们似乎总想为每一段演奏找出内在的意义，这是现代



李带菓《汤圆殿下的助眠频率》。



《吓咩呢未来音在竹和田》专辑封面。

人的通病，对于意义的执念难以割舍，连听音乐的间隙也无法“偷懒”，难以专注于自我的感受。

但对于李带菓来说，音乐是如此自然地融入生活。虽然出生在美国中部，他却幸运地接触到了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并对中西音乐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日里，他练习各种乐器：琵琶、二胡、中提琴、大提琴还有绍纳姆指琴。同时，他还在联系各种形式的音乐，包括绍纳音乐，古典印度音乐，中国和西方的古典音乐，还有各种中国地方戏剧。没有音乐的时候，他就静默冥想。刻意的言语赋值在此刻早已变得不重要。

讲座接近尾声，有观众想起，李带菓老师还没有提起自己究竟偷懒在哪里。

“我的偷懒之道就是做我最擅长的事——音乐。”李带菓笑道，“你就找到你擅长的事，然后一直做就好了。”

在网络上一段公开的视频中，李带菓和李姝睿带着儿子滑旱冰，在家中慵懒地抱在一起酣睡，背景传来一首清唱的童谣：

“是不是成为文明人就不能像小朋友？”

“看动物园的脸，觉得人也不自由。”

“我们野，我们野。”

“我们也够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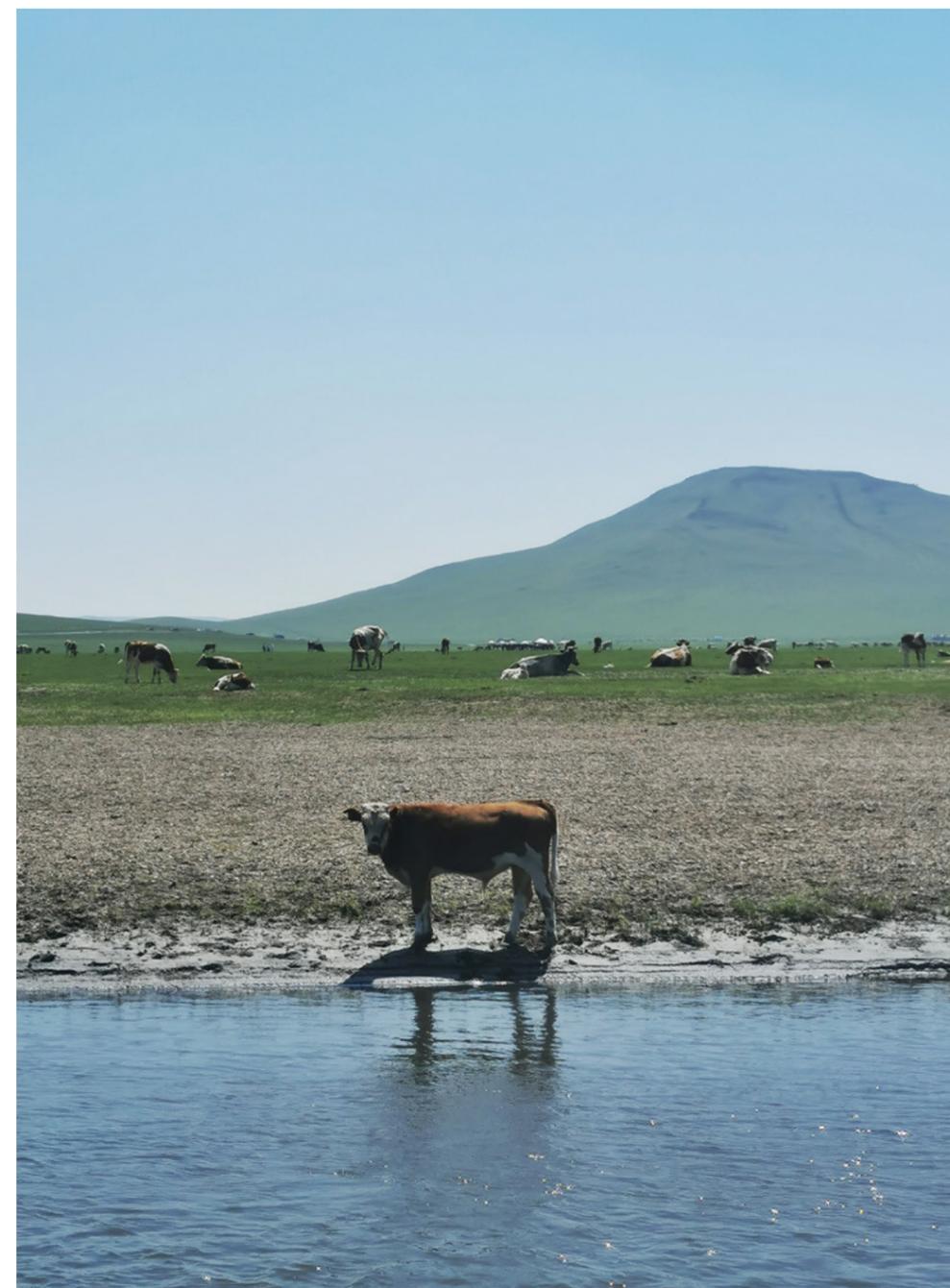
在这个小小的音乐与艺术之家，这首童谣唱得很轻，但它的回声很远很远。

出走和“偷懒”，直觉便是触角，自然地与绘画建立起稳定的连接。声音撒不了谎，我们可以自由地感受震动带来的自然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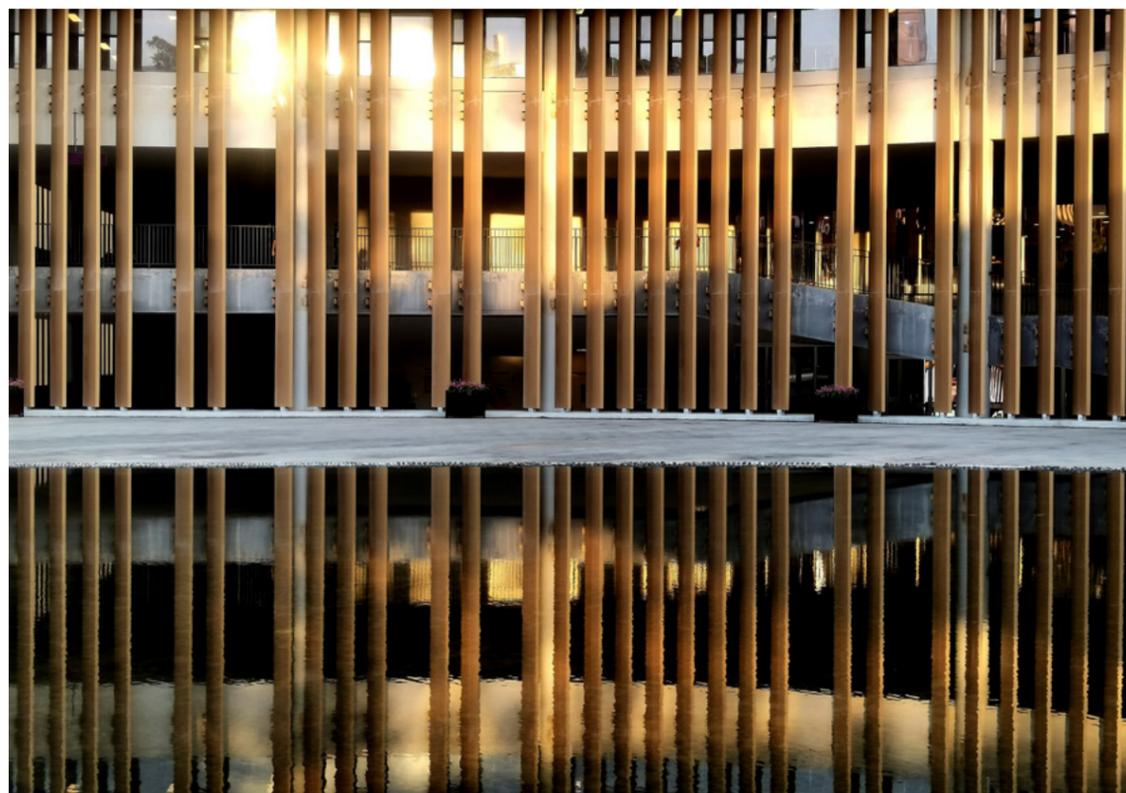
一起偷懒，享受心灵的退后慢耕。



广东味
喻麒元 / 摄



山那边
韩翌灵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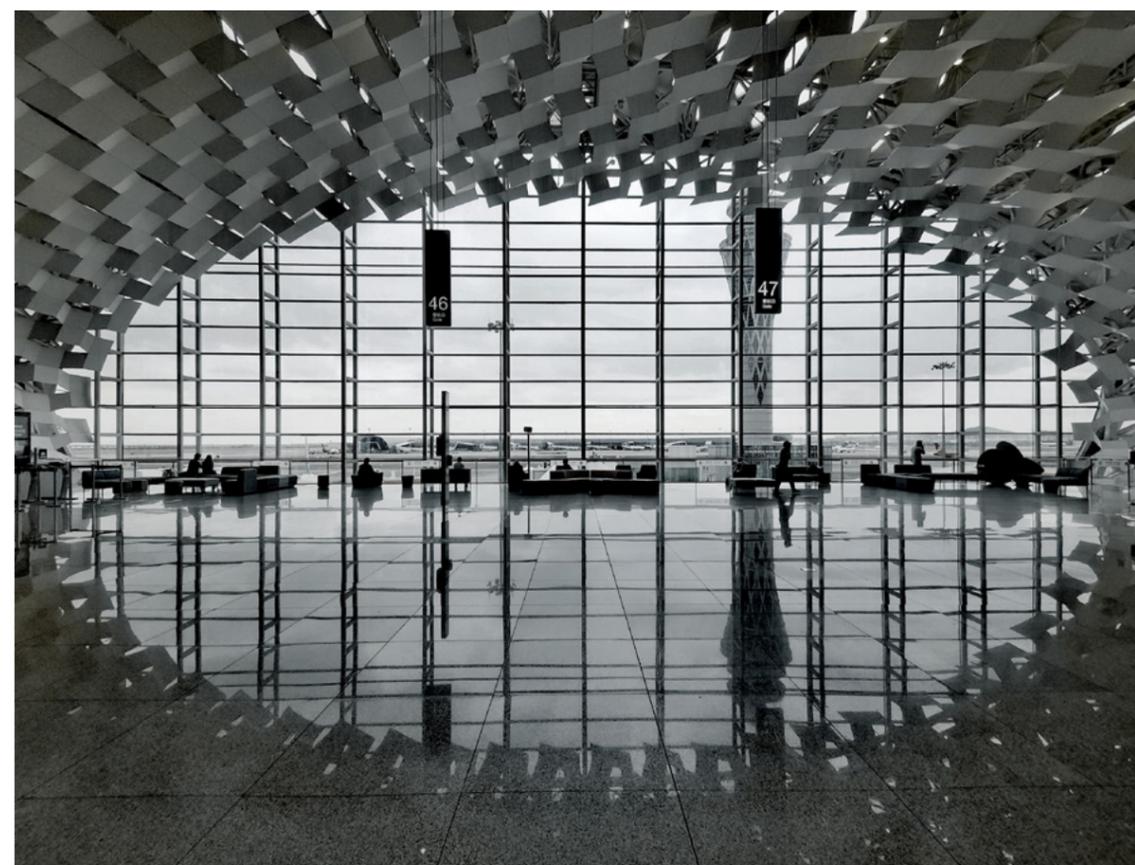


沉浸式闪光 - Dumped Glitter

尚与棠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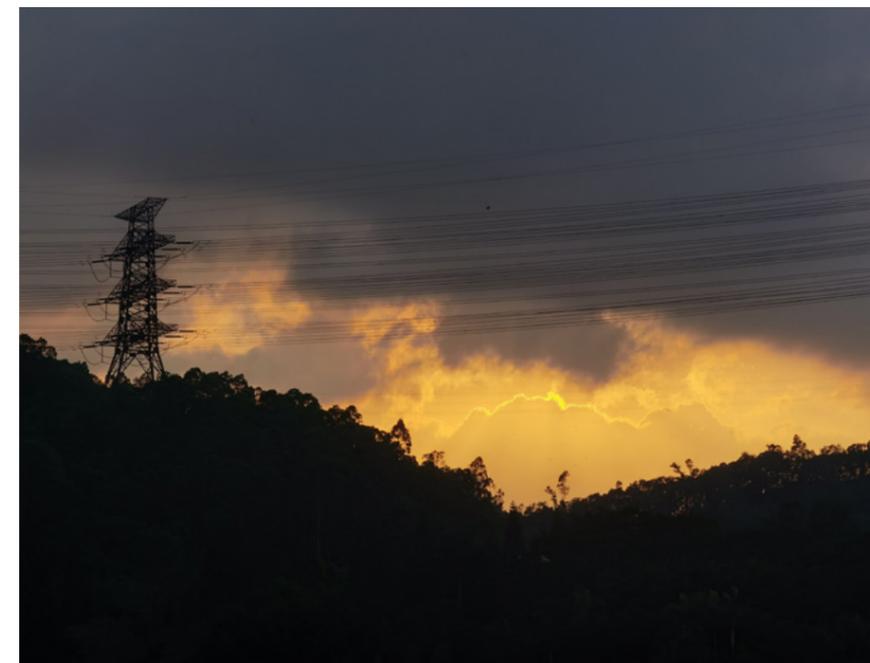
凝望 - Gazing into

尚与棠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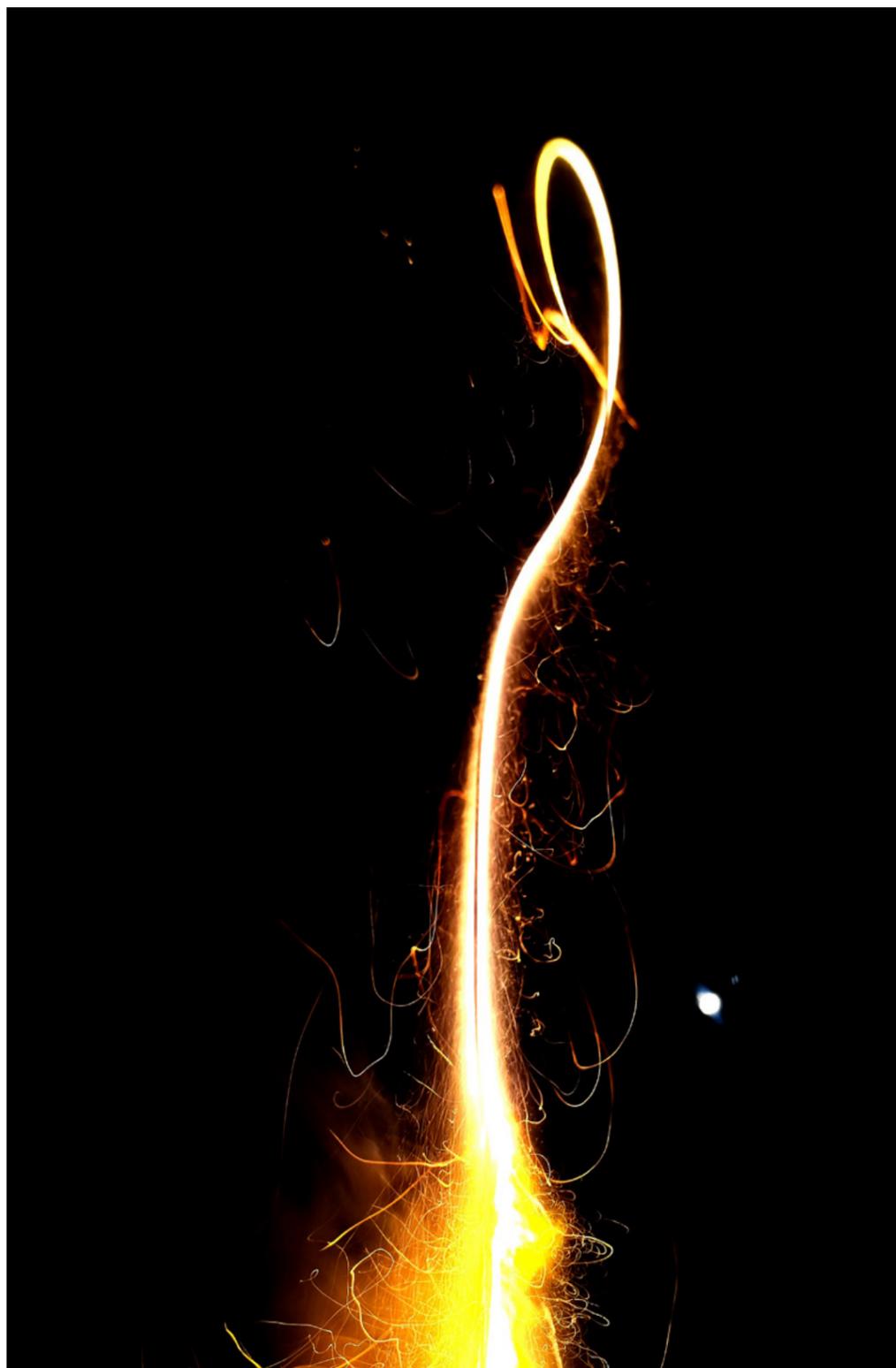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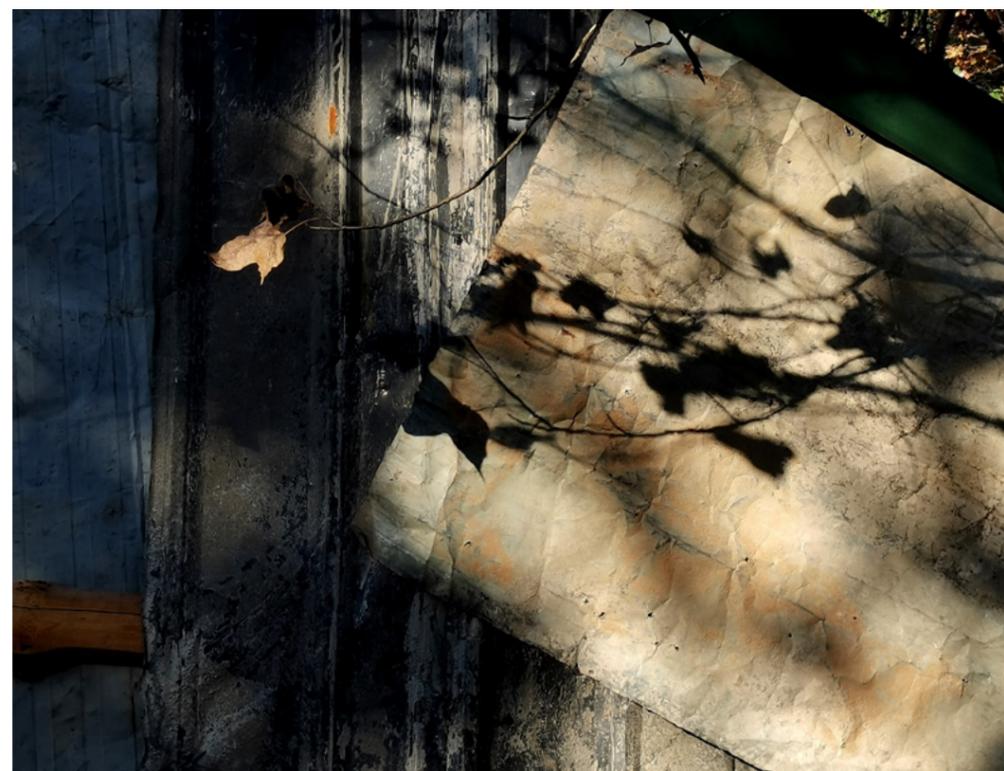
凝视
王侑欣 / 摄



昼与夜之树
王侑欣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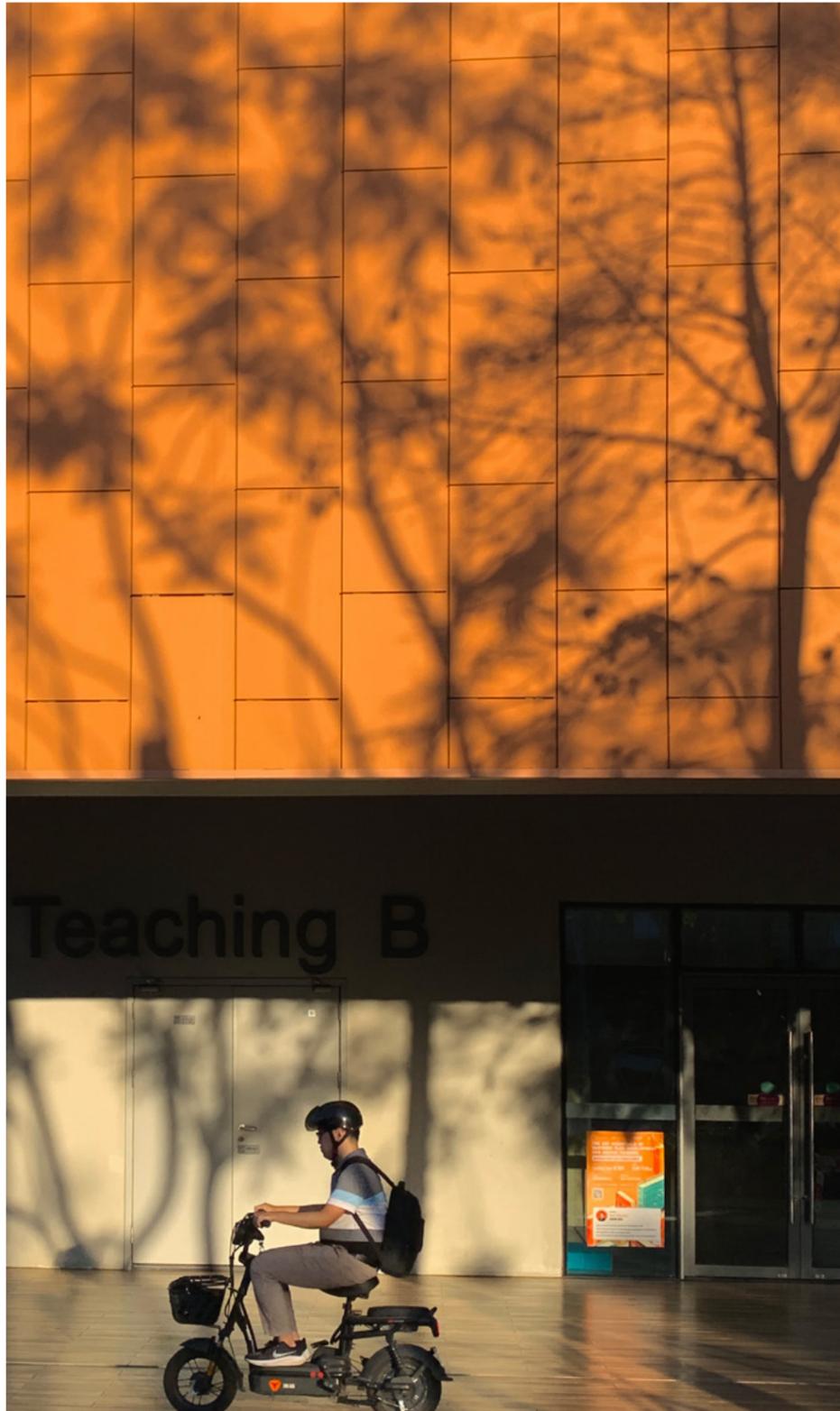


尚与棠 / 摄
黄金时代 - Golden Ti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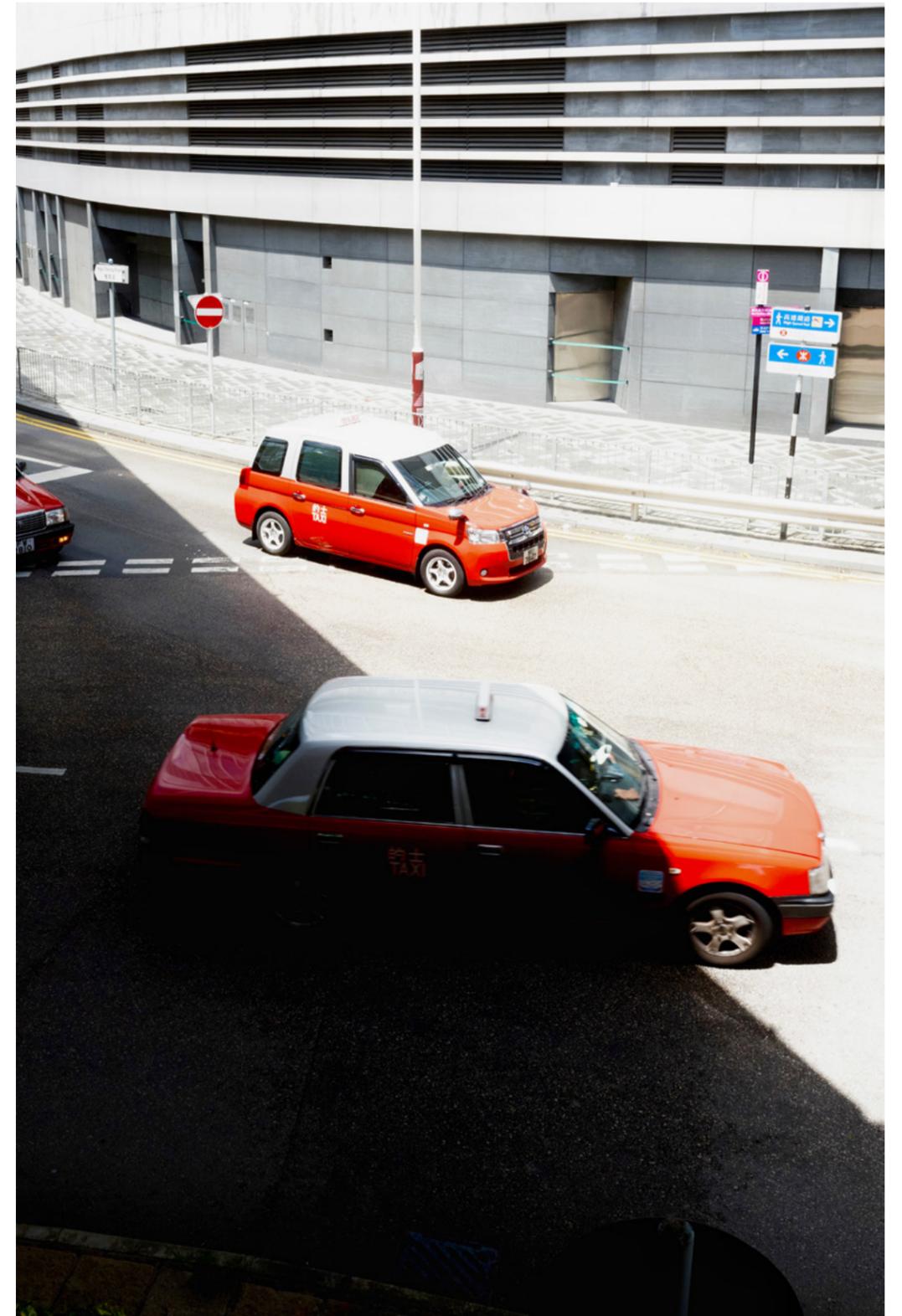


木制故事 - Wooden Story

尚与棠 / 摄



树
张凌康 / 摄



雅翔道，香港
张凌康 / 摄



Spencer
黄梓烨 / 摄



Spencer
黄梓烨 / 摄

POETRY

诗歌

镜中一旬

诗 / 李潇彤

蜻蜓游走挣离 未潜出旋转的大气
 午夜门前的行人 误闯进斑斓的墨色
 潮湿的浓重的雾试图包裹苦涩的茗迹
 好奇盖过讪语的威仪
 请允许我拨开重重障目的叶片 抵达炽热的碑碣

十年前的我 列队 讲台对面
 六十次的重复 唯烛火吞没空间
 新奇 疑惑 试探 不屑 平静的水面 六十双眼
 越过我们的头顶 望见飞鸟托起的昨天

掠过的身影 是咔嗒咔嗒的轮咬住枕木掺进沉重
 浑厚的汽笛
 期待命运的焕然一新 期待时间会生长时间
 注定的分岔 远行 在挥手时隐隐作痛
 茁新的树苗上缠绕着濡湿松散的远古苔藓

慌张的跳动的心跳 藏在积极的声线里
 陌生的戒备的柴火 烧成一把黄昏的烟
 谁是我的兔子 牵着我顺从地滑进梦潭的树洞
 老师 李老师
 你好 你好吗

台阶称不上一块冰 兜里的手却如浸温汤一壶
 老师 女生一定要结婚吗
 老师 容颜的美丽是否与成绩紧紧挂钩
 老师 坠落前最后一刻会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湄潭三十五度的白昼气温
 威海冬季桑拿房里的热浪
 重庆火锅沸腾的翻滚的红油泡儿
 不足这一秒 千分之一

这是我命中已定的法庭
 深邃寒星直射着苟且的心虚的所有人
 不落下任何一个

世间最后的堡垒唯余我眼前这一座
 痴妄未尽 愚钝的献出诚恳的心脏
 从两千年前风尘仆仆的赶来的
 不只是清甜的翠芽 还有冰凉的喋血的桎梏
 辉煌的凤冠 锁住无穷尽女儿的咽喉
 红绸的真面不过是魔窟顶梁的白缎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糟污的泔水 从未停歇地泼在尘埃不沾的净地
 芙蓉面颜不过是千千万万泼脏的虚伪的矛点
 万物相生挣不开水草藤轮 难理清真独生的两株
 但交叠的叶叶不算因果 若有根茎混谈 切莫不疑
 鸟群出窗 冲进自由的云彩
 但我不想你松手 我不想我松手

铁轨在岔道口缓缓停下 汽笛薰进泥土 砸不出一滴眼泪
 从未忘记二十平方米里 是六十个浩瀚无垠的寰宇
 青春最好的便是 不曾坍塌的希望
 我不愿又成为无数的匆匆过客
 正如我不愿你们也成为 之一 之一 之一
 难掩脑中的嘶喊 沼泽里竭力推你出去
 不要成为 这其中的一员

泥泞的手掌 隔着空气安抚你的肩背
 温热爬上我的肩背 爬上遥远的地平线
 旭日与夕阳 从来都是同一颗
 纵使终要滚一遭现世的海
 却没有一头冷浪真能淹没我们的辉光

POETRY

诗歌

落日的歌

诗 / 尚与棠

透明的高楼盘问得铁青
流浪来的红白便被这幕墙蹂躏
柔软的，通透的，破碎的
落进黑色，却没有彩色溅起
因为不合身的西装涂满苍白的汗迹
因为疲于炎夏的眼只看向泥泞

江鼓随着金河飘荡，呼唤这山城尚余的热情
跨出群山的吊桥招摇，却只是棕鸟的玩具
褴褛的和尚轻抚陈黄的桃符
沾灰的厚唇轻启，山影垂向林
“鸟啊，鸟，你要记住
不要落上那使役香火的白塔
我的院里可不供养画出来的沙门”
他恳切，他空喜
他自明，沉在夜里的鸟不肯睡去
亦如积灰的莲灯载不起躁动的心
随后无言的庙门紧闭
无泪的眼吟诵起无言的经

晚了，余热聚拢，炉火散着星
映着火热的瓷釉，俯身，像湿透的陶泥
喘息，那汗流浹背的仲夏夜
他的梦里没有宏大的东西

人们只是围坐在这里
烧制着他们买不起的茶壶
以此等待着他们的幸福

月牙弯弯

诗 / 王清玄

月牙弯弯，像只小船。
夜静静地，没有风。

月牙弯弯，像只小船。
红色的月亮，做着红色的梦。

月牙弯弯，像只小船。
在星群中我撒下无形的网。

所得的，大不过一点灯火，
重不过一颗心。

月牙弯弯，像只小船。
风起了。虫鸣们蛰伏在影里。

三月十七日

山水有清音： 余光中与香港中文大学

——“书林漫步——中国文学讲座”活动有感

文 / 郝嘉琦

编辑 / 冯子凌



余光中先生在港剪影。

深圳的春天，是被绿色画满了的。

春意被榕树轻笼，沿着山顺着水，从龙岗蜿蜒到沙田，在绿雾中氤氲开来。此景如同著名的“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笔下弥漫的思乡之情，在香港与大陆之间连环。在这样一个春雨迷蒙的周末，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的林成川教授带着学生读者们，在“书林漫步——中国文学讲座”活动中，通过阅读余光中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的作品来共同感受这位才华卓然的诗人、学者眼中的香港。

余光中先生于1974年受邀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在香港待了10年。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刚开始发展现代文学，而余光中先生又已是现代文学的大家，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方面都已经卓有所成。

在香港的日子里，伴着沙田秀美的风光和诸多好友，余光中先生醉心于讲学，度过了一段安宁的生活。教学之余，余光中先生很喜欢旅行，撰写了大量的游记散文，这些散文名篇也使彼时默默无闻的沙田显得更有光彩。沙田的山水或许无言，但在文坛“璀璨五彩笔”余光中先生的文字里，山水都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自有清音。

在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之前，余光中先生已经凭借着《乡愁四韵》和《乡愁》在中国台湾文学界声名鹊起。此次讲座就以罗大佑演唱的《乡愁四韵》开始。这首诗对仗工整，所用的意象如长江水、海棠、雪花、腊梅等都带有文化象征的含义。家在海峡对岸，离乡的游子几十年不能回家，这种思绪宛如奔涌的长江水，在胸中激荡，又如同酒一样醇厚，海棠红一般沸血的烧痛。然而家乡却没有任何信件寄回来，等待着雪花白一样的信件，想念着故乡的腊梅香，这种情感是何等的深刻浓烈。余光中先生祖籍福建，生长在南京，祖国的山川和文化给了他最好的滋养，所以他的乡愁不只是亲情意义上，更重要的应该是在文化意义上。乡愁诗人当之无愧。

除了诗歌，余光中先生在散文写作上也颇有造诣。他借鉴学习了古典诗词音域丰富的特点，用诗的语言写散文，强调速度、密度和弹性。读者在读文章的时候会感觉到文字如乐曲般抑扬顿挫，在单位的句子的长度里面到底拥有多少的动词、形容词跟名词据定了句子的弹性，弹性也有一种节奏感，因此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经常富有变化，句式多变。这种写作方法具有实验性，不仅仅是诗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小说的语言、电影的语言。中文的魅力也在于此，文字可以变换多种形式，但是景象如事实一般的向心力依然常在，因为一字便是一天地。

林成川教授接下来所讲解的《沙田山居》，便是余光中先生在香港居住期间写成的散文。彼时他住在教授宿舍内，宿舍依山而建，面朝吐露港，可以说是依山傍水。

“书斋的外面是阳台，阳台外面是海，是山，海是碧湛湛的一湾，山是青郁郁的连环。山外有山，最远的翠微淡成一袅轻烟，忽焉似有，再顾若无，那便是，大陆的莽莽苍苍了。”

余光中先生用空间的变换让读者如临其境，从阳台望到山，再到海，视点由近及远，句子合辙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押韵看上去是不经意的，或许是刻意为之，但又不落痕迹，显得清新自然。除了押韵，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还用到了顶针、对偶等修辞手法，如“风火炉内炼丹”，其功力可见一斑。

山水都是静态的景物。但余光中先生通过研究中国古典山水游记，认为要把山水写好，就要让静态的景色动起来，如此一来山水才有生命，有活力。在《沙田山居》中，他也频繁运用了生动妥帖的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以及大量动词，让意象更形象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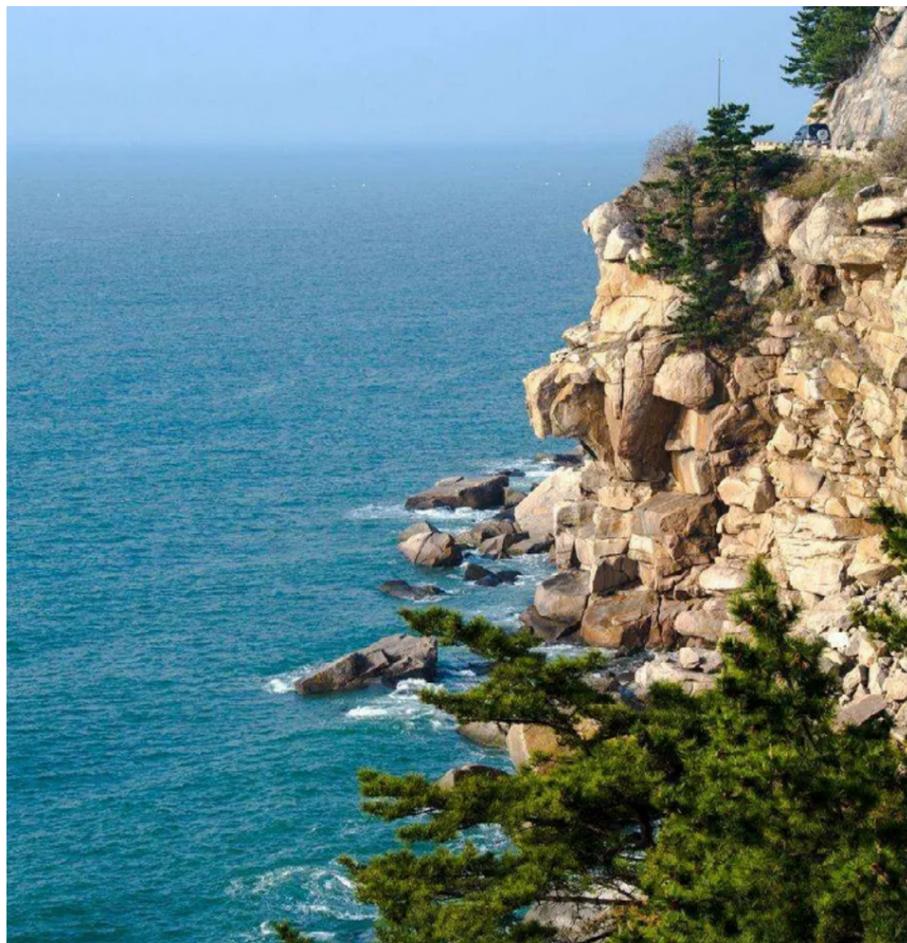
“海天相对，中间是山，即使是秋晴的日子，透明的蓝光里，也还有一层轻轻的海气，疑幻疑真，像开着一面玄奥的迷镜，照镜的不是人，是神。”

“海和山绸缪在一起，分不出是海侵入了山间，还是山诱俘了海水。”

“起风的日子，海吹成了千亩蓝田，无数的百合此开彼落。”

余光中先生笔下的沙田山水，似乎有了生命，偃仰风移间展现出动态的美。平庸的写景是用大段的形容词加名词，而更高明的写法是用动词，如同拍电影一样。那显然这种写法是他自己的创作理论的实践。

余光中先生喜欢用典，颇喜中国古典文学，如屈原、李白、苏轼等名家的作品。在《沙田山居》这篇散文中，余光中先生通过用典也将古典与现代联系起来。他说自己居住的书斋常有火车经过，轰鸣声如钢铁火花的壮烈节奏，提醒着他，谷底不是洞里桃源，住在山上却不是桓景，就算是王粲也不得不下楼去。这里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是在大学校园里面。他也不是像东汉时的桓景一样为了避灾幽居高山，而是仍然关怀人间，关怀现实。另外王粲写过《登楼赋》，也成了一个用以表达思乡之情的典故。余光中先生运用王粲的典故讲乡愁，但是点到为止，因为他不希望让乡愁占据他这篇文章的主体，就似乎又把它给化解了。他更专注当下，专注于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对教书和文学创作的努力，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期盼。



沙田山水掠影。

余光中先生居住在沙田，他每天听到九广铁路的火车轰隆作响。他在文中写道：

“山下的铁轨向北延伸，延伸着我的心弦。我的中枢神经，一日四十多次，任南下又北上的千只铁轮轮番敲打。”

从台湾来到香港，虽然实际的地理位置离祖国大陆更近了，但结果让他心中更加煎熬，因为过不去。这些统统都是祖国的意象，更深层的主题是为沙田赋予文学色彩，这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责任所在。他自己本人说过，名山大川很难只凭秀美的风光来成为名山，往往都需要优秀的文学作品跟它相匹配。自然景观要加上文人的加工修饰，才能成为文学的景观，人文的名胜。因为余光中先生的感召，以及友情的影响，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他们有相近的文学观，创作评论都很活跃，戏称自己为“沙田帮”。这些人为了沙田开拓出一片文学的绿洲，而这个恰恰是由余光中的影响而形成的。他们知道山水游记有何妙用，可以为名胜增添光彩。好比我们知道《赤壁赋》，也知道苏轼那首词，苏东坡也因为赤壁更加风流，人与地之间相得益彰。



上世纪80年代，沙田七友合影。

在《沙田七友记》中，余光中先生不仅描写了这群可敬可爱的学者们，也对他整个的10年香港生涯做出了总结。他顶礼过古墓，发现这一带的荒野野稻原本无情，突然变得有情起来了。他从远处眺望，发现大学也就成了一个小盆景，就像一场梦里的场景。这场梦就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10年，在没有意料到的距离，从不习惯的角度突然一回头，好像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了自己在家里的背影。他心中暗自许下誓言：“我永远留恋着香港这块土地。虽然遭清朝统治者割弃，英国也不会盘踞太久，最终要回归中国，正如它永远凝视着无穷的祖国大地”。

山水自有清音，而文学创作能够让这样的清音飘扬到更远的地方去。香港和内地的文学爱好者们需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以我们的家园为背景创作文学，这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参考文献

余光中. (2007). 沙田山居. 中学生, 73.

余光中. (2006). 沙田七友记(节录). 出版参考: 新阅读(5), 2.

《神仙湖畔》杂志社学生编委会

执行社长

金珠淇
2020级 学勤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旅行者，
不要忘记旅途本身的意义

学生主编

罗雯静
2021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永远做树上的 Elvira

祝一寒
2022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Carpe diem.

栏目编辑

杜可
2021级 逸夫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公无渡河

贾涵
2022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

冯子凌
2022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

叶润博
2022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永忆长安月下影，曾教伊人绽芳华。
陌下柳痕红雨落，把酒仗剑走天涯。

张艺骅
2021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花开如火，也如寂寞

黄若瑶
2021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

惠诗雅
2022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一直游，游到海水变蓝

季伊忱
2019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人生海海

胡屹潇
2022级 道扬书院 医学院
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 like tears in rain.

美编设计

李玮欣
2021级 思廷书院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广告位招租

裴嘉琨
2022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李一扬
2022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
不必成为别人

流程编辑

肖毅然
2022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A merry heart goes all the way.

柯承宇
2022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我已经等不到夏天了。
就算拨开人群，也想去见你。

王梓涵
2021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热爱和众望终会殊途同归

宣传部

匡子娴
2020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生活是一种飞行
四季是爱的衬景

赵越
2021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Good Luck

杨涵文
2022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学生记者

董楚珮
2021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每一寸人间都值得被书写

王菁
2021级 学勤书院 理工学院
做温柔快乐的自由鸟

周凯怡
2021级 学勤书院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To love one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a lifelong romance

张恩禧
2022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怕什么真理无穷，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蒋紫涵
2019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功不唐捐

文玄亦
2022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愿勇敢选择的未来，
能在此刻被光芒照耀

林嘉译
2020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这个家伙很懒……
想等你自己去了解

郝嘉琦
2022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请等待 artist 的信息

谭芷韵
2021级 经管书院 逸夫学院
Enjoy yourself and try to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bit better!

丁凯伦
2022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所冀不过时间教我麻木与失忆

唐可馨
2022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尹敏娜
2022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

2023 年夏季刊贡献者名单

执行社长

金珠淇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轮值主编

罗雯静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祝一寒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流程编辑

柯承宇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王梓涵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肖毅然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美术编辑

李玮颀 2021 级 医学院 思廷书院

李一扬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裴嘉琨 2022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宣传策划

匡子娴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杨涵文 2022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赵越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封面设计

李潇彤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洞见]

栏目编辑

黄若瑶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叶润博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记者

丁凯伦 2022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王菁 2021 级 理工学院 学勤书院

[科学说]

栏目编辑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季伊忱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记者

窦涵慧 2022 级 医学院 道扬书院

张驰 2022 级 医学院 道扬书院

[演讲]

栏目编辑

冯子凌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主题报道]

栏目编辑

贾涵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罗雯静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叶润博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张艺骅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祝一寒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记者

郝嘉琦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贾涵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唐可馨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文玄亦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尹敏娜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祝一寒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撰稿

Prof. Thomas Carroll 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林雅昕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马浩文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滕云棋 2020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译者

范凯翔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人物]

栏目编辑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胡屹潇 2022 级 医学院 道扬书院

惠诗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季伊忱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叶润博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记者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刘焯州 2022 级 医学院 祥波书院

周凯怡 2021 级 医学院 学勤书院

张恩禧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译者

黄子晗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撰稿人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i 思享]

栏目编辑

杜可 2021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逸夫书院

叶润博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记者

王菁 2021 级 理工学院 学勤书院

撰稿人

王俏欣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校长专栏]

栏目编辑

杜可 2021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逸夫书院

撰稿人

徐扬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湖畔]

栏目编辑

冯子凌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叶润博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记者

黄若瑶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撰稿人

李潇彤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尚与棠 2021 级 金融工程专业 祥波书院

王清玄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摄影

韩翌灵 2019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黄梓烨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尚与棠 2021 级 金融工程专业 祥波书院

王俏欣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喻麒元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张凌康 CPPO